

Maotouying WenKu 第三辑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老年·友谊·义务 ——西塞罗文集

数字图书馆
PDG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十分赞赏这样一个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涅瓦即雅典娜，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本文库精选东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论述的精辟、文笔的生动为特色。但愿随着猫头鹰翅膀的振动，辉煌壮丽的人类思想的星空能在我们面前展现。

责任编辑 冯 征
封面设计 何礼蔚

老年·友谊·义务

西塞罗文录

高地 张峰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江苏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阳第二彩印厂印刷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插页 2 字数：107,000

印数：1—7,000

ISBN 7-5420-0213-6/B·28

定价：2.35元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PDG

写在前面的话

西塞罗是古罗马的一位政治家，他在参与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夺权斗争中，徒劳地维护共和制度，最终导致身败名裂。但是西塞罗作为罗马最大的演说家和杰出的散文作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这又使他名垂不朽。

本书收集了西塞罗有代表性的几本散文著作：《论老年》、《论友谊》、《论义务（二）》和《论义务（三）》。从中读者不难看出罗得岛特有的散文风格，溶朴实和典雅于一体；同时也会体验到西塞罗本人思想敏捷，论证严密和辩驳机智的雄风。

《论老年》是一本格调轻松，寓哲理于说教之中的伦理著作。其中心含义是劝导老人要恬淡寡欲，专事艺术和美德的修养。书中列举了

人们通常感觉老年悲惨的4个原因，并一一进行了驳斥。老年虽然离开了年轻时所能从事的工作，“但成就大事情并不一定要靠力气、灵便或敏捷，而要靠谋划、威信和主张”，就这方面来说，老年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大有作为；老年虽然体衰多病、力不从心，但“能维护自己尊严的老年人”，“精神是不会衰老的”；老年虽然减少了娱乐，但如果这只是指肉体之乐，那么就是青年也应避免这种“罪恶之饵”，而心灵快乐的老年人，即使是农夫同样也能享受阳光、炉火、树荫和清泉的乐趣；老年虽然逼近死亡，但如果死亡能引导灵魂抵达永恒存在的境界，何怕之有？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对善良诚实地过好一生来说是够长的了。

《论友谊》是继《论老年》之后的又一本伦理著作。首先，西塞罗指出友谊的本质在于志向、追求和思想方面的情投意合，友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它最符合也最有利于人的天性之发挥。其次，他区分了智者之间的友谊和普通平凡之人之间的友谊，后者虽然也能给人以快乐，但只有前者才是真正的和完美的友谊，至于坏人之间，则是无友谊可言的。再次，西塞罗为友谊制定了第一原则，那就是“为了高尚的事求助朋友，为了高尚的事

帮助朋友”，因此真正的友谊“既不请求朋友也不答应朋友去做卑鄙的事情”。最后，西塞罗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友谊划定了界限：认为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朋友，认为对朋友的情谊应相应或等于朋友对自己的情谊，认为朋友怎样对待自己，我们就怎样对待他，这都是不对的；真正的友谊应是纯洁的，他们之间在对一切事物，一切主张和一切情感方面无一例外都应是一致的。最后，西塞罗也谈到绝交，这是友谊中也会出现的灾难。当事情无可挽回时，“最好是让友谊自然消亡，而不要断然决裂”。此外，要注意不要使友谊变成仇恨。友谊尽管是最美好的，但是没有美德，就没有友谊。

《论义务》共3篇，总起来说都是论述道德之善。其中第一篇涉及道德上何为正确何为正当的问题，限于篇幅我们没有选译。第二篇专论同人们日常生活和需要直接相关的各种职责。在这里西塞罗表述了道德观念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原则之间的关系，他不同意把道德上正当而物质利益上有利、道德上正当而物质利益上不利、道德上不正当而物质利益上有利看作是3个各自独立的假设。接着西塞罗一方面从有助于维持人类生活的两类东西，即一是无生命的東西，一是有生命的東西，逐一分析、论述

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从3种道德的善,即有能力区分真理的谬误,理解一种现象与另一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现象之间的原因和结果;有能力抑制激情、欲望,服从理性;有能力在同他人交往中周到而宽容地行动,逐一分析,论述他的观点。《论义务》第三篇是论述了其它范畴之间出现冲突情况下进行选择的正确方式问题,包括实践准则、困难的道德决定、苛刻的习俗与法律、是否有必要永远诚实等几个问题。

西塞罗的伦理思想渊于斯多亚派的观点,主张禁欲主义,反对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认为人有更高尚的灵魂,更高尚的目标,人能控制欲望,热爱正义,不怕死亡和痛苦,当困难和危险到来时,也能坚定不移。因此幸福只在于追求美德,而不在于任何物质保证。西塞罗的伦理思想反映了古罗马时期奴隶制的没落和奴隶主阶级的悲观情绪。

文库编委会

1988年2月

目次

写在前面的话..... 1

论老年..... 1

论友谊..... 53

论义务(二)..... 109

(三)..... 175

论老年^[1]

—

献给蒂图斯·庞勃尼乌斯·阿蒂库斯

“蒂图斯啊，我若能帮助你消除侵扰你的内心辗转的焦虑，我将得到什么报答？”

蒂图斯，或要用恩尼乌斯的诗句对你说：

“这个人，虽然并不富有，但完全可以信赖。”

这句话原是弗拉米尼乌斯说的，但是，我确信，

[1] 原标题应为“老卡托，或关于老年的对话”，现在的标题为译者改加的。

我不会像对弗拉米尼乌斯说的那样对你说：

“蒂图斯，你如此日夜焦虑不安。”

因为我深知，你心中存有自制和无私无蔽的精神，你不仅从雅典带来光荣的别号，而且还有文化和智慧。然而，我揣度，你也会时时感到使我不安的种种严酷的现实，这些问题我目前要和你谈清是很难的，只能留给以后来讨论。而现在我要就老年问题写点什么献给你，这是当务之急。

老年的重负，对我和你一样，即使尚未成为紧迫的事，将来肯定也会面临^[1]，我决心要减轻你和我本人的这种重负，虽然我确信，对你来说，必定能够从容不迫、明智地承受这种重负，现在可以，将来也可以，就像你过去曾承受过其他一切重负一样。但是，当我决定就老年问题写点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应当把它献给你，因为它对我们两人都会有所裨益。对我来说，这篇文章的完成已成为一大快事，它不但为我驱散了老年人的烦扰，而且还使老年人变得舒适、愉快。

[1] 当时西塞罗 62 岁，阿蒂库斯 65 岁。

因此，我们怎样赞美哲学都是不会过分的，因为它使听从它的人能够毫无烦恼地度过自己一生中每一时期。关于别的问题，我已谈过很多，今后还要常常论及，而现在这篇论老年的文章是我献给你的。我没有像希俄斯的阿里斯顿那样^[1]，借蒂托努斯的口来发表议论，因为借神话故事来说服人太无力了，我借托了马库斯·卡托老人的谈话，他的论辩很能使人信服。我还想象莱蒂乌斯和奇皮奥也在他家，他们对他如此无忧无虑地忍受老年重负感到惊异。卡托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如果人们发现他现在的辩论包含比他过去书中通常表现出来的学识还要多，那么，可以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他在老年时勤勉学习希腊文献的结果。看来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下边卡托本人的议论可以表明我在老年问题上的所有观点。

二

奇皮奥 卡托，我和莱蒂乌斯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对你表示敬佩。你不但在其他事情上异常出色，尽善尽美，有智慧，而且最令人敬佩的是，你从没感到老年是一种重负。对于大多数

[1] 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人，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著作已失佚。

老年人来说，老年期是可厌的，他们甚至宣称自己肩负着如埃特那火山那样的重担。

卡托 奇皮奥、莱蒂乌斯，你们的赞扬看上去有点过于大惊小怪了。其实，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过美好和幸福生活的人来说，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是沉重的。而那些从自身寻求幸福的人，绝不会相信自然赋予他们的一切都是可恶的，老年首先属于这类情况。每个人都希求活到老年，但他们又怨恨老年的到来，这是多么愚蠢的矛盾心理和荒唐之见啊！他们肯定地说，老年潜至身边比他们想象的为快。那么首先，谁叫他们做出这种错误的判断的呢？从青年到老年，比从幼年到青年怎么就算来得那么快呢？其次，如果他们活到了800岁，他们也会觉得老年的烦恼不比80岁的时候要少。岁月流逝，不管活多久，一旦逝去，都不能慰藉庸碌之人的晚年。

因此，如果你们敬佩我的智慧（就我的别号“智者”来说，我巴不得不负你们的赞许，有这样的盛名），我的智慧就在于把自然看作是最高的向导，我顺乎自然，就像顺乎神一样，并且我还服从规律。人生的其他阶段一经完美规定好，其最后一幕，就像拙劣的诗人所做的那样，受到忽略，这是不可能的。当然，界限必定是有

的，这就像树上的浆果、地上的果实一样，到时候就会成熟，然后枯萎、坠落。这些是智慧之人应欣然接受的。和自然抗争就像巨人与诸神争战一样，其结果亦同。

莱蒂乌斯 然而，卡托，你能给我们（如果我们能代表奇皮奥陈述看法的话）更多的帮助吗？如果我们期望（至少是愿意）活到老年，我们应该事先向你学会哪种最轻松的方式以便有效地度过这沉重的老年时期呢？

卡托 莱蒂乌斯，毫无疑问我将告诉你们，尤其是，果真如你所说，这将使你们两人都会感到满意。

莱蒂乌斯 卡托，如果不麻烦你，我们的确希望得到你的指教。你走过了如此长的人生道路，我们也会进入你现在的境界的。

三

卡托 莱蒂乌斯，我将尽力而为。我的确常听到我同龄人的抱怨（正如格言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特别是前执政官，我的同代人，萨里那陶尔和阿尔比努斯，常常悲叹不已。有时，他们抱怨感官不再给他们欢乐了，没有欢乐，他们认为也就没有生活；有时他们抱怨那些过去一直尊敬他们的人转而轻视他们。我认

为，他们不该就这些不该抱怨的事大发牢骚。如果一切不幸的确都是年老造成的，那么同样的不幸我也一定会遇到，其他每一个老年人也会遇到。但是，我认识的许多老年人，并不抱怨自己的老年生活。他们把欲望的消失看做是一件幸事，而且他们的亲属朋友也不轻视他们。因此，一切抱怨都是各人的性格造成的，不是年龄引起的。有自制力的老年人，不乖僻、谄人情，会觉得老年期完全可以过得去，而性情怪戾、不谄人情的人在哪个年纪都会觉得不耐烦的。

莱蒂乌斯 你说的情况是这样，卡托。但是，也许有人会说，因为你有权势、有财富、有地位，所以你才认为老年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能够享有这些东西的人不会很多的。

卡托 你这样说有些道理，莱蒂乌斯，但情况不尽如此。一个塞瑞菲奥人在和台米斯托克利争论时，指责后者，他的辉煌荣誉不是他的，而是国家给他的。狄密斯托克利回答说：“的确，我如果是一个塞瑞菲奥人，我会很卑贱，但是，如果是一个雅典人，你也不会出名的。”这些话同样也能用来说明老年的问题。对有智慧人来说，处在极端贫困中的老年期的确不是能轻易度过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来说，

即使他有极多的财富，老年期也是沉重的。

因此，奇皮奥、莱蒂乌斯，一切之中最适合于老年人的莫过于是艺术和美德的修养。这样，在生活的每一阶段上，不管生活得多长久，都会带来最令人惊奇的结果。因为，这些结果不但不会使我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若有所失(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而且，以往美好的记忆和许多善行的回想是最令人欣慰的。

四

昆吐斯·法比尤斯·马克西姆斯曾收复了塔兰图，我年轻时很敬重这个老人，把他看做是同龄人。他既是一个和颜悦色的人，又有坚毅的性格，他没有因为年老而改变其品格。当我开始结识他时，他年事还不很高，但毕竟已经老了。我出生后一年，他第一次当上了执政官。到他是第四任执政官时，我成为开拔到卡布阿队伍中的一名年轻的士兵，5年后又到了塔兰图。在那之后的第四年，我成了财政官，在图第塔努斯和塞台古斯执政时，充任官职。那时，他年事的确很高了，他成了辛提亚提出的关于禁止馈赠礼品的法律的支持者。那时，虽然他很老了，但马克西姆斯还像年轻时那样作战，他以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挫败了年轻气盛的汉尼

拔。对此，我的朋友，恩尼尤斯称赞道：

“这个人只因审慎拯救了我们的国家，他置国家安危于个人荣誉之上，这位英雄的荣耀正与日增辉。”

真的，他在收复塔兰图时，表现了何等的警惕性和判断力呀！

在萨里那陶尔弃城逃到城堡后，我曾听到他吹嘘说：“法比尤斯，你收复塔兰图是我的功劳。”马克西姆斯笑着回答说：“的确如此，如果你不丢城，哪里来我夺城呢。”他在战争中很有名，在当平民时也毫不逊色。当他第二次做执政官时，民政长官卡尔维利乌斯和弗拉米尼乌斯提出要按人数平分皮森提和高卢库斯的土地，马克西姆斯在同事卡尔维利乌斯不表态的情况下，尽已所能反对这种对抗元老院权威的做法。虽然他曾做过占卜官，但他敢直言说，凡被认为是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征兆就应看作是吉兆而努力去做好，凡遇到有损国家安全的征兆我们就应予以反对。

在这个卓越人物身上我看到许多优秀品质。但最使人敬佩的是，他对他儿子之死的表

现。他儿子是一个著名人物，曾任过执政官。对他儿子的悼词我们人手一份，每当读到它时，便感到所有哲学家都黯然失色。他的确不仅只是在社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是伟大的，而且在内心中，在家中也是高尚的。他何等健谈，何等高人，何等通晓古代文化，何等熟知预卜未来！犹如罗马人一样，他精通许多作品，对一切事情博闻强记，内战外乱无一不了如指掌。因此，我当时极爱听他谈话，似乎我已推知，他死后，我们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一样。

五

那么，我谈许多关于马克西姆斯的事情是何目的呢？正如你们看到了，说像他这样的人的老年是悲惨的，是毫无道理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奇皮奥和马克西姆斯，没有他们那样攻城、陆战和海战，没有他们那样战争功绩，以及凯旋大典的回忆。然而平静、无瑕和高雅地度过一生，到老年也还是可以获得平和、安泰，我们知道柏拉图就是这样，他在81岁时写着东西就死去了。伊索格拉底斯也是这样，据说他在94岁时写了一本题目为《雅典颂词》的书，在此之后他又活了5年。他的老师，列

奥蒂努斯的高尔吉亚斯活到了107岁，他从来没有停止学习和工作。当有人就此问他为什么愿意活这么长时，他回答说：“我没有任何理由谴责老年时期。”多么精采的回答，多么值得称道的学者尊严啊！

愚蠢的人总是把他们的恶习和错误归咎于老年。而恩尼尤斯不是这样看待老年，他对此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像一匹骏马，常在奥林匹克赛场上赢得胜利，现为度过暮年正在静静休息。”

他把自己的老年比做强壮的和有成就的老马，你们不会不清楚地记住他的。他死去19年后的今天，弗拉米乌斯和阿西利乌斯当选为执政官。他去世时，正值西皮奥内和菲利普斯执政时期，后者是第二次执政。那时候我65岁^[1]，我曾为维科尼阿提出的法律大声疾呼，倾吐肺腑之言。70岁时（恩尼尤斯就活到如此年龄），他肩负着两个被认为是最重的担子，贫穷和老年，但他的表现似乎说明他对贫穷和老年很满意。

[1] 也有别的本子称66岁。

的确，在用心思考一下后，我找到了说明老年为何显得悲惨的4个原因。首先，老年使我们离开了毕生从事的事业；其次，老年使我们体弱多病；再次，老年剥夺了几乎所有的享乐；最后，老年使我们离死期不远了。如果你们愿意，下边我将逐个讨论这4个原因，看它们都包含着多少真理。

六

“老年使我们退出了从事的事业”，什么样的事业呢？是否是年青力壮时期从事的事业呢？那么就没有适合老年的事业，适合在体弱多病条件下可以用心智从事的事业吗？如此说来，马克西姆斯岂不一事无成？奇皮奥，你的父亲，帕乌路斯，我儿子的岳父，这个极优秀的人物也无事可做了吗？还有其他的老人，法伯瑞西乌斯、库瑞乌斯和考伦卡尼乌斯，他们提出建议、施加影响以保护国家的利益，也都什么也没有做吗？

阿庇乌斯·克拉乌蒂尤斯进入老年后，又瞎了眼睛，但就是他，在元老院的意见倾向于同皮洛士媾和并结盟时，毫不迟疑地站出来疾呼。恩尼尤斯用诗句把他的的话做了**翻译**：

“你们以前坚忍不拔的精神
哪里去了，是什么使你们丧
失理智，改变主意？”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深刻的话。当然，这首诗以及至今流传的克拉乌蒂尤斯的讲演，你们是熟悉的。他是在第二次当执政官后的第十七年作的讲演，而且他两次任执政官中间有10年的间隔，在这之前，他还当过监察官。从这些情况可以清楚知道，他在与皮洛士打仗期间，年事的确很高了。我们也是从长辈那里听到这些故事的。

否认老年能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无稽之谈。这种情景就像是说，当别人在爬桅杆，在甲板上奔忙，在船底淘水时，舵手在航行中没有用处一样。舵手虽然没有做年轻人做的事，但他静静地坐在舵尾上掌着舵，是做了更重要、更有用的实事。成就大事情并不一定要靠力气、灵便或敏捷，而是靠谋划、威信和主张。老年人非但不缺少这些东西，反而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添这种能力。

在你们看来，也许我在以往历次战争中当过兵，当过师长，当过总督，直至执政官，现

在不能参加战争了，似乎也就无事可做了，但是，我现在指导着元老院进行工作并告诉他们怎样工作。迦太基人长期以来心怀叵测，敌视我们，很久以前我就向他们宣战，如果不将他们消灭了，这件恼人的事，我是不会放心的。

奇皮奥，我多么希望神们能把这个光荣留给你，让你去完成你祖父为之奋斗的事业啊！你祖父已死去35年了，但后人每年都在纪念这位英雄。他是在我做督察官前1年，当执政官后9年死去的。那时我在执政，他是第二次当选为执政官的。如果他活到了100岁，难道他会对自己的老年感到烦恼吗？当然他不会再去漫游、跑跑跳跳、投标枪、舞短剑，但他会运用思想、智谋和主张。老年如果没有这些品质，我们的先辈也就不会把最高会议机构称作元老院了。

在拉塞台莫尼^[1]附近地区，情况也是这样，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实际是老人，称呼也是长老。如果你们读到或听到外国历史，你们就会发现，最强大的国家都是由年轻人搞乱，而由老年人支撑恢复的。

“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失去了自己

[1] 即斯巴达地区。

的国家呢？”这是内维尤斯在《学校》^[1]中提出的问题，他从很多方面进行了回答，其重点是：

“〔因为〕出现了幼稚狂妄的
年轻人。”

诚然，韶华之年的人不免轻狂，而老年则明智慎重。

七

有人说，老年人记忆力会减退。如果你不勤于锻炼或者你天生就是个呆笨之人，我才相信这是真的。狄密斯托克利记得所有市民的名字，难道你们会认为，随着年龄增高，他会把阿瑞斯底德斯常常招呼为利西马库斯吗？至于我，我不仅记得现在活着的这些人，而且我还记得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当我读墓志铭时，我不怕读它会失去记忆这种常人的说法。但正是靠读这些墓志铭，使我记起那些死者。我的确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老年人忘记了藏匿钱财的地方。他们记得他们挂虑的一切事情：约定到法庭的日子，谁欠他们的钱和他们自己欠谁

[1] 诗的题目各本子不一样，有的是Ludo(学校)，有的是Lupo(狼)。

的钱。

上了年纪的法学专家、大司祭、占卜者和哲学家又怎样呢？他们记忆的东西不是很多吗？只要老年人不断地勤奋努力，刻苦用功，他们会年老矍铄。不仅德高望重、有权威的人如此，而且过着平和安静生活的人亦如此。索福克勒斯在很老的时候还写悲剧。他因为专心致力写作，显得无心顾及家事，被他的儿子告到了法庭。根据和我们相同的习俗，父亲治家不好，常常要被禁止管理财产。法官们剥夺他管理家庭的权力，就像剥夺一个丧失理智的人那样。当时，据说老人双手拿着他新近刚写成的剧作《在考洛努斯的俄底浦斯》，当众诵读给法官们听，并问他们，这个作品是否听起来像是一个丧失理智的人作的，于是，法官们判他无罪。

他，或者荷马、赫希奥德、西莫尼德斯、斯德西考鲁斯，前边我想到伊索格拉底斯、高尔吉亚斯，先驱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柏拉图、色诺芬，以及他们的继承人芝诺、克莱安西斯，你们在罗马见过的犬儒派的第奥根尼，难道老年会促使这些人在自己的事业中变得沉默吗？就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难道他们的事业不是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生命吗？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伟大的事业了。现

在，我要提一提罗马乡间萨比尼农民的生活，谈谈我的这些邻人和亲友。如果他们不在田间，田里的重要农活就几乎没人能干，不管是播种、收获或囤粮都是如此。当然，在其他方面更不必大惊小怪了。没有哪位老人会认为自己不能再多活一年了，但是，他们还是同样辛苦地劳作，虽然他们知道自己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前人植树，后人乘凉。

这就是我们的斯塔蒂乌斯在《西内菲比》^[1]中所说的话。一位农民，虽然很老了，当问到为何种树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为了不朽的神明，他们不仅希望我从祖辈那里接受遗产，而且希望我传给子孙后代。”

八

斯塔蒂乌斯刚才对那个为后代着想的老人所说的话比下边的话要好得多：

“老天在上，老年，当你临近时，即使不带来别的缺点，只有一个就够了，谁活得长

[1] 此词来自希腊文，意为“青年伙伴”。

久，谁将看到许多不期望的事情。”

当然他还会同时看到许多期望的事情。然而就是青年人，他们也会常常遇到同样不期望的事情。下边，斯塔蒂乌斯说了更错误的话：

“人生中最不幸的事，莫过于年老时感到为他人厌。”

不！是更令人愉快，不是令人生厌。青年人乐于同天才的和聪慧的老人相处，被年轻人敬重和爱戴的老人在同青年人在一起时会变得平稳轻松。同样，青年人会因老年人的教诲而喜欢老年人，因为这会使他们更好地培养美德。我觉得，你们喜欢和我相处一点也不亚于我喜欢和你们相处。因此，你们可以看到，老年不仅不衰朽，而且也不无所事事，而且，老年人的确在兢兢业业地劳作，从事着他们以前从事的事业。自然，他们的事业是在生活的早期阶段就开始了。有些老年人现在仍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奋进。我们看到，梭伦曾在自己的诗中自诩，说他在进入老年后，仍每天学习新东西。我也是这样做的，老年时我学习了希腊文学。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它，就像满足长久的口渴一样，因此，从我现在经常使用的例证里你们会看到希腊文学的学习在我身上的表现，当人们传说苏格拉底弹琴的故事时，我的确也很愿意学习（因为古代人都学弹琴），但我只在文学方面真正下过苦功。

九

现在，我并不羡慕年轻人的精力（这是老年人力不从心的第二个方面），这就像青年时，我不想有牛和象的体力一样。一个人应使用他相应具有的东西，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按照你的体力来做。克洛顿的米洛所说的话难道不应受到蔑视吗？就他年老时，一次他看到武士在角斗场上操练，据说他瞥见自己的胳膊后，痛哭流涕，叹道：“无奈，这些已经死去了。”然而，肌肉决不会比你自己，这个无聊庸俗之辈，更像死了一样。因此，你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靠你本身，而要靠你的胸肋和膂力扬名天下。与此相反，塞克斯特·阿留斯不是这样，比他大好几岁的提吐斯·考伦卡尼乌斯和近世的P·克拉苏斯也不如此。然而正因为有他们，公民的法律才得以确立。他们的才智长久不衰，一直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担心演说家的能力到老年会渐渐消退，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来自天才学识，而且还要依靠肺部和体力。我当然对声音中和谐铿锵之音在老年期如何还能发聋振聩一无所知。但是，虽然你们看到了我这把年岁，但我至今还没有失去这种声音。老年人的谈吐是庄重的、平和的和温文尔雅的。有口才的老人温和可亲的演说本身，常常可以使人爱听。即使你自己不能亲自前往演说，你还可以指导奇皮奥和莱蒂乌斯。在老年，让好学青年聚在自己身边是多么惬意的事呀！

我们难道可以放弃老年的这些精力，不让老年人教诲和培养青年人，指导他们尽各种义务和职责吗？这岂不是伟大神圣的工作吗？我认为，内乌斯·奇皮奥、普伯里乌斯·奇皮奥和你（奇皮奥）的两个祖父，鲁修斯·艾米利乌斯及普伯里乌斯·阿菲卡努斯显得很幸运，因为总有一些显贵的年轻人追随着他们。好的艺术大师是幸福的，即使他们到时将要年老力衰，失去精力。此外，这类精力丧失之事本身也往往更多是由于年轻时的荒唐造成的，而不是老年时的过错。的确，青年时期放荡不羁和贪欢取乐，进入老年后会使身体衰竭不堪。

色诺芬书中的居鲁士在老迈之年、弥留之

际，曾有过一番谈话，说他从不认为自己会老，自己老年时会比青年时身体变得更软弱无力。我小的时候就记得鲁西乌斯·梅台鲁斯，他在第二次任执政官之后的第四年，又被选为大司祭，并担任这个司祭职务有22年之久。我记得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体力充沛，以致他并不感到青春已逝。不必再对你说起我的情况了，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凭我这个年纪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

十

你们注意到荷马史诗中的内斯特尔常常公开宣扬自己的德行吗？他曾和第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因而他从来没有因为对自己的真实情况进行过分宣扬让人感到过分倨傲或饶舌。正如荷马所言：“从他嘴里流出来的话比蜜还甜美。”然而他说的甜美的话不是靠体力。因此，希腊统帅从来都没有企求自己有10个像阿亚克斯那样的大力士，而是企求有10个像内斯特尔那样有智慧的人。他认为能遇到这样的人，他将毫不怀疑，特洛伊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灭亡。

现在，让我回过头来说说自己吧。我现今84岁，我也希望能像居鲁士那样自诩。但是，我只能这样说了，我在布匿战争中当过兵并当

上了财政官，在西班牙当过总督，4年后在特尔莫皮拉作为副将参加过战斗，成为马尼乌斯·阿西里乌斯·格拉布瑞乌斯的统帅，我在这期间精力旺盛，虽然我目前身体不如那时了，但老年（如你们所见）一直没有使我明显衰弱，或压垮我。元老院、演讲会、朋友、门客和款待我的主人都看到我的精力犹在。我从来不赞成老辈人称道的那句谚语：“要想老年长久，就要早做老人。”然而我宁愿老年短些，而不愿老年提前来到。因此，至今没有人会指责我，说我没有为他们奔忙。

当然，我的体力不如你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体力。但是，你们也没有百夫长蒂图斯·庞蒂乌斯那样的力气，难道因此可以认为他就超群出众了吗？有适当的体力就行了，而且每个人尽量努力，都能够获得一份体力。人对体力没有很大的渴望，他也就不会感到烦恼。据说，米洛在奥林匹亚赛场上，曾肩扛活牛步行绕场一圈。但是，你们是愿意要那种肉体的力量，还是毕达哥拉斯那种天赋的智慧力量呢？总之，有体力时，你尽力使用它，没有体力时，你不要强求它。除非偶然情况下，青年人想要回到童年，稍微上了点年纪的想要回到青年。一生的进程是确定的；自然的道路是唯一的，而且

是单向的。人生每个阶段都被赋予了适当的特点：童年的孱弱、青年的剽悍、中年时期的持重，老年的成熟，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按照各自其特性属于相应的生命时期。

我相信，奇皮奥，你曾听说款待过你祖父的主人马西尼撒吧，如今他已90岁高龄了，他每天在做什么呢？当他徒步旅行时，中途决不骑马。骑马旅行时，中途决不下马。无论遇到风雨还是遇到严寒，头上从来没遮没盖。他全身健壮、没有松弛臃肿，因此，他对国王的一切义务和职责都能做到事必躬亲。所以，有锻炼、有节制，才能在老年时保持住过去的精力。

十一

老年固然没有体力，同样，人们也并不要求老年有体力。因此，法律和社会惯例豁免我们这样年龄的人，不让我们执行那些没有体力就不能从事的职责。这样，不但没有人强迫我们去做不能做的事，而且也没有人要求我们去做甚至还能做的事。

许多老年人很衰弱，不能完成他们完全应该执行的义务和尽生活职责。但这不是老年本身的过错，所有身体有病的人都会有这种状况。普·阿菲卡努斯的儿子，那个立你为嗣子的人

是多么衰弱呀^[1]！他虚弱多病，根本无健康可言。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会为国家第二次发出光和热。因为他除了具有他父亲的伟大精神，又接受了更渊博的学识。既然青年人都不免会体弱多病，那么老年人亦是如此，还有什样可大惊小怪的呢？但是，我们要抵制老年的到来，它的缺陷应精心予以弥补。我们要奋力这样做，就要像防病一样防备老年。

我们应注意健康、选用适当的锻炼方法、用饮食以滋补体魄而不是为了抑制发育。同样，身体不是唯一该保养的，智力和心灵更值得多加注意。就连灯光也一样，如果你不淋点油在上面，它也会因衰老熄灭。而且，身体会因疲惫不堪和体操锻炼受到侵扰，相反心灵通过锻炼会感到轻快。的确有塞西里乌斯所说的“滑稽戏中愚蠢的老人”，他指是那些轻信、健忘和怠惰的老人。这些缺点不是老年所致，而是无才能、无志气和懒怠的老年人才如此。青年人比老年人好冲动、贪纵欲，然而，不是所有青年人都如此，品行好的青年就不是这样。因此，这种老年的愚蠢（习惯上称为昏愦）是指德行浅薄的老年人，不是指全体老年人。

[1] 指奇皮奥的继父。

阿庇乌斯虽然又老迈又瞽目，但仍管着4个强壮的儿子、5个女儿，管理那么大的家庭和那么多的食客。他的用心如满弓一样，没有因渐渐疲倦衰弱而屈服于老年。他不但在家中很有影响，而且很有权威，奴隶们畏惧，孩子们敬畏，他们都对他很敬重。在他家里，祖先的家风经久不衰，家教严明有力。

如果老年人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向任何人屈服，掌管家政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样的老年是值得颂扬的。正如我赞许有某种老年特点的年轻人那样，我也赞许有某种青年特点的老年人。追求这一特点的人会有衰老的体质，但绝不会有衰老的精神。我现在正在编写我的《起源》一书的第七卷。我在搜集所有有关古代的史料。另外我还在整理我曾在辩护过的那些著名讼案上做的演说。我在研究占卜、祭祀和民法。此外，我还用很多时间研究希腊文。用毕达哥拉斯练习记忆的方法，我每天晚上回忆一下曾说过的和曾听到过的话，以及所做出的事情。这些就是悟性的锻炼，就是思想的训练，在进行训练的不懈努力中，我没有特别感到缺乏体力。我为朋友到庭，经常去元老院，到那里提出经过我深思熟虑的议案，我用心灵而不是体力维护我的意见。如

果我干不了这些事，我就到床榻上享受一下，去思索我已力不从心的工作。但是倘若我能够做的话，也是已往的生活起了作用。一个人常常以学习和劳作度日，他觉察不到老年何时渐至。因此，人生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渐入老迈之年的，它不会顷刻被摧毁，只能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泯灭。

十二

下边是对老年的第三种贬毁：人们说老年缺乏娱乐。但是，老年从我们身上带走了青年人身上最恶劣的东西，这不是一生中的大好事吗？我的好青年，你们领会一下塔兰图的阿尔西塔年迈时的讲演吧，他是最伟大和最杰出的人物。当我年轻时，和马克西姆斯一起在塔兰图的时候，我听到了这篇讲演。他说：

“自然赐予人致其死地的瘟疫正是肉体的娱乐。为了得到肉体的快乐，贪婪的欲望会冒然和肆无忌惮地逼迫我们去求得满足。”

“这样，它会引起叛国、误国和通敌的行为。因此，没有一件阴谋诡计和祸患不是快乐的欲望迫使人们为了享乐而引起的。实际上，强奸、通奸，一切这类恶行，如果不是娱乐的诱惑，就没有别的什么能够引起。自然或神赋与人最

崇高的东西是心灵，对这种神圣的馈赠来说，没有什么比娱乐更与它相对立了。

“在欲念支配一切时，节制没有一席之地；在娱乐起支配作用的范围内，美德不能立足。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心里设想这样一个人，他受到了肉体享乐的最大诱惑。他会认为对所有人来说，无可怀疑，当沉湎于享乐之中时，都不能还有心灵的活动、还有理智、还有思想。因此，没有什么比娱乐更可恶和更有害了。既然如此，当娱乐成了更为强烈和更为长久的力量时，它就会扑灭一切心灵之光。”

这些就是阿尔西塔和萨姆尼特的卡尤斯·庞蒂乌斯谈话时说的话。后者是在和卡写蒂尤斯人交战时打败斯布瑞乌斯·波斯图米乌斯和蒂图斯·维图瑞乌斯两位执政官的那个人的父亲。我的朋友，和罗马人始终很友好的塔兰图的内阿尔库斯向我说起阿尔西塔这段话，他说，他是从老年人那里听来的，当时谈话的人中有雅典的柏拉图。我现在发现，柏拉图的确在鲁西乌斯·卡米鲁斯和阿庇尤斯·克拉乌蒂尤斯执政的时代到过塔兰图。

我为什么要引证这些话呢？这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如果我们不能依靠理性和智慧抵制娱

乐，那么就应该深深地感谢老年，它能做到约束那些本不应该有的东西。娱乐不但阻碍思想，还是理性的死敌，会蒙住（如我们所说的）心灵的眼睛，而且和美德不能并存。最勇敢的人，蒂图斯·弗拉米尼乌斯有个兄弟叫鲁修斯·弗拉米尼乌斯，在他当执政官7年后，我不得不将他驱逐出元老院。但是，我觉得应该公开谴责贪欲。在任执政时，他在高卢的的一次宴会上接受了一个妓女的贿赂，用斧子杀掉一个人，此人是那些投入囹圄被判了死罪犯人中的一个。当他的兄弟，蒂图斯任监察官时（他当时是我的前任），鲁修斯逃避了惩罚。诚然，对我和弗拉库斯来说，恶劣的和放荡的贪欲是决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除了使个人学坏外，还玷污了官职的权威性。

十三

我常听老年人说起，他们在小时候听老年人说过，当法伯瑞西乌斯出使皮洛士王那里时，他常常对特萨洛尼卡^[1]的西内亚说的事感到惊讶。西内亚说有这样一位雅典人，他自认为自己很聪明，并宣称我们做的一切都应应以娱乐为标

[1] 希腊东北部的城市。

准。当马尼乌斯·库瑞乌斯和蒂图斯·考伦卡尼乌斯从法伯瑞西乌斯那里听到此事后，他们常常期望萨姆尼特人和皮洛士王本人都相信这一点，这样，当他们沉湎于娱乐时，他们就更容易被战胜了。马尼乌斯·库瑞乌斯和普·德西乌斯关系很亲密，他在库瑞乌斯任执政官前5年，自己第四次任执政官时为国捐躯了。法伯瑞西乌斯和考伦卡尼乌斯也熟知他，他们根据他的一生经历，就普德西乌斯所说所做作出判断说，的确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美好和崇高的东西，人们寻求它，那些轻视和摒弃娱乐的最高尚的人也追求它。

然而，我为什么就娱乐问题发表这么多的议论呢？因为，老年根本不向往任何娱乐，这不但不能使老年受到谴责，反倒是老年受到的最高赞誉。老年人没有欢宴、丰盛佳肴和开怀痛饮，诚然，也就没有酗酒、积食和失眠。但是，既然我们不能完全避免娱乐的诱惑，娱乐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在所难免的（柏拉图巧妙地称娱乐为“罪恶之饵”，人们像上鱼钩的那样受着它的摆布），因此，虽然老年没有奢靡的宴会，但在普通的宴会中也能够感到快乐。都依里乌斯是马尔库斯的儿子，他首次在海洋中战胜了迦太基人。我在孩童时常看见这位老人从

宴会上回来，他喜欢有一个拿火把的和一个吹笛的人相送。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这样做是没有前例的，但是功绩给了他这样的特许。

何必讲别人呢，就说我自己吧。我最初就常有很多朋友，在我任财政官时形成了一些团体，接受的崇拜对象是伊达山的大女神。因此，我常和朋友们有节制地在一起聚餐，但在那个年龄也不免轻狂。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激情一天天地平和下来。即使在宴会上我对自己的快乐并不认为来自感官享受，而是更多地认为来自与朋友们的聚会和谈话。我们的先辈恰如其分地把这种表明生活联系的朋友间的宴饮称作“聚会”。它比希腊词好得多，因为希腊词要么说的是会饮，要么说的是聚餐。这两个词在其本身派生出的意义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它们显示出这类活动中最少的值得称道的意义。

十四

我本人因喜欢谈话，也很喜欢午后宴会，即聚会，不仅和少数尚在的同时代人聚会，也和你们同龄及年龄相仿的人聚会。同时，我非常感激老年，它使我增加了谈话的兴趣，抑止了饮食的兴趣。如果人们有饮食的乐趣（我并不认为应完全克制娱乐，因为娱乐中也许有某

种自然的東西),我不認為,老年人毫無為那些娛樂本身所動。宴會上按祖先的風俗,照例在斟酒之後由首席發表講話。色諾芬在《會飲篇》一書中描寫的那種小巧的、使酒一滴一滴流下的酒杯,夏天消暑,冬天曬太陽和烤火帶來的溫暖,這些使我和主人們都感到快樂。就是在薩比努斯時我也常常在領受這些快樂,每天必到附近的宴會去,我們一直聚會到深夜,發表各種各樣的議論。

對老年人來說,這樣的刺激也許已沒有那麼大的快意。但是,我相信,老年人並不貪圖這些。一個人不貪圖什麼,也就不需要為之煩惱。索福克勒斯年歲很大時,有人問他那時是否還有愛情之事,他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說:“神靈保佑吧!我對現在處境心甘情願,這恰似從粗野和狂暴的主人那里逃出來後的心情一樣。”對貪圖這些事情的人來說,得不到甚至會使他們變得可厭、憤懣;對得到和感到滿足的人來說,沒有比享用它們更令人高興。既然他不貪圖什麼,他也就感覺不到缺乏什麼。因此,我認為不貪圖是更令人愉快的。

即使我說,一生精力最好的時期最能興高采烈地享有娛樂,但我也是說,首先,他們享有的是毫無意義的東西;其次,對年事很高的

人来说，纵然不是强烈要求，但也不是全然不能享受。就像欣赏安庇威尤斯·图尔庇奥的演出一样，坐在第一排的人欣赏得很好，而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也能欣赏到。同样，青年是在近处观看娱乐，当然得到的快乐就多一些，老年虽然坐的距离远一些，但也能得到足够多的快乐。

但是，一生像怀着战斗中那样的心情，充满着欲望、野心、好胜之心和敌对心情，并（像人们常说的）靠此度日，这样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一个人追求学习和修养就像获得食物为生一样，那么没有什么比闲暇的老年更令人快活了。奇皮奥，你父亲有个朋友叫盖阿斯，我们亲眼看到他在测量天空和大地的研究工作中死去。多少次的通宵达旦说明着他的勤勉，多少次清晨开始的工作只有暮色降临才能阻止他！他很早就预测出日蚀和月蚀，当时他感到多么地喜悦呀！

在虽然需要敏锐头脑，但较轻松的研究工作中，内维乌斯从他写作《皮匿战争》中得到多大的快乐呀！普拉乌吐斯从写作《野蛮人》和《欺骗》中又得到多大的快乐呀！我还见过老人利维乌斯，他在我出生6年前，即森托尔和图第塔努斯执政时期，就已在教人表演故事，后来我进入少年时期，他还活着。我们为什么

不应讲讲普·克拉苏斯和他对祭司及民法的研究呢？我看到，我所怀念的所有这些人年迈之时还在发奋学习。还有马尔库斯·塞台古斯，恩尼尤斯公允地称他为“游说精灵”，我看到他在年事很高时依然多么刻苦地致力于讲演呀！因此，宴会上的、游戏中的和淫逸放荡中的快乐，与这些快乐相比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快乐来自某种对知识的学习。对于那些聪慧和有好习惯的人来说，年事越高，学习越努力。这就证明前面我引用过的梭伦的诗句：年老学问日进，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心灵的快乐能够获得更大的快乐。

十五

现在，我来谈谈使我感到非常愉快的农夫的乐趣。这些乐趣不会因老年而受到削弱，我认为看上去他们很像是过着哲人的生活。农夫只和土地打交道，土地是从不拒绝要求，不会因接受了东西不报之以报，虽然有时报偿很小，但通常是报偿很多的。然而，我不仅喜欢收获，我还喜欢土地本身的力量和特性。当土地用自己温暖的和松软的胸怀接受播撒的种子后，种子首先被泥土所掩盖。接着，在土地水气的加温下，种子便开始发芽，并抽出一叶嫩绿的芽，

依靠着根须，逐渐地发育成长；嫩芽挺立得多节的茎秆上，在即将进入成年时还被包裹在叶鞘之中；当顶出叶鞘时，它就结穗了，果实整齐地排列着，为了防备小鸟的啄食还长着一排排的芒刺。

我为什么还要说到葡萄的栽种、发育和生长呢？你们要知道我在年老时的休息和消遣情形，你们就会了解，这是我能得到的最大的满足。一切东西的活力都来自土地，一粒细小的无花果种子，或者一粒葡萄果核，或者其他果实和树木的种子都是凭借土地从最微小的种子长成了如此大的枝干和枝叶，这一切我就不用提了。对葡萄枝的打芽切枝、埋根、压条，这些难道不能产生令人羡慕的喜悦吗？葡萄枝天生要往下垂，如果没有东西扶持，它会落到地上。但是，为了站立起来，它用像手一样的卷须，抱住它所遇到的一切。在它像蛇一样到处蔓延、疯长之时，农夫的技艺用刀修剪它们，不让枝条在各处蔓延、滋生。

因此，春天一到，在留在地上的枝条上，人们称作绿宝石的东西从葡萄枝的枝节处长了出来，葡萄显露出来了。地里的水气和阳光的热度促使它们长大，开始尝上去很酸，后来随着它成熟变得甘美了。葡萄藏于修剪过的繁枝之

中，既不缺乏适宜的温度也避免了阳光的暴晒。还有任何事情能够比生产它们更令人兴奋，比期望其结果更美妙的吗？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我感到喜悦的不仅是葡萄的实用性，而且还有对它的培育和它本身的特性。一排排葡萄架、架顶上层层绑系的葡萄枝、被土压着的枝条，以及我所说过的，对葡萄枝的修剪或让其自由生长，这些都给我带来喜悦。

我还有必要说明灌溉、挖土掘沟和平整土地的作用吗？土地只有因此才能富有活力。还有必要讲述施肥的益处吗？我在撰写乡居生活的书里已提到这个问题。但就是在这类事情上，学识渊博的赫希奥德当撰写土地耕种问题时，却只字未提。而荷马虽然生活在许多世代以前，在我看来，他写了莱尔底斯为了缓和因儿子带给他的思念而从事耕地和施肥劳动的情况。乡村生活的乐趣不仅来自农田、牧场、葡萄园和林场，而且来自花园和果园，还来自饲养家畜、驯养蜂群、植养各种花卉等等。另外，不仅栽种而且嫁接，两种工作都使人感到快乐；嫁接在农业中无疑是最精细的工作。

十六

我还能继续讲述乡居生活中的许多乐趣，

但我觉得我讲得有些过多了。当然你们会原谅我，我一专心讲述起乡居生活，我就不免忘了别的事情，而且老年人自然爱唠唠叨叨。你们不要认为我这样说是要开脱一切错误。马尼乌斯·库瑞乌斯战胜萨姆尼特人，萨比尼人和皮洛士后就是以这种乡居生活方式度过他的晚年的。当我观察他的别墅（他的别墅离我的不很远）时，我对这个人如此的节俭和在这个年龄还有如此的修养就不能不感到惊奇。库瑞乌斯坐在火炉旁，萨姆尼特人送来了一大堆金子，他斥责道：“我认为拥有金子不算光荣，但统治那些拥有金子的人才算光荣。”难道如此伟大的精神不能使老年变得很快乐吗？

然而，现在我要回到农民的话题上来，不离开我自己的原意。过去，元老院成员，也就是老人，有住在乡间的。例如，当鲁昆提乌斯·辛辛那吐斯接到通知已被推选为独裁者时，他正在耕地，正是根据他这位独裁者的命令，骑兵都督盖·塞尔维利乌斯·阿哈拉，把谋取帝位的斯普瑞乌斯·梅里乌斯捉住并杀了。库瑞乌斯和其他老人都是由乡舍被传唤到元老院的，因此传递消息的人被称为“行路人”。这些以务农自乐的老人难道是很可悲的吗？就我的看法来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比这更

幸福。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职业的特点（农业有益于所有人类），而且正如我说过的，还有乐趣和富裕及一切丰富的物品（物品是人的生计和神的祭祀所必需的）。既然有人还在渴望着这些东西，因此我要从好的方面看待享乐。通常，精明能干的农夫总是让酒罐和油桶贮得满满的，让整个农舍装饰得很富丽。他们有颇多的猪、山羊、绵羊、母鸡、牛乳、奶酪和蜂蜜。农夫们还把花园称作收入的另一个来源。闲暇时捕鸟猎兽更使得这种生活丰富多采。

至于嫩绿的草场、齐整的树木，以及葡萄园和橄榄树园的美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就简单说吧：没有什么东西比精耕的土地最有收益、其景色最为壮观。年老非但不阻碍我们，反而更促使我们去享受这种乐趣。到了这样的年龄，还能到哪里去享受暖和的阳光和以炉火取暖呢？或者到哪里去找寻树荫和清溪呢？

因此，对老年来说，让别人去享受武器、马匹、投枪、棍棒、球、游泳和赛跑的乐趣吧！但请把有四面标记和六面标记的骰子留给我们老年人消遣。当然，即使没有这些骰子老年人也能幸福，也会获得更大的快乐。

十七

色诺芬的书在许多方面使人颇有收获。我请你们像现在这样，继续认真地读他的书。他有一本关于管理家政的书，题目是《理财篇》，在那本书里他用了多少优美的词句来赞美农业事务呀！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从事耕种土地更能显示帝王特点，为了让你们了解，我要叙述一下他书中提到的苏格拉底向克瑞特布鲁斯讲的故事。波斯王子，小居鲁士有卓越的天资和帝王的声望。当拉赛台莫尼的赖山德，一位最勇敢的人，到萨尔库斯来见他，带给他联军送的礼品时，波斯王用各种办法亲切诚挚、文质彬彬地款待他，并且还带他参观了精心管理耕种过的一个有围墙的园子。赖山德惊叹不已，称赞树木参天，依梅花式栽种的行列管理极好，土地齐整，花草中飘起芳香，他说他不仅佩服设计和安排这一切的人的辛劳，而且还佩服他的精明能干。居鲁士对此回答说：“正是我自己设计了这一切，树木的那些行列是我搞的，安排这一切也是我做的，甚至许多树木还是我亲手种的。”赖山德注视着他的紫袍，气派非凡、装饰着许多金子和宝石的波斯式服饰，说道：“居鲁士王，人们认为你幸福是太正确了，因为

你把美德和幸运都集于一身。”

老年人也可以享受这种好运。年龄不能阻止我们从事各种细小的事情，特别是耕田种地，老年人也可以一直干到最后一息。我听说马·瓦雷瑞乌斯·克尔乌斯年迈时还住在乡下耕田种地，到了100岁他还过着这种生活。从他第一次任执政官到他第六次任执政官这中间有46年之久。因此，他享受荣誉的生涯如此之长，以致这个时间竟等于我们祖先认为从降生到老年开始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了。不仅如此，他的晚年比中年还幸福，他的权威更大，而劳作较少了。权威是老年的最高荣耀。

鲁塞西里乌斯·梅台鲁斯的权威有多大呀！阿提利乌斯·卡拉里努斯的权威有多大呀！他有这样一句墓志铭：“大多数民众公认，在此长眠的是国中最重要的人。”雕刻在他墓上的全部铭文为世人所熟知。人们一致称赞他，他的声望自然是很大的。我们看到，近世当上大祭司的普·克拉苏斯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呀，还有后来继任祭司职位的M·列皮杜斯又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呀！关于帕乌路斯·阿菲卡努斯以及前边刚提到过的马克西姆斯，我还需讲什么呢？不但在他们的思想中，而且在他们的点头示意中都寄寓着权威性。老年，特别是有过光荣经历的老

年，其权威受到大多数人的称赞，有着比青年时的一切娱乐更重要的价值。

十八

但是，请你们记住，我所讲的一切称赞老年的话，都是指在青年时打下了良好基础的老年。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说（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人们都赞同的话），“用言词为自己辩护的老年是悲惨的老年。”不是苍颜白发一出现就带来了权威，而是早年的高尚行为使你晚年享受到权威声望。

有人问候、有人求助、有人避让、有人欢迎、有人陪伴、有人引路和有人征求意见，这些看上去没什么，很常见，但这本身都是光荣的事。这些东西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因是世俗风化的最好标志，人们最认真地奉行它们。我前边介绍过的斯巴达人赖山德，人们说他常常公开宣称，斯巴达是老人最受尊敬的地方，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恭敬老人，使老年有更高的荣誉。有一段传说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情况，雅典的一家剧场正在进行演出时，一位老人走进来，然而座席上的雅典人没有一个给他让座。当他走到斯巴达人的座位旁时，这些专座上的外国使者全都站了起来，把座位

让给了这位老人。斯巴达人的这种行为使所有在场的人多次鼓掌喝采，因此一个斯巴达人说道：“雅典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就是不愿去做。”在我们的占卜院中也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我们首先应说到的是，按年龄长幼，确定发言次序。不管是官职很高的人，还是比自己职位高的占卜者在场，老年人在占卜时总要在前。因此，身体方面的娱乐怎能和作为酬报赋予的权威相比呢？那些极卓越地使用了这些酬报的人，我认为是圆满演出了人生的戏，没有像完全未受过训练的演员那样，在最后一幕垮下来。

然而，有人认为，老年怪僻、焦虑、暴躁，以及难对付；如果我们再找点毛病，还会看到老年很吝啬。然而，这些只是品行方面的缺点，不是老年带来的缺点。怪癖和我上面列举的其他缺点都是有某些理由来辩解的，虽然并不充分，但也可以使人们理解：这就是老年人自认为受人鄙视、冷眼相待和戏弄。另外，因身体衰弱，一切不顺心的事都会引起烦恼。但是，依靠好的品行和才能，这些缺点是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变的。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在戏剧中也有，从《两兄弟》这个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中一个是多么粗野，另一个又是多么

温文尔雅呀！事实上，就像所有酒并不都会因久存而变酸一样，不是所有人一进入老年都会变得怪癖乖戾。老年时期的严厉是应当的，但要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有节制。刻薄冷酷，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赞成。我还不理解老年人吝啬的真意。因为对一个路程越走越少，而路费越攒越多的旅行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

十九

这里还存在着第四个理由，它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显得最痛苦和最烦人，这就是死亡迫近。对老年来说死期的确不很远了。一个老人活了那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死亡是应被蔑视的，这是多么可怜的老人呀。如果死亡能彻底毁灭灵魂，它显然要遭到蔑视；如果死亡引导灵魂转到永恒存在的境界，死亡又是可希冀的。除此之外，第三条道路是断然找不到的。因此，如果我死后要么是不悲惨的，要么有来世的幸福，那么我还惧怕什么呢？

但是，谁能凭借一时年轻，居然愚蠢地肯定他到晚上还活着呢？不能的，青年比我们这个年岁更易遭致死亡变故。青年更容易染病，更容易患大病，治起来也更困难。因此，只有

少数人能活到老年。如果没有遭遇到这些，那就是人们有着更好和更明智的生活方式。其实，思想、理智和计谋都是在老年人中发现的。如果没有老人，国家根本就不会存在。让我还是回过来讲讲死亡迫近的问题吧。死亡既然在青年人那里也是很一般的事，那为什么就拿它指责老年人呢？我心爱的儿子的死，奇皮奥，你的曾有望获得最高荣誉的兄弟的死，这件事，使你我懂得了死亡对一切年龄的人来说都是常有的事。

但你们会说，青年有希望活得长久，而老年人就没有这种期望了。有这种期望是愚蠢的，把不确定的事当作是确定的，把错误当作是真理，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呢？有人说，老年人没有什么好期望的了。但是，正是在这方面老年人比青年人有更有利的条件，因为青年人还在期望时，老年人已得到了，青年人渴望活得长久时，老年人已经活得很长了。但是，天啊，长久在人生中又是什么呢？就是给了最长的寿命，可期望活到塔尔台苏斯国王的岁数——我从书本中得知，伽底斯那个地方有一个叫阿卡托尼乌斯的人，他当了80年的国王，活到了120岁。但是，在我看来，在某种有终点的东西中就不可能有什么长久。终点到来时，已过去

的一切也就流失了。只有你根据善行和正义追求到的东西，才能存在下去。的确，时间一秒一分、一时一日、一月一年地流逝而去，再不复返。随后而来的一切，我们又无从知道。因此，不管生命的期限多长，我们都应当满意了。对演员来说，令人满意的戏不是自始至终全都参加了演出的戏，只要在什么场次中扮演过角色，也会得到认可。对于聪明人来说也一样，他不用生活到最后一幕大家都鼓掌的时候。

一生的时间是很短的，但对善良诚实的过好一生是够长的。如果你能活得再长一些，你也不必像农民痛惜美妙春天时光过去，怨恨夏秋到来那样，悲伤不已。春天的确在某种意义代表着青春的意义，表明着未来的果实，尔后的季节则是适当的收获和采集果实。

诚然，老年的收获，就像我常说的那样，是对以前成效显著的生产的回忆和受益。事实上，合乎自然的一切都可视为美好的东西，什么比老年人的死更如此合乎自然呢？虽然人的本性反抗死亡，和死亡斗争，但这件事也会降临到青年人头上。因此、青年人的死在我看来，就像是烈火被大水浇灭，而对老年人来说如同心甘情愿一般，不用费任何劲，犹如火燃尽了也

就熄灭了。这就像树上结的苹果一样，未成熟时，只能用力摘下；长成熟和熟透了，会自然坠落。同样，青年人的生命是因暴力被夺走的，而老年人的生命是因成熟被带走的。这种成熟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我越来越接近死亡就好像在远航后看到了陆地，马上可以进港一样。

二十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终点，而老年却没有。只要你能尽应尽的职责，蔑视死亡，老年是可以很好度过的。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老年要比青年更勇敢刚毅、更坚韧不拔。梭伦对僭主庇西斯特拉特斯所作的回答也是这样的，当问及凭借什么敢那么勇敢地反对他时，梭伦回答“老年。”但是，当头脑和其他意识还未受到损害，由自然来毁掉她自己所建造的成果时，这样生活到终点是最好的。

就像船和建筑物由建造它们的人来拆毁是很容易的事一样，人由造就他们的自然来毁掉是最好的事了。新生的事物是不易毁掉的，毁掉陈旧的东西要容易得多。其结果是，老年人对残留的短暂生活既不能贪婪地奢望什么，也不能无故抛弃。毕达哥拉斯禁止人们没有统帅

的命令，也就是神的命令，而离开生命的驻地和哨位。哲人梭伦的墓志铭是，他不希望他的死不伴以朋友们的哀悼和悲伤。我认为，他实际是想要朋友们爱戴他。但是，我反倒觉得，恩尼乌斯说得更好：

不要用眼泪赞美我，不要把
葬礼弄得悲悲切切。

他认为死是不需要痛哭流涕的，因为死后将是永生。

人将死时可能会有某种感觉，这个时间很短，老年人尤为如此，此时或是有一种人们愿意有的感觉，或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这个问题应从青年期就应该开始考虑了，这样我们才能蔑视死亡。没有这种深思熟虑，谁也不能有平静的心情。人将死亡是必然的事，它没有固定的时间，每天都可能发生。

因此，一个人害怕死亡一时一刻的可能降临，他怎能维持平静的心情呢？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长篇大论是用不着的。这是因为我不但想到了那个救国捐躯的鲁·普鲁托斯、两个策马疾驰情愿迎死亡而上的德西乌斯、那个为了信守向敌人做的誓言而离家受刑的马·阿提利乌斯、

两个竟决心用自己身体挡住迦太基人前进道路的奇皮奥、你那个在不光彩的卡内城之战中用死来弥补战友鲁莽过错的祖父路西尤斯·帕乌鲁斯，以及那个死后连最残酷的敌人也不得不将其安葬的马·马尔西鲁斯，而且还想到了我们的那些军团（我在《起源》中对它们进行过描述），它们常常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开赴那个他们断定永远没有生还的地方。因此，青年人，不仅是未受过教育的而且乡下的青年人都鄙视的东西，有教养的老人要畏惧吗？

总之，在我看来，想贪求一切的人才贪生。孩童期有特定的追求，青少年时还应贪恋吗？进入青年期后人们有特定的追求，壮年，即人们常说的中年还应贪恋吗？这个年龄也有特定的追求，老年人是不需要的，而最后阶段的追求是属于老年的。因此，就像人生早期阶段的追求会失掉一样，老年的追求也会消失。当到了应失掉的时候，求全了生活带来死亡的时机也就到了。

二十一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们我自己对死亡的感觉。随着我离死亡越来越近，我觉得死亡对我显得更清楚可辩了。奇皮奥，还有你莱蒂乌斯，你

们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现在我甚至觉得他们还活着，而且只有他们那样的生活才配称得上是生活。因此，只要我们被禁锢在肉体的躯壳中，我们就会被迫尽到必要的责任，完成繁重的工作。事实上，灵魂是天赐的，它从最高处的寓所堕下后，几乎被埋没在地上，埋没在一个与其神圣本质和永恒性相对立的地方。但是，我相信，永生的神们之所以已把灵魂撒播在人的肉体之中是因为要产生这样的人，他们能保护这个世界，能在沉思冥想上天的秩序时，模仿那种生活的方法和恒常性来料理尘世。这种信念不仅是从推论和理性中产生的，而且还有最伟大哲学家的名望和权威的作用。

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可算得上是我们的乡亲，他们曾被称呼为意大利哲学家，我过去常听说，他们从不怀疑我们的灵魂是从宇宙神圣理性中分化出来的。另外，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一日关于灵魂不死的那些议论也曾对我有所启迪，他是阿波罗神的神谕宣布为最有智慧的人。还多说什么呢？我既这样说服自己，我就这样认为，灵魂如此敏捷、如此能熟记过去并洞察未来、如此多才多艺、如此有学识、如此有创造力，那么这种包含这些内容的本质是不

可能死亡的。同样，因为灵魂靠其自身而运动，它不会抛弃自身，其动力也不会有终止；另外，因为灵魂的本质是纯真的，本身中没有任何同它不一致和不相同的杂质，它是不可能分割的；正因为不能分割，它也就不能被消灭。人们生之前就有许多知识，也是一个有力证据，孩提时，他们学习很难的技艺，能够如此敏捷地把握无数的事物，这就表明他们不是初次接触，而是在追忆和回想。柏拉图的观点也大致是这样的。

二十二

据色诺芬记载，老居鲁士临死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最可爱的儿子们，不要以为我离开你们后，我就不存在了，就是无。即使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看不到我的灵魂，但是，它就在这个肉体中，你们从我所做的那些事情中可以了解到。相信吧，即使你们今后看不到它，它也在存在着。

“如果有名望的人在死后其灵魂本身不能使对他们的记忆长久保持，那么这些人的荣誉便不会持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说服我相信，灵魂在现世暂存的肉体中时是活着的，脱离它后就会死亡。我也不相信，灵魂离开没有

智慧的肉体后便失去了智慧。我只相信，灵魂从肉体的一切纠缠中解脱出来，变得更纯洁光明，这才能说具有了智慧。另外，当人的自然性质被死亡破坏之后，其各个部分如何散去是清楚可见的，它们全部回到了产生它们的地方。但是，唯有灵魂不管是在肉体中，还是离开了肉体，都是不可见的。你们一定看到，没有什么像睡眠那样更像死亡。

“人在安眠时，灵魂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它们的神圣本质。当它们得到解脱、得到自由时，它们会预测许多未来的情况。由此可以认识到，在它们彻底摆脱了肉体的桎梏之后，它们未来将如何。因此，如果这些情况是这样，那么，如敬神那样敬我吧！但是，如果灵魂和肉体一齐灭亡，你们因为敬畏那些保护和统治一切美好事物的神，也要虔诚不移地想着我。”这就是居鲁士的遗教。现在，如果你们愿意，我来谈谈我的想法。

二十三

奇皮奥，绝不会有人能说服我，让我相信，你的父亲帕乌路斯、你的两位祖父帕乌路斯和阿菲卡努斯、阿菲卡努斯的父亲、他的叔父，或是其他许多（没必要一一列举名字的）杰出人

物，如果不是凭借灵魂明辨了与自己有关的后世，他们还会如此努力奋斗，让后世能回忆起他们。下边我要按老年人的方法自夸几句，如果我的荣誉被生命划定了同样的界限，你是否认为我还会夜以继日、战时平时一样地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吗？你们是否认为，不用劳苦、不用费心受累、安闲清静地度过一生是更好的吗？但是，我不知道灵魂为什么在振奋时常常如此关注着后世，就好像它一离开生命，它就取得了最后胜利一样。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即灵魂不是永生的，那么伟大人物的灵魂也就不会努力地追求永恒的荣誉了。

为什么最聪明的人以最平静的心情去死，最愚蠢的人以最不安的心情去死呢？你们没有看到是有更好辨别力和更长远眼光的灵魂认识到死是一个更好的开端，而那种其洞察力较迟钝的灵魂则看不到这一点吗？诚然，我很急切地想见到你们的父亲，因为我曾敬重和依恋过他们。我不但渴望见到那些我曾认识的人，而且渴望见到那些我曾听说过的、读到过的和我本人为之著过书的人。当我开始这样做时，当然没有人能轻易把我拉回来，或像对培利阿斯那样用妖术使我返老还童；如果有什么神施恩于我，让我重新回到儿童期，到摇篮中去啼哭，

我坚决反对。我的确不愿意，在差不多跑完全程之后，从终点再被召回到起点。

生活到底有多少安乐？或者不如问，生活到底有多少艰辛？但即使生活有好处，毕竟它也还有满足或限度。我不喜欢对人生长嘘短叹，像许多人和一些有识之士常做的那样；我也不会悔恨我已走过的人生。因为我这样生活没有使我觉得枉来人世。但是，我离开这个人生就像是离开旅店而不是离开家，因为自然给我们的的是一个暂居的客寓，不是久居的处所。

啊，当我将启程去灵魂的神圣聚集地和集合地时，当我将离开混乱和污浊的世界时，那该是多么辉煌灿烂的一天呀！我不但将见到我刚才说到的那些人物，而且还将见到我的儿子卡托，没有人比他生性好，在孝敬老人方面更出众。他的躯体是我焚化的，其实相反由他来焚化我才是适宜的。他的灵魂没有抛弃我，而是不断期待我，无疑也会来到那个他看到我也会来到的地方。我显得很坚强地承受了这一灾难，不过心中却还是很难受的。然而我自己找到了安慰，我估计到我们之间的离别是不会很久了。

奇皮奥，正是根据这些情况（你说你和莱蒂乌斯常感到吃惊的东西），我认为老年是轻

松的，不但不令人烦恼，反倒使人愉快。即使认为人的灵魂是永生的这一想法是错误的，我仍甘心情愿有这样的错误；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愿除去这种令我感到快乐的错误。如果死后（如某些平庸的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我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那么我就不用害怕这些已死的哲学家竟讥笑我的这一错误了。虽然我们在未来不得不死，但是人适时死去是很称心如意的事。实际上，自然像为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为有生命的东西规定了界限。老年就像戏剧的最后一幕一样，是人生的结局。我们在过多地感到人生的倦乏后应全力避免继续活下去。

这就是我对老年的论述。我祝愿你们能活到老年，这样，你们能够根据经验事实验证你们从我这里听到的话。

论友谊^[1]

一

占卜者昆吐斯·穆蒂乌斯·斯凯沃拉常常兴致勃勃和一字不差地讲述许多有关他岳父盖修斯·莱蒂乌斯的故事。每次讲述时，他都毫不迟疑地称后者为“智者”。在我已能穿成人长袍时，父亲常把我带到斯凯沃拉那里，只要我愿意，他也允许，我就可以呆在这位老人身旁很久很久。其结果，我记住了他许多精湛的论点，以及许多言简意赅的言词，我渴望能变得像他那样更有学识。他死后，我又求教于大祭司斯凯沃拉，我认为可以称此人为我们国家品行最高尚、最富正义感的优秀人物。对此我后边还要说到，现在还是来谈谈占卜者斯凯沃

[1] 该文原标题为《莱蒂乌斯或与蒂图斯·庞勃尼乌斯·阿蒂库斯关于友谊的对话》。——译者注

拉。

在我记忆犹新的许多事情中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在家中照例坐在半圆椅上，我和几位好友也都在这里，他偶然谈到了那时人们都在议论的问题。阿蒂库斯，你和帕布鲁斯·苏尔皮西乌斯有许多交往，你一定记得这位民政官和当时任执政官的昆吐斯·庞培乌斯之间的刻骨仇恨吧，他忘记了他俩一起度过的亲密无间和友谊至深的生活，此事使人瞠目结舌、悲叹不已！

此时，当斯凯沃拉偶然提起这件事后，他向我们讲述了莱蒂乌斯对友谊的议论。莱蒂乌斯是在阿菲卡努斯死后数日对他、和像斯凯沃拉一样的他的另一个女婿，亦即乌库斯·法尼乌斯的儿子，盖修斯·法尼乌斯讲到友谊问题的。我还记得他谈话的要点，本书中我要根据自己的想法陈述他的这些观点。为了引出讲话者本人，避免反复说明“我说”或是“他说”，我将使谈话看上去像是大家在现场聆听一样。

你多次要求我就友谊问题写点什么，我也认为，这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这些亲密的朋友们关注。因此，我很愿意答应你的多次请求，公开讲一讲友谊的问题。

但是，在写给你的那本《论老年》，即《老卡托》一书中，我把卡托老人是当作主讲者处理的。这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讲述这个年龄的问题了，他本人是活得最长久的老人，并且他在老年时还具有他人无法相比的勃勃生气。同样，既然我们极相信祖先传下来的关于莱蒂乌斯和奇皮奥是至交的说法，我认为莱蒂乌斯是最适合的人，他的确论述过友谊，同时斯凯沃拉又正能够记起他的议论。

这种类型的议论，不知道为什么，借助有权威的老人，特别是有名望的老人之口，显得更有分量。因此，我读我自己的《论老年》时，有时就觉得好像是卡托而不是我在那讲话。诚然，就像上次是老人向老人讲述老年一样，这次我写的书也是最讲友谊的人向朋友讲述友谊。那本书里，卡托主讲，他比别人年龄都长，比别人都有学识；本书中莱蒂乌斯主讲友谊，他是智者（就像他所享有的头衔一样），以友谊为荣而出类拔萃的人。现在请你心里忘掉我一会儿，权且想作是莱蒂乌斯本人在说话。盖修斯·法尼乌斯和昆吐斯·穆蒂乌斯在阿菲卡努斯死后来看望他们的岳父。在他们的谈话开始后，莱蒂乌斯作答。他的全部议论都是关于友谊问题。随着读下去，你就会明白。

二

法尼乌斯：莱蒂乌斯，你说得对。那时的确没有人比阿菲卡努斯更好，或更德高望重。但是，你要考虑到，现在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他们称你为唯一的“智者”，并且认为你确实是。我们知道，这个称号不久前给了马尔库斯·卡托，在我们父辈的时代，鲁西乌斯·阿提利乌斯也被称作“智者”。但是，两种情况多少是有些区别的：阿提利乌斯有因为人们认为他精通民法，卡托是因为他在很多事情上经验丰富，他在元老院和广场讲演中表现出远见卓识和首尾一贯，而且他还能做出敏捷的答辩，因此，他在老年获得了“智者”这一尊号。然而，你有些不同，你被认为是智者不仅是因为品行和作风，更是因为勤勉好学和学问渊博。同样，给你智者称呼的人也不是无知百姓，而是受过教育的人。根据这种情况，在整个希腊，就是那些被称为七贤的人，在严格究其缘由的人们看来也没有一个属于智者一类。我们只承认雅典有一位智者^[1]，此人被阿波罗的神谕定为最有智慧的人。

[1] 指苏格拉底。

人们认为你的智慧在于这些方面：你知道你的一切应由你自己决定，你把美德看得重于人的机遇。因此，人们常问我，我相信他们也问过你，斯凯沃拉，你怎样忍受阿非卡努斯之死的呢？人们这样问是因为上个月7号我们像往常一样为占卜来到占卜者德西努斯·普鲁托斯的花园，而你却没有到会，你平素是最恪守这一天约会的，而且是最尽其责的。

斯凯沃拉：是的，莱蒂乌斯，就像法尼乌斯所说的，许多人也问过我。我是根据我所观察的情况来回答的，我说，当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和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死去时你会觉得悲伤的，但你能抑制住自己。你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不符合你的情感。这个月7号你没有出席我们占卜院的会议，其原因是有病，不是悲伤。

莱蒂乌斯：你回答得真好，斯凯沃拉，说得也很对。我身体好时，总是要尽这种职责的，我不会因遇到不幸的事而抛开它不顾，而且我认为，意志坚强的人不会因遇到某种不幸事情而影响他为公尽职。法尼乌斯，至于你说的那些归于我的优点，我没有感觉到，也不敢妄想。你这样说当然是出于友善，但是，我认为，你显得对卡托略欠公允。我相信，世上

或者根本没有智者，或者，如果有的话，只能是卡托。别的不谈，看看他如何忍受其子之死带来的痛苦吧！我还记得帕乌路斯，我也见过卡鲁斯，但他们的儿子是在小时候死去的，卡托的儿子则是在成年已赢得了声誉时死去的。因此，千万注意不要把你所说的被阿波罗神谕定为最有智慧的那个人置于卡托之上，因为卡托是因其所做受到赞颂，而那个人是因其所说受到赞颂。至于我自己（现在我要说给你们俩人听），下边我将讲到。

三

如果说我没有为对奇皮奥的思念所动，我这样做会是很正常的，聪明人也会这样看，但实在说来我是说谎了。我为失去的朋友如此感慨万分，因为我料定将来不会再有像他这样的朋友，并且我敢保证，过去肯定也没有过。但是我不需要吃药治疗就会减轻我的痛苦，因为我没有多数人常有的那种因朋友故去而犯的错误，我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宽慰。我想，再没有灾难会落到奇皮奥头上了，如果有不幸的活，也只是落到我的头上。对自己的不幸焦虑不安只能说明不是在爱朋友，而是在爱自己。

对他来说，谁能否认他所完成的辉煌功

三

绩呢？如果他不企求永生不死，而这又是他最不要的，那么人们希望做的一切他不都得到了吗？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公民就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成为青年后，由于非同寻常的优秀品质使他超过了人们的期望。他从未谋求过执政官的职位，但两次被推选为执政官。第一次当选时他还没到法定的年龄，第二次当选时，对他来说年龄虽然是适宜的，但对国家来说又显得有些晚了。他摧毁了两座与我们帝国为敌的城市，这不但结束了当时的战争，而且也排除了未来战争的隐患。关于他温文尔雅的品格，关于他对母亲的孝敬、对姐妹们的慷慨、对家人的慈爱、对其他所有人的平等相待，这些还有什么可谈的呢？你们当然一清二楚。殡葬时人们的悲伤也反映出全国人民对他是多么爱戴。因此，他再多活几年对他有何裨益呢？我记得卡托在临死前一年对我和奇皮奥论证说，老年并不使人焦虑不安，情况虽然如此，但老年毕竟还是夺去了奇皮奥所具有的精神。

因此，他的一生是既有机遇又有荣誉，什么也不缺。而且他的突然死去又免去了死时的感觉。关于死亡原因是很难讲的，你们也知道人们有种种猜疑。这些情况表明，奇皮奥在死前许多日子中看到了自己一生的卓著声名，而最

显耀的一天是他生命结束的前一天，当元老院散会后，元老们、罗马的民众、他的支持者和拉丁人在晚上把他送回家；这就犹如从最荣耀的台阶步入了更高的神的境界，而不是落入地狱。此外，我不赞成近来有人谈论的观点，即认为灵魂与肉体同时死亡，一切都因死亡而遭到毁灭。

四

我相信我们古代祖先的权威主张更有影响，这种主张认为应把敬神的仪式运用到死者身上，如果这些仪式被看作和死者毫无关系，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做那种举动了。我也相信古代这样一些人的主张^[1]，他们住在这块土地上，并在(当时曾兴盛一时，现在遭到毁灭的)大希腊地区用他们的风俗习惯和道德标准教化当地人；我也相信被阿波罗的神谕定为最有智慧的人的主张，他在谈论其他问题时并无定见，但始终认为人的灵魂是神圣的，并且当它离开肉体后，可以自由自在地返回到天府，哪个灵魂最有美德和最正直，哪个灵魂就最能平步直入天穹。

[1] 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张。

奇皮奥同意这一观点，就在他死前几天，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当菲鲁斯和马尼利乌斯还有你我及其他一些人在场时，他谈论了3天国事。每次争论到最后，他几乎总要涉及灵魂不死的问题。他还讲述了他在睡梦时听到老阿菲卡努斯说的话。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哪个灵魂最好，哪个死后就最容易像摆脱桎梏的束缚那样摆脱肉体的束缚，那么有谁能像奇皮奥那样有顺利通向神的人生旅程呢？因此，我担心，对他这样一种结局感到悲伤，实在是出于嫉妒，不是出于友爱。如果情况相反，灵魂与肉体同时死亡，那就没有什么意识可言，以致死时根本意识不到好坏。失去了好坏的意识，一个人也就变得如同他根本不曾来过这个世界一样。然而，我们很高兴，奇皮奥生在了这个世上，而且只有他还活着，这个国家才能感到欢欣鼓舞。

妹

所以，（正如我上面所说）他的一生是最完美的一生。而对我来说，情况就并非如此了，就像我早出生一样，如果我也早死的话，这对我才是公正的。但是，因为我和奇皮奥曾生活在一起，每当我回忆起我们的友谊，我就感到生活是快乐的。我们在国事和家事中都紧密合作，在罗马我们住在一起，战争期间我们共同

参战。我们在志向、追求和思想方面都极为情投意合，这就是友谊的全部本质所在。因此，像刚才法尼乌斯提到的关于我是智慧的传闻并不使我感到高兴，特别是这种传闻是错误的，我希望对我们友谊的回忆能够持久，这才是我的乐事。为此我常常想到的是，在一生中仅有三四对朋友，人们还能记起，而我希望奇皮奥和莱蒂乌斯的友谊能和他们本人一样，为后代传颂。

法尼乌斯：情况一定会如此的，莱蒂乌斯。但是，既然你提到了友谊，我们现在又闲暇无事，那么如果你能像往常一样，在被问到某些问题时，谈一下你关于友谊的论点，你对友谊的体验、你对友谊本质的考察以及你对友谊的定义，这会使我（我想斯凯沃拉也一样）倍感高兴的。

斯凯沃拉：我当然也会很高兴。法尼乌斯抢先问了我正准备问的问题。因此，请你给我们俩人以恩惠。

五

莱蒂乌斯：如果我本人觉得有把握谈论这些问题，我是不会推辞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引人注目的题目，并且如法尼乌斯所说，我们现

在也有时间来谈。但是，我是什么人？我有什么能力呢？这个问题通常是学者们的事，特别是希腊人的特长，当他们被问到问题时，不管问题提得多么突然，他们都能议论一番。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实践。因此，为了能够谈论友谊的问题，我想你们应求助于那些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人。我能提醒你们注意的只是，要把友谊看得比其他一切事情都重要，因为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中，没有什么比友谊更符合和更有利于人的天性。

然而，我首先体验到的是，友谊只能在好人之间存在。对此我没有像那些好辩论细微问题的人那样，做出精巧的定义。他们的辩论几乎涉及全部真理，但很少有实际的用处。他们就否认有没有智慧的好人。情况的确如他们所说，但是，他们所说的那种智慧，从来没有一个凡夫俗子能达到。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虚构或希冀的东西。我们的祖先断定盖修斯·法伯瑞西乌斯、马尼乌斯·库瑞乌斯和蒂伯瑞乌斯·考伦卡尼乌斯是智者，但我认为这些人根据那些标准也不是什么智者。因此，让他们坚持他们自己认定的那种智慧吧，坚持那种遭人怒斥和含混不清的定义吧。只要他们承认这些人是好人就行

了。但是他们连这点都不承认，他们否认不是智者的人可以给予这种称呼。

那么，我们只好用如常言所说的浅学拙见来议论一番了。我们所称的好人应以坚持忠诚、正直、公平和仁惠的原则来把握自己进行生活的人；摆脱贪婪、欲念和狂妄行为缠绕的人；并且对任何事情能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刚才所列举的那些人就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好人，我们的确有理由这样称呼他们。因为他们顺乎自然（尽人之所能），把自然作为完美生活的最好向导。我认为问题是很清楚的，正如我们天生生就那样，在一切人之间有一种相互的关系；人们彼此越接近，这种关系越紧密。因此，同一国家的人就优于外国人，亲戚优于陌生人。这样，自然相处本身就产生了这种友谊，当然这种友谊还不够稳固。在这方面友谊超过了亲戚关系，这是因为亲戚关系中可以有情感，而友谊中绝不能没有情感。没有情感，友谊从名义上就消失了，而亲戚关系还可维持下去。自然本身结合起来的人类关系是不确定的，这种关系被浓缩和聚集到很小范围内，以致只有两个人或几个人分享一切友爱情谊，这就不难清楚看出友谊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六

因此，友谊是在一切神圣的和人世间的事务中的志同道合，并且伴有情谊和友爱。我认为，除了智慧，永生的神没有在这之外再赐予人类以什么更好的东西。有些人看重财富，有些人看重名誉，更有许多人贪图享乐。最后一种情况只是反映了动物的欲望，前面几种情况反映的是颓废和幼稚，它们不是依赖于我们的谋划，而是依赖于盲目命运。还有人注重至善的德行，其意义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是他们所说的德行孕育和保障了友谊的存在，没有德行，友谊根本无法存在。

我们现在是根据日常生活中讲话的习惯来解释德行的，没有用学究式的语言冠冕堂皇评价此概念。我所列的帕乌路斯、卡托、卡鲁斯、奇皮奥和菲鲁斯这些人，人们一般都认为是好人，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令人满意的。至于世上实际找不到的那种智者，我们只好省去不谈了。然而，在上述那些人中间，友谊到底有多么大的裨益，我似乎也不能完全说清。

首先，如果朋友之间的情谊没有产生宁静和谐的气氛，那么恩尼尤斯所说的“真正值得

生活的生活”何以成为可能呢？对某人就像对自己一样敢于讲述一切，还有别的什么比这更惬意吗？对你的好运，如果没有别人和你本人一样感到欢欣鼓舞，你能充分享受它吗？对你的恶运，如果没有人能够为你更多地承受痛苦，恶运很容易将你压垮。人们贪求的其他东西只能适合于单一的目的，求财富为了享用、求权力为了体面、求功名为了荣誉、求娱乐为了开心、求健康为了防病祛灾，以及发挥身体的功能。但是友谊包含着许多内容。任凭你走到哪里，它都在你身边，在任何地方陪伴着你。友谊永远不会不合时宜、永远不会困扰你。我们之需要友谊，正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水与火一样。我现在讲的不是普通的或平庸的友谊（虽然这种友谊本身也是令人愉快的和有益的），而是真正的和完美的友谊。这种友谊只在少数人之间存在，他们因为有这种友谊而名扬天下。诚然，由于共享友谊能使顺利大增光辉，由于分担友谊能使失败减少打击。

七

由于友谊蕴含着极多的和极大的裨益，因而它比一切都优越，它能用美好的希望照亮未来，它能弥补心灵的创伤，或挽救心灵的堕落。

的确人们想起真正的朋友，就像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一样。因此，不在场者却随时都在场。贫困者也富有了，软弱者也坚强了，并且更难论说的是，死去的也还活着。这就是说，对朋友的崇敬、怀念和眷恋始终陪伴着人们。由于这些，死者显得很幸运，他们的生命得到颂扬。然而，如果在人的本性中取消了维系人的情谊，那么任何家庭或城市都不能建立起来，土地的耕种也难以进行。如果这一点还没有反映出和谐一致的友谊有多大的力量，那么可以从不和及争执来认识这个问题。无论一个家庭多么稳定，一个国家多么和平，只要存在仇视和争端，它们就没有不分崩离析的。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友谊有多么巨大的好处。

据说，阿格里真托有一位真正的哲学家^[1]曾用希腊六音步格的诗歌预言过，在事物的本质和整个世界，所以有持久不变的东西，都是因为友谊的凝聚作用；所以有动荡不安的变动，都是因为斗争的破坏作用。这个预言每个人都能理解，并且可以从实际变化中体会到。同样，无论何时如果有人不顾自己面对危险勇于站出来为朋友尽义务，谁不会对此大加

[1] 指恩培多克勒。

颂扬呢？我的客人和朋友马库斯·帕库维乌斯不久前写了一出新戏剧，当剧演到国王分不清哪个是奥瑞斯特斯^[1]，皮拉底斯说他是奥瑞斯特斯，并要代后者去死，而真正的奥瑞斯特斯也坚持自己才是这一幕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都站起来为这段虚构的情节欢呼喝采，但这要是真实情况，我们推想他们将怎样做呢？当人们自己不能做到某事时，他们可以对别人的事做出公正的判断，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很容易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至此，我觉得这就是我能讲到的全部关于友谊的想法。如果此外还有什么（我相信还会有许多）内容你们特别想知道，你们可以去问那些好议论此事的人。

法尼乌斯：我们虽然也常常去问那些好议论此事的人，听他们的议论也感到心悦诚服，但是我们更愿到你这里来，因为在你的讲演中我们能感到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

斯凯沃拉：如果你前几天到过奇皮奥的乡间别墅，听到过他关于国家的辩论，法尼乌斯，你还能多谈一些感受。他批驳了菲鲁斯精深的言词，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正义捍卫者。

法尼乌斯：最有正义感的人捍卫正义的确

【1】他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伽门农的儿子。

要容易得多。

斯凯沃拉：那么友谊呢？一个人最高的荣誉是以最大的忠诚、最始终一贯的精神和最公正的态度维护友谊，谁能比这样的人讲友谊更有权利呢？

八

莱蒂乌斯：你这样说是对我施加压力了。不管你们用何种方法强迫我，这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实在是强人所难。对于女婿们的诚心诚意要求，尤其这个要求本身又是件好事，拒绝既是很难的，又是不合适的。我越是经常思考有关友谊的问题，我越觉得有这样一点值得考虑：我们需要友谊是因为软弱和无助吗？正如为人效劳能受到他人恩惠一样，朋友间可以相互从对方那里得到他本人所不及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友谊所具有的特点了，但是友谊产生还有另一个最早直接来自自然的原因，它更古老、更美好。这就是爱情(amor)（即友谊一词amicita的词源），爱在相互交往的情谊中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友谊中我们无疑常常感觉到利益原则，它假借友谊之名只能在短时间内有用和发挥作用。实际上，友谊是容不下虚情假意的。因此，凡是友谊中包含的东西都应是

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如此说来，我认为友谊最初产生于自然本性，而不是缺乏什么才产生的；产生于伴有爱情感觉的同情心，而不是因为考虑到能占有多少利益好处才产生的。此种情况我们可以在某些动物那里观察到。它们在某段时间里对子女表示出爱，尔后从子女那里又得到同样的爱，它们的这种情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此种情感在人类中就更是随处可见了。首先是子女与父母间的爱；如果不是谁做了恶事，它是不会遭到破坏的。其次，在相同的情感产生爱情条件下，如果我们偶然发现他人具备我们认为适宜的生活方式和品行，我们会觉得在他那里看到了某种正义和美德之光。

没有什么比美德更可爱，没有什么比美德更能吸引人们去努力追求。的确，当某些人有美德和正义感时，虽然我们不曾见过，我们也有一种敬爱之情。即使有人没有见过盖修斯·法伯瑞西乌斯和马尼乌斯·库瑞乌斯，但他能不怀着爱戴和亲切之感想念他们吗？反过来说，谁又不厌恶骄横的塔尔奎尼乌斯、卡西乌斯和梅里乌斯呢？我们为了意大利帝国同两位统帅打过仗，他们是皮洛士和汉尼拔，一个因为是正直的，我们对他并不特别敌视；而另一个因

为很残暴，我们的人民一直对他痛恨不已。

九

如果公正的力量能使我们亲近不曾见过的人，甚至亲近敌人，那么，当这些与人们有亲密关系的人表现出美德和善行，人们的心灵萌生敬爱之情就毫不足怪了。除了承认爱的作用外，还应看到人们接受的利益原则、人们勤奋努力的品质，以及相互的亲密关系这样一些因素的作用。当这些因素与心灵和爱的最初冲动一块起作用时，令人惊异的博大情谊就会跃然而生。如果有些人认为友谊源于软弱，并且他们只是想通过友谊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么他们实在是把友谊看得太卑微和太低贱了，这正如我所说的，他们是希望友谊成为贫穷和匮乏的产物。

情况若是如此，凡是断定自己一无所有的人，就一定最讲友谊了，但情况远不是这样。一个对自己有很强自信心的人，一个为更多的德行和智慧强化了的人，是什么也不会缺乏的，他懂得一切都应独立自主，但正是这样的人，因愿意寻求和保持友谊而最为出类拔萃。难道阿菲卡努斯有求于我吗？一点都没有。对他，我同样也毫无所求的。但是，我因佩服他的德行而爱他，同样，他也因赞扬我的生活方式而

爱我。这样，彼此往来就产生了情谊。虽然随着友谊会带来许多好处和很大的利益，但它们决不是我们最初孜孜所求的东西。

正如我们乐善好施和慷慨大度那样，我们不会抛弃情谊(不会施恩图利)，我们有慷慨大度和友谊的自然倾向。想得到酬报的希冀不会左右我们，我们所渴望的是在情感之中享用有关情感的东西。

但是，那些在习惯上如牲畜一样以取乐为标准的人，当然对此会持有异议，这也是毫不足怪的。那些把自己的一切心思全用在卑劣和无聊事物上的人，不会推崇高尚的东西，不会尊重伟大的和神圣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不用谈了。现在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爱的情感产生于人的自然本性，充满情谊的爱产生于显现出来的正直行为。对于这种充满情谊的爱，人们总是在寻求它、追随它、不断的接近它，这样，在实际生活中就能够开始具有爱的情感，能够享用爱的情感。在相爱中人们是平等的，而且都偏重于奉献，而不是索取，在他们之间，只存在着这种高尚的竞争。这样，从友谊中可以获得最大好处，而且这种源于自然本性而不是源于缺乏感的本质才更有意义，更真实。因此，如果友谊是靠利益来维系，那

么某种利益上的变化就会毁掉友谊。但是，因为自然本性是不能变化的，所以真正的友谊才能持久不易。如果你们不想继续往下听了，我们就谈到友谊的起源为止吧！

法尼乌斯：莱蒂乌斯，请你继续讲吧。我也是替他提出这个请求的，我有这个权利，因为他比我年龄小。

斯凯沃拉：你说得很对。我们还是洗耳恭听吧！

十

莱蒂乌斯：最尊贵的人们啊，你们听听我和奇皮奥经常谈论到的关于友谊问题吧。他说过，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友谊能善始善终、至死不变。的确，有些事情常常对友谊起干扰作用，例如两个人有了不同的兴趣，或是在国家事务上有了不同的看法。他还常谈到人的生活方式有时因恶运、有时因年迈也会发生的变化。他借用了类似孩童时期情况的例子。孩童之间最强烈的爱通常会随他们换下孩童时期的服装而告终。

即使这些爱延长到了青年时期，但是，求婚和获取其他利益时，因为两人不能达到同样的愿望，冲突有时就会毁掉情谊。即使友谊超

越了那个时期，但因为两人将遇到竞争职位的问题，友谊也会常常遭到损害。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友谊的最大危害是贪图财富，在精英人物那里危害来自竞选官职和追求荣誉。由此，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会产生最大的仇恨。

当要求朋友作某种不该做的事时，如请求朋友帮他循私纵欲或者帮他伤害他人，也会产生很大程度的不和。不管提出的拒绝如何合情合理，那些被拒绝了的人总会攻击说，这背离了友谊原则，因为，凡是敢于请求朋友帮助做那些事的人，都敢于答应朋友的请求，为朋友去做一切事情。这样的相互怨恨不但常常损害长期的亲密关系，而且会导致永远的对立。奇皮奥说，他认为这些威胁着友谊的危险因素，在许多方面既需要智慧又需要好运气，才能彻底避免。

十一

基于上述情况，你们愿意的话，我们现在看一看爱的情感在友谊中应有怎样的界限。如果考瑞奥拉努斯有朋友，难道这些朋友应和他一起用武力来反对祖国吗？难道维斯利努斯或梅里乌斯的朋友们应辅佐他们篡夺王位吗？

然而我们也看到，底伯瑞乌斯·格拉库斯因

在国家制造动乱，遭到了昆吐斯·图伯尧以及同年龄的朋友们的抛弃。斯凯沃拉，你们家曾有个异乡客，从库米来的盖修斯·伯劳西乌斯，当时我在莱那斯和鲁庇里乌斯执政期间当顾问，他曾来找我，为格拉库斯求情。他本人提出请求宽恕的理由是，他对他太敬重了，后者求他干什么，他就可以为他干什么。我问他：“如果他要你去火烧卡皮托里乌姆山上的神庙，你也去吗？”他回答说：“他不会要我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他真要你做呢？”“我服从。”你们看，这是何等荒谬的言论啊！他的确这样做了，甚至比他说的做得还多。他根本不是听命于格拉库斯的鲁莽之举，而是引导他去冒险的，他根本不是格拉库斯疯狂活动的同伙，而是领导者。由于这些狂妄之举，他怕受到新的审判，他逃到了亚西亚地区，投降了敌人，最后受到了国家的严厉和正当的惩罚。因此，出于为朋友的原因而犯罪，绝不是什么犯罪的借口。既然友谊之交产生于对美德的正确认识，如果美德遭到破坏，友谊也就很难维持了。

如果我们认为，容忍朋友做一切要做的事，或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切我们要求的東西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要从理智上认清，这样做不会产生坏的结果。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这样一些

朋友，他们就是在我们眼前能看到的人，或是我们对其能有所回忆的人，或是一般生活中都曾见过的人。我们应该从这些人里选择例证，用最大努力挑选出那些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看到，帕普斯·艾米利乌斯是盖修斯·鲁西努斯的好友(通过先辈们知道的)，他们两次一起做执政官，并在督察院是同事。史记上还告诉我们，马尼乌斯·库瑞乌斯和蒂伯瑞乌斯·考伦卡尼乌斯当时与他们有极亲密的交往，而且他们俩之间关系也极密切。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中没有人曾强迫朋友做有悖于信义、有悖于誓约以及有悖于国家利益的事。我们敢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其中有人对他的朋友提出了请求，他也不会得逞的。他们都是最纯洁无暇的人，对这类事不管提出要求还是接受要求，都同样是大逆不道的。实际上，盖修斯·卡尔博和盖修斯·卡托也追随过底伯瑞乌斯·格拉库斯，虽然他的兄弟盖修斯那时没有这样做，但现在却成了最激进的支持者。

十二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把既不请求别人也不答应别人去做卑鄙的事情，作为友谊的一项原则。号称为朋友帮忙而做某些错事，特别是

有悖于国家利益的事，这只是一种卑鄙的借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法尼乌斯、斯凯沃拉，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地位，我们应当及早地预见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未来事件。祖先制定的风俗习惯现在已多少脱离了其正常发展的路线了。底伯瑞乌斯·格拉库斯试图篡夺王位，事实上他已统治了好几个月了。难道罗马人民以前曾听到过，或见过类似的事情吗？

他的朋友和亲属在他死后还忠实于他，但他们对帕布鲁斯·奇皮奥所做的事情，我提起来就要流泪。因为我们最近惩罚了底伯瑞乌斯·格拉库斯，但我们尽量维护了卡尔博。不过，盖修斯·格拉库斯做了民政官后，能期望到什么，这是很难预料的。革命开始时总是悄悄产生的，一旦形成后，会酿成迅速蔓延之势。你们知道，投票一端首先由伽比尼亚创为法律，两年后又由卡西亚创为法律，而愈来愈成为深重的灾难。我似乎看到，民众背弃了元老院，众人的心愿反倒左右着最重大的事件。现在，许多人似乎是要学会如何制造事端，而不是要学会如何制止它们。

我说这些话是什么目的呢？这就是，没有朋友帮助，就没人敢作乱。因此，我们应劝告好人，如果他们在不知实情的偶然情况下，结

交了某些朋友，在朋友做了有损于国家的事情后，不要顾虑对朋友所做的不背弃他的保证。对待坏人则必须制定惩罚的办法，对那些犯有大逆不道之罪的胁从者和首犯，惩罚不能有重有轻。在希腊，谁比狄密斯托克利更有名望、更有权力呢？他在波希战争中作为统帅把希腊人从奴隶状态下解救了出来。但由于个人间的嫉妒他遭到放逐，然而，他没有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容忍忘恩负义的祖国对他所做的不公正对待、他做了考瑞奥拉努斯 20 年前在我们这里所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成为他们反对祖国的帮凶，其结果，他们俩都是以自杀而告终。

因此，结党营私不仅不能以友谊为借口，而且还要受到一切严厉手段的惩罚。这样，人们就不会因不背弃朋友，而加入到向祖国宣战的队伍中去。然而，这类事情既然开始出现了，我现在就很难断定它们将来不会发生。对我们来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死后国家将来是否还能和现在一样。

十三

根据上述情况，友谊的第一原则就制定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为了高尚的事求助朋友，为了高尚的事帮助朋友，而且对此我们不要犹豫。

被动，而要积极主动、信心十足。我们还要真正敢于毫无拘束地向朋友进忠告。在友谊中朋友间的忠告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做出忠告时不但要明确，而且必要时还要很严厉，让对方必须接受。

我听说，希腊有些智者居然赞成我认为是完全荒唐的观点，当然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使他们在一切方面都能大发议论。其中一部分人主张，人们应避免过于亲密的关系‘这样可以阻止一个人为许多人焦虑不安。对一个人来说，自己的和与自己有关的事就已经足够应付一番了，再过多地纠缠在别人的事情里太令人生厌。最合适的方法是友谊维持得越松弛越好。这样，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随时亲密些，或冷淡些。幸福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无忧无虑，如果一个人总是为许多人操心受累，他的心灵就不能得到安宁。

还有一些人赞成更不合乎人性的观点（我在前边已简略地介绍过）他们说，人们追求友谊是因为想得到庇护和帮助，不是因为情感和情谊。因此，身体越弱、个性越少的人，越渴望得到友谊。其结果是，娇弱女子比男子更渴望友谊的庇护，穷人比富人、不幸的人比那些被视作幸运的人更需要友谊。

噢，这是多么高深的理论呀！他们似乎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把太阳摘走那样，把友谊从生活中拿走，而这些是永生的神所给予我们的最美好和最让人向往的东西。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表面上看它很有诱惑力，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它应遭到摒弃。因为你感到焦虑不安，就不能去从事正义的事业，或不敢进行下去，或不做努力，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我们避免操心受累，实际上我们是在躲避美德，因为美德必然使人们操心受累，它要让人们不断地排斥和抛弃与其对立的事物，例如用善行排斥恶行，用节制有度排斥恣情纵欲，用勇敢排斥懦弱。由此你可以看到，有正义感的人对非正义的事最感痛恨，勇敢的人对软弱无能最感痛恨，有节制的人对伤风败俗最感痛恨。因此，有德行基础的灵魂的最大特点是乐善嫉恶。

如果一个智者的心中感到精神痛苦（只要我们断定他心中的人性还没有完全丧失殆尽，他就必然有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不想承担忧恐苦恼而从生活中彻底消除友谊呢？如果情感被取消了，且不说人与动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人与石头、木头或类似的东西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另外，我

们不能听信美德就是使人具有铁石心肠这种说法。美德在许多事情中，特别在友谊中，会使人多情善感、温良柔顺，对朋友的善行会感到心情舒畅，对朋友的恶运会感到忧心忡忡。经常为朋友做事会带来苦恼，但苦恼不会那样不堪忍受以致使我们要在生活中取消友谊，这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美德会导致某些忧虑和苦恼就摒弃它一样。

十四

我前边说过，当美德的重要意义如此深入人心以致相同的心灵趋向并聚合在它周围时，友谊就产生了。友谊产生后，也就必然产生了情感。因此，对许多空虚的东西，如职位、名誉、高楼大厦和身体的服饰，具有十足的兴趣，而对具备美德的能够爱和报答爱（如我所言）的心灵却感到兴味索然，这是再荒唐不过的事了。实际上，世上最大的快事莫过于相互的情谊、相互的关心和帮助。

如果附加一点意思，我可以公正的补充说，任何能吸引他物的东西也没有像志趣相同的友谊那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好人喜欢好人，好人之间能像以血缘关系联起来的亲戚那样彼此相处，这一点我们完全相信是真理。因

为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最渴望求得和自己相似的东西。故此，法尼乌斯，斯凯沃拉，我猜到，好人之间存在着美好的情谊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实，它是由自然本性形成的友谊的源泉。当然，同样的情谊还存在于许多方面。世上不存在使人失去人性，逃避现实和自高自大的美德，美德要保护普天下的百姓，要尽其可能照顾好他们的利益。如果美德背离仁爱原则，藐视普通民众，那就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

另外，我仍认为，那些根据利益原则来看待友谊的人，是抛弃了联结友谊的最宝贵的东西。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利益好处，不应比朋友的爱能带来更多的快乐，从朋友那里得到的好处只有附属于爱和情谊，它才能带来快乐。说友谊因为缺乏什么而得以建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实际上正是那些最有财力、最富裕和最有美德的人，正因为他们有美德才保住了财产和富裕，才什么也不缺，才最慷慨大方、最乐善好施。当然，我并不认为，朋友之间在某些方面相互帮助有什么不好。如果奇皮奥在国内和国外问题上不需要我的建议和合作，我的热情到哪里去表现呢？因此，不是友谊随利益而产生，正相反，利益随友谊而产生。

十五

如果沉湎于娱乐中的人谈论关于友谊的问题，他们的话是万万听不得的，他们对友谊既没实际体会，也无正确的认识。我们可以对天发誓，谁愿做这样的人：生活在一切应有尽有的物质财富之中，而不要爱什么人或从什么人得到爱？这实际上是暴君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没有信念，没有仁爱，没有始终如一的情谊能够得到保证，一切都是猜疑不定和焦虑不安，友谊根本没有可能存在。

谁能爱他畏惧的人，或他认为畏惧他的人呢？当然，他们有时也能偶尔得到假装出来的友谊。但是，一旦他们大势已去（就像他们大多数人遇到的结局一样），他们就会清楚认识到，他们的友谊是如何地不堪一击。他们用塔尔昆在流放时所说的话表明了一种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当他已不能给予任何人以恩惠时，他才看出来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虚伪的朋友。但对于这样一个飞扬拔扈、冷酷无情的人，我始终怀疑他是否真有朋友。

塔尔昆具有我上面说到的这样品行，因此他是不会有真正朋友的，同样，过多的权势也会排斥忠诚的朋友。不但幸运本身是盲目的，而

且它使许多喜欢和享用它的人也都成了盲目的。这些人由于傲慢和固执几乎要忘乎所以。世上没有人比交好运的傻瓜更不可容忍了。我们经常看到，过去一向和蔼可亲的人，一旦得到权力、职位或成功，会改变其态度，抛弃旧友，结交新友。

许多有财富、有能力和有权势的人用其钱财购置一切可购置的东西，如马匹、奴隶、华丽的衣服和珍贵的器皿，但他们不去结交朋友。而我认为后者才是生活中最崇高和最美好的补充。对这些人来说，谁还能比他们更愚蠢呢？当他们购置那些东西时，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为谁购置，不知道他们在为谁操劳，因为他们的东西最终将属于胜过他们的人。但是，友谊将稳固地与你同在，并且不可置疑地属于你。即使那些犹如幸运恩赐的东西能够长久属于你，但没有朋友和抛弃朋友的生活不会是快乐的。这些就不用多说了。

十六

我们现在来规定一下友谊的范围，并划出它的界限。关于这一点我看到有3种主张，但我都不赞成。第一种，我们应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朋友；第二种，对朋友的情谊应相应于和

相等于朋友对自己的情谊；第三种，他怎样对待自己，作为朋友就应怎样对待他。

我对上述3种主张一点不敢苟同。就第一种来说，以那种方式对朋友表示感情显然是不对的。不是有许多事情我们没有为自己去做，而为了朋友我们却做了吗？有时要恳求甚至是哀求身分低贱的人，有时要尖刻地指责或激烈地抨击什么人，如果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样做是很不适宜的，但为了朋友似乎成了最合适不过的事。在很多情况下，为了让朋友而不是自己更有利，高尚的人会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忍痛割爱。

第二种主张把友谊规定为义务和情感的等价交换。这种主张是把友谊贬低为斤斤计较和微利必求的算计，贬低为要达到收支相等的交易。然而真正的友谊应看上去更富有、更慷慨，而不能恪守不多给、不少得的原则。不要怕多付出了代价，怕白费了精力，怕为友谊做出了过多的贡献。

当然，第三种主张提出的规定，即朋友怎样对待他自己，我们就怎样对待他，这是最为恶劣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感到心灰意懒，或对努力改变命运的前途感到渺茫，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朋友就不能像此人对待他自

己那样的对待他。相反，要尽力而为去激励朋友克服低落的情绪，并引导他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和更积极的认识。这样，我们要为真正的友谊提出另外一些界说。但首先，我要提一下奇皮奥最痛恨的一种通常的看法。有人曾说过，应该像会恨那样去爱，奇皮奥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没有人会像此人这样说出如此仇视友谊的话。同时，他也不敢让自己像一般人那样相信，这是毕亚斯的看法，因为毕亚斯被认为是著名的希腊七贤之一。他相信，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定是个无耻之徒，或是野心勃勃的人，他要把一切都变为他随心所欲的东西。如果他认为他们将成为仇敌，他们又怎能成为朋友呢？要不就是他希冀和盼望朋友尽可能地多犯错误，这样他可以掌握更多的把柄来指责对方。不仅如此，也许朋友的正确行为和得益会引起他的烦恼、痛苦和嫉妒。

因此，这种训告，不管是谁倡导的，完全是抛弃友谊。我们制定的原则是，我们一开始就不去爱那些我们有一天可能会恨的人。如果在选择朋友时没有那么幸运，我们也要像奇皮奥过去说的那样，宁可接受这个现实，也不要为仇恨之日的到来思虑重重。

十七

我认为对友谊应用这样的界说，即朋友们的品行应是纯洁的，他们之间在对一切事物、一切主张和一切情感方面无一例外都应是一致的。即使不幸的事发生了，朋友们的正确情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为此他们的地位和名誉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为友谊做些让步，但让步要以不会引出更大的罪恶为前提。出于友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宽容朋友，但名誉不能不顾，不能把民众感情看作是处理一切事情中的无所谓的成分，当然用哗众取宠和忍辱逢迎争取民众是卑鄙的。因为有美德才能有情感，所以我们断不能摒弃美德。

现在还是回到奇皮奥的看法上来，他对友谊有全面的论述。奇皮奥常抱怨说，人们对一切事情都很尽心尽力，以致能具体说出自己有多少只山羊、绵羊，但说不出自己有多少朋友。在处理那些事时他们用尽心思，而在选择朋友时，却是漫不经心。他们在判断哪些人作朋友合适时，没有相应的标准和例证。然而，我们应选择那些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和忠诚可信的人做朋友。这类人当然是极少的，如果不考验一下，判断谁是朋友的确是很难的，而考验又

只有在友谊的发展中进行。因此，友谊常常出现在我们能进行判断和考验之前。

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我们可以像驾御马车一样，驾御情感的冲动。用马之前我们总是要先试一试，对友谊也是一样，我们要从某些方面考验朋友的品格。常常通过很小的金钱问题我们就能看出友谊是否牢固。有些人不为少量的金钱所动，但他们会被大量的金钱所动。即使我们能找到一些视金钱高于友谊为丑恶的人，但我们到哪里去找那些不把荣誉、官职、特权、权力和权势放在友谊之上的人呢？当人们被置于这些东西和友谊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到哪里去找那些并不选择这些东西的人呢？人的本性是很脆弱的，总是依附于应该被轻视的权势。在人们为了附炎趋势而轻视友谊时，他们断定，因为他们是为了更大的原因而轻视友谊的，所以这种过错是可以被遗忘的。

因此，真正的友谊在那些追求荣禄和从事政务的人中是很难找到的。在这些人中你们能找到希望朋友先于自己荣升的人吗？这些且不提，就是大多数人在朋友不幸时能去看望朋友，又是多么不情愿和多么困难的事呀！屈尊和这些人来往的人更是鲜为人知。虽然恩尼尤斯说得很好：“不稳定的境遇，见稳定的朋友”，但

大多数人在下述两种情况下表现出轻言、失信和意志薄弱，一是在得意时轻视朋友，一是在朋友不幸时离弃朋友。

十八

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最能表现出一个人对友谊是否稳定，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认为他们是真正出类拔萃的人，甚至就是神。在友谊中探寻这种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精神的基础，是忠诚。不忠诚也就不可能始终如一。此外，选择朋友时，我们应找那些纯真、随和及意见相同的人，也就是对事情与你有同样感受的人。这些品质和忠诚有关，生性复杂多变的人是不会忠诚的。同样，对同一事情和你没有同样感受的人也是不会忠诚或始终如一的。还可以补充说，我们所选择的朋友不应该以攻击或非难别人为乐，不应该相信那些攻击或非难之辞。所有这些都和我一直在讲的始终如一的精神有关。因此，正如我在开始时说，除非在好人之间，友谊是不可能存在的，这话是完全正确的。好人（也可以说有智慧的人）从两个方面维护友谊：第一，不虚情假意，也不伪装欺骗。毫不遮掩的憎恶，比用装模作样掩盖情感要高尚得多。第二，不

但不相信别人对朋友所作的非难，而且要对朋友坚信不移，不要常常疑心朋友做了什么错事。

此外，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绝不是一般的增加友谊的乐趣。虽然忧郁和在一切事情上严肃认真有其庄重性，但友谊应更随和一些，更无拘无束一些，更温和一些，以及更倾向于温柔和宽厚。

十九

这里存在着一个略显困难的问题，从友谊方面说，新朋友真的能超过老朋友，就像我们通常喜欢小马而不喜欢老马那样吗？人们提出这种疑虑是很可耻的。友谊决不像其他东西那样愈长愈令人生厌。长久的友谊（就像保存长久的酒一样）更应该甜美。有一句成语说得很好：长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才能有莫逆之交。

新的友谊，如果是有收益的希望，就会像不使人失望的幼芽一样，结出果实，我们不应放弃它。当然，旧的友谊更应该有其应有的地位。久远的和习惯了的交情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马的例子一样，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喜欢驾驭惯用的马，而不是未经驯服过的和新的马。习惯的作用不仅适用于

这类有生命的东西，也适用于无生命的东西。不管一个地方是多么偏僻荒凉、山高林深，只要住久了我们也会喜欢它。

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和处于地位低下的人应平等相待，这是友谊中最重要的一点。极优秀的人物常常就是这样，奇皮奥就是我所说的这类人中的一个。他从不盛气凌人地对待菲鲁斯、鲁庇里乌斯或茅米乌斯，也不盛气凌人地对待地位比他低的朋友。他的哥哥昆吐斯·马克西姆斯虽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但决不能和他相比。即使如此，奇皮奥还是因为哥哥长于他而把他敬为比他强的人。奇皮奥还愿意尽其所能地宣扬所有朋友的优点。

这些每一个人都应努力仿效。这样，如果谁有了卓越的美德、智力和好运，就应该与亲戚朋友分享，彼此进行交流。如果知道自己出生寒微，天赋很差，运气也不好，就应增加父母亲戚的能力和财力，提高他们的地位和身分。这就像有些故事讲的，有些人曾一度生活在奴隶状态下，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和家世，一旦他们知道了，发现自己是神的或国王的儿子，他们应仍然爱着多少年来认为是牧羊人的父亲。对于真正的父母和肯定无疑的亲生父母来说，就要做更多的事了。天赋、美德，以及其他一

切优点，只有在奉献给亲近的人以后，才能获取最大的成功。

二十

就像在友谊和亲属关系中地位优越的人应平等对待地位低下的人一样，后者也不要因朋友天赋、运气和地位方面超过了自己而自惭形秽。有许多人常常埋怨什么，甚至怨恨什么，如果他们自认为用了极大的热情和友情，为朋友的成功付出了辛苦，尤为如此。念念不忘自己为别人所作的辛苦的人是令人生厌的，固然受益者应时常想起这些，但帮助人的人却不应该总想着这些。

诚然，那些地位优越的人在友谊中应该屈尊一些，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抬高了地位低下的人。还有人因认为自己受到了蔑视而使友谊陷入了困境。对于那些自己认为受到蔑视的人来说，情况也许真的会变坏，因此，我们要从言语和行动上消除他们这种自卑感。

为他人做奉献，第一你要尽心尽力去做，第二，他要尽心尽力地去承受。这是因为，不管你怎样出类拔萃，你也不能把所有的朋友都提拔到最高的职位上去。奇皮奥就是这样，他把帕布鲁斯·鲁庇里乌斯推选成了执政官，但

他不能把他的兄弟鲁西乌斯也推到这个位置上。即使你能够授与任何人东西，你也要留心，看看他是否有承受的能力。

你们在天赋和年龄进入成熟和稳定时期后，就会对友谊做出判断。孩童时期不是这样，当儿童热衷于打猎和玩球时，他们可以把所有爱好同样事情的人都看做是好友。以此方式，他们还对乳母和送他们上学的家奴公开表示友好的情感。这些人当然不应受到怠慢，但他们毕竟是在不同的方式下培养起来的。因此，不成熟的友谊是不能稳定持久的。不同的品格导致不同的兴趣爱好，这些区别会使友谊解体。好人不和坏人为友，坏人不和好人为友，其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极不相同的品格和极不相同的兴趣和爱好。

友谊中还有一点，也应注意，这就是不要让过分的情感（如它反复表现出来的那样）妨碍朋友去得到更大的利益。内奥普托勒姆斯（我要重提传说中的故事）如果要是听了养育他并用泪水阻止他前进的利考梅底斯的话，就不能攻克特洛伊了。有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常常要使朋友们相别离，那种不堪忍受别离的人，其天性太脆弱、太多愁善感了，这种情况使他不能正确地发展友谊。因此，在一切事情上都

应考虑到你要求朋友的事和在一定范围内朋友要求你的事是否正确合理。

二十一

友谊中也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灾难，这就是绝交。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针对一般人的友谊而言，不包括智者之间亲密无间的友谊。人们的罪过常常突然表现出来，这会影响到朋友，也会影响到其他人，而他们的耻辱也会殃及朋友。这样的友谊应该让它渐渐消亡，并且像卡托说的那样，是渐渐断绝而不是骤然决裂。但是，如果突然爆发了不可容忍的伤天害理的事，而且这种事又是特别的丑恶和卑劣，根本不能改正，那么立即疏远和绝交就是所能做的最好选择了。

但是，品格和旨趣总会发生改变（就像通常有的那样），或者党派利益也会引起人们彼此间的不和（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我现在谈论的是普通人的友谊，不是智者的友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既不要舍弃友谊，也不要存留仇恨。没有什么比与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相互攻击更耻辱的了。奇皮奥（如你们所知）出于我的名义和昆吐斯·庞培乌斯断绝了友谊，而且由于政见的不同疏远了我的同事梅台鲁斯。

他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很有风度，没有招致对立的情绪。

因此，首先要做的事是不要使朋友间产生隔膜，一旦偶然有了某些矛盾，似乎最好是让友谊自然消亡，而不要断然绝裂。另外，还要留意，不要使友谊转变为极大的仇恨，因为从这里会产生争吵、谩骂和侮辱。在这种情况下，能忍受的，就要忍受，对旧日的友谊总还要表现出敬重之情，这样人们就会看清是伤害的人错了，而不是受到伤害的人错了。总之，有一种唯一能警惕和预防这些错误和悲剧的办法，这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轻率地表露感情，也不要向不相称的人表露感情。

友谊中相称的对象是那些本身具备受人敬爱的品质的人。这样的人很少（当然一切美好的东西总是稀少的），而且在世界上寻找其自身在一切方面都完善无缺的东西比做任何事情都难。但是，大多数人只把有利可图的东西看做是人生中的好东西，因此朋友就像牲畜一般，他们能够希望从那里得到最大的利益，他们就对他们表现出最大的爱。

大多数人在最美好和最自然的友谊中，除了友谊本身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是最应渴望得到的。他们也没有在自己的友谊中体验到友谊

力量的实质和作用。对于人的自爱来说，只是自己爱自己，并没有想从自爱本身中得到酬报。如果这种情感不在友谊中推而广之，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出现的。真正的朋友应是另一个自我。

在动物中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什么动物，空中的、水里的、陆地上的，是驯化的还是野生的，首先是爱它们自己（事实上，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同样生来如此），其次是寻求，甚至是贪求依附于和它们同类的其他动物。这种情感伴随着渴望，非常类似于人类的情感。如果动物都有这种情感，人也在自爱的同时寻求能和他的心灵结合在一起的心灵，那么根据人的本性，这种情感将会成为什么样子？能够使两条心合为一条心吗？

二十二

但是，大多数人毫无道理，我不说他们无耻，竟希望朋友能够成为他们自己不能够成为的人，渴望朋友做出他们自己不愿做出的奉献。然而，最公允的办法是，首先自己成为有美德的人，然后寻求与己相同的他人。只有这样，我们议论的那种稳固的友谊才能建立。同时，用情感结合起来人们必须首先抑制正在支

配着别人的那些贪欲，其次乐于公平合理地行事，彼此乐于承担对方的一切担子。如果不是名誉、不正确的事，不要请求对方去做，双方不仅要彼此相亲相爱，而且要互相尊敬。友谊失去了敬意，就失去了最美好的东西。

因此，那些认为因为有了友谊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放纵和做坏事的人是极端错误的。自然赋予我们友谊，是让它服从美德，而不是让它帮助罪恶。因为美德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它只有和他人联合起来，相互为伴才能获得成功。这种现在、过去，以及将来还会伴随美德的东西，我们可以认为会伴随美德达到自然中最完美和最崇高的至善境界。

因此，（我要反复强调指出）你要先判断，再开始钟爱；不要先钟爱，再进行判断。但是，我们因在许多事情上忽视判断而受到了惩罚，在选择朋友和与朋友相处中此种情况尤甚。我们弄乱了谋划和行动的关系，违背了老辈人的教训。无疑，长时间的相互利用和相互承担的义务可以一次再次地使人们纠合到一起，但这种友谊在发展过程中突然遇到某个事件的冲击会顷刻崩溃。

二十三

因此，在与朋友相处的问题上漫不经心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友谊在人类事务中是唯一被所有人一致看作是有用的。就是美德本身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轻蔑，他们把它说成是招摇撞骗和自我炫耀。许多人轻视财富，他们以少量的财产为满足，以粗茶淡饭为快乐。对待权位也是这样，有人疯狂地渴望它，而许多人却蔑视它，仅把它看成是最虚幻和最庸俗的东西。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事物，有些人认为值得羡慕，而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但对友谊，所有人都有一致的看法，不管是那些忙于政务的人，还是那些以学习知识和研究理论为乐的人，还是那些安于为私事奔忙的人，以及那些整人身心都沉湎于享乐的人，只要他们想过某种高尚和有意义的生活，他们都觉得没有友谊根本不能称其为生活。我不知道友谊如何悄悄地渗透到一切生活中来，但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受到它的影响。

即使有人如此粗暴待人、傲慢无礼，以致逃避和憎恶与人往来，如我们都知道的雅典的蒂蒙曲那样，他也忍受不了多久，还要找人至少发泄一下他的刻毒。如果神有可能把某人带

离人们居住的世界，把他放在某个完全孤寂的地方，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神在那里可以供给他一切他本性欲求的东西，一切充足的东西，只是剥夺他同任何人交往的权利，谁会有如此铁石心肠，能够忍受这种生活呢？谁不会因孤独感而要失去对一切乐趣的热情？

因此，塔兰图的阿尔西塔说得很好，他的话好几代人都在传诵，我是从长辈人那里听来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升到上天，看到世界的自然景象和星辰的美丽壮观，他对此会感到惊异，但不会感到快乐，只有当他能向什么人讲述他的所见，他才有最大的快乐。”因此，人生来就是不喜欢孤独的，总要依靠别人的扶持，这种扶持只存在于最亲密的朋友之中。

二十四

虽然自然用如此多的迹象表明了她的愿望、要求和希冀，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好像耳聋了一样，浑然听不到她的劝告。友谊的运用是各种各样的，有着多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会导致猜疑和冲突，有理智的人要不时地设法避免、排除或容忍这些矛盾。在友谊中维护真理和真实性会引起某些冲突，但这种冲突我们是要

正视的。的确，朋友间也需要有劝告和责备，只要从善意出发的，我们就应友善地接受。

我的一位朋友在《安德瑞阿》这个剧中曾多少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

“恭维生挚友，直言致冤仇。”

如果从直言中产生的的确是恶感（的确能毒害友谊），那么直言是件坏事，但是，恭维服从是更坏的东西，因为它使朋友沉湎于罪恶之中任其堕落。因此，那些不听直言，而喜欢恭维欺骗自己的人，实在是犯了最大的错误。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要自始至终谨慎小心从事，首先，劝告时不能刻薄，其次，责备时不能鄙视。在恭维问题上（我宁愿用特兰斯的这个词），虽然礼貌待人是需要的，但阿谀奉承只会有助于罪恶，我们应远离它，不但朋友之间，而且自由人之间，阿谀奉承都是不该有的。和朋友相处应该完全不同于和暴君相处。

如果一个人闭耳不听直言，他便不会从朋友那里听到真理，这样，他的安全就毫无希望了。卡托说过许多警世之言，这一句也是很有道理的：“刻毒的敌人比那些表面合意的朋友对人更有用处，前者说的常常是实话，而后者

从来不会讲实话。”但是事情总是很荒唐的，那些受了责备的人，往往感受不到应该感受到的忧虑，而是感受到与忧虑无关的忧虑。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没有痛心疾首，反倒对受到的责备耿耿于怀。实际上情况应正相反，人们应为自己的错误而痛苦，为改正错误而高兴。

二十五

真正的友谊既能容忍朋友提出的劝告，又能使自己接受劝告，提出劝告的人要直言不讳，不要尖酸刻薄，接受劝告的人要虚心领受，不要有抵触情绪。友谊中存在的最大祸害是阿谀奉承、曲意迎合。品质很差和欺诈的人可以为取悦于人说尽好话，但他们不会说真话，尽管他们可能有千般理由这样做，但这毕竟是昭然若揭的罪恶。

在一切事情中，虚伪也是很恶劣的（它破坏和剥夺我们对真理的正确判断），所以它对友谊危害最大。虚伪破坏诚实，而没有诚实友谊就不会有其真正的意义。友谊的力量表现在：把许多人的心变成一条心，但如果每一个人在心中各有打算，心界各不相同，而且复杂多变，那种心心相印的友谊怎么能实现呢？

善变不定、曲折错综的东西无过于这样一

种人的内心，他们不但随他人的意志和情绪而变，而且靠察颜观色而变。

“有人说坏，我就说坏；有人说好，我就说好。最终我要命令自己附和他人说的一切。”

这是特兰斯的话。但他是通过剧中尼亚托这个人物说的。诚然，和这样一类人结为朋友，友谊是不会长久的。

即使人们有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好运和更大的名望，只要还有许多人像尼亚托一样，把权威和虚伪结合在一起，不厌其烦地迎声附合会成为真正的危险。

然而，只要我们谨慎从事，完全能够从真正的朋友中区分和辨别出虚伪的朋友，这就像能从真正的和实在的东西中区分出虚假的东西一样。公众集会，虽然由最无学识的人组成，但常常可以辨别出乌合之众和稳定持重的人，前者是应声附合和虚伪的市民，后者是严肃认真和坚定稳重的市民。不久前，盖修斯·帕比瑞乌斯曾用曲意逢迎之词迷惑过集会民众的视听，他想让人们通过民政官可以连任的法律。我是反对他的，但有关我自己的情况我就不谈

了，我要更多地谈谈奇皮奥。

天啊，他在讲话时是何等的稳重、何等的高贵呀！你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是罗马民众的领袖。你们当时在场，演讲辞现在也到了你们手上。这项旨在迎合民众的法律最后被民众选举否决了。现在，回过头来讲讲我自己。你们还记得，在奇皮奥的兄弟昆吐斯·马克西姆斯和鲁西乌斯·曼西努斯任民政官时，盖修斯·鲁西尼乌斯·克拉苏斯提出的有关祭司的法律，显得多么迎合民意。他提出，选举祭司的权力应从小团体下放给民众。正是这个人开创了讲话时面向民众的先例。但是正由于我的辩护之辞，对神的敬畏才轻而易举的胜过了他哗众取宠的演说。此事发生在我当司法官的时候，也就是我被推选为执政官前5年的事。此次成功的原因更多地是由于我捍卫了事情本身中的真理，而不是我有更高的权威。

二十六

在集会的讲台上很容易出现许多虚假和伪造的东西，如果在这样的讲台上真理仍有影响（这要靠人们揭示和阐明它），完全以真实性为标准的东西在友谊中有什么作用呢？在友谊中如果你看不到朋友坦荡的心，以及向朋友敞开

你坦荡的心，你就不会相信和确认任何东西。你不敢去爱，也不敢被爱，因为你不知道爱是否是真实的。然而，这种阿谀逢迎不管多么有害，实际只能伤害那些接受它和以它为乐的人，不能伤害其他任何人。事实往往如此，那些本身最喜欢听信阿谀逢迎之辞的人，就是那种最喜欢逢迎自己的人，最爱自鸣得意的人。

诚然，美德是自爱的。她对自己有最深刻的理解，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多么可爱。但是，我要讲的不是有关美德本身的性质，而是对美德的态度，许多人根本不是想具备美德本身，只是想让人家觉得他们有美德。正是这样的人最喜欢阿谀逢迎。当他听到那种虚假的和取悦于人的言辞时，他当真认为这种空洞的话就是自己功绩的证明。只要有人不愿听真话，有人时刻准备讲假话，真正的友谊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好虚荣的武士，戏剧中靠阿谀逢迎而寄生其门下的小丑也就不会使我们觉得好笑了。

“塔依斯是十分感谢我吗？”

回答“是十分感谢”已经足够了，但他却说：“万分感谢。”阿谀者总是要突出听话者想要听到的

大话和美言。

因此，不但那些追寻和招引阿谀逢迎的人受着阿谀和虚假之言的左右，就是那些稳重和意志坚定的人也要分外小心，留神不要做了狡诈的奉承的俘虏。只要人们不是愚蠢到了极点，谁都可以对公开的献媚有所认识。但对那些狡诈和隐蔽的献媚，我们要时刻注意，不要让它渐渐地动摇了我们的心。认清这些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实际上他们常常是用提出反对意见的办法来迎合你。为了取悦你，他假装和你争辩，最后认输，承认你的胜利。这样，你被蒙骗了，认为你有更高的见识。这种受人愚弄的事不是最可耻的吗？你一定要警惕不要让伊庇克莱鲁斯剧中那个人的事发生：

“今天你狡诈地欺骗了我，我成了比舞台上年老愚蠢的丑角还愚蠢的人。”

在戏剧中，最愚蠢的人总是那种目光短浅又轻信的老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上面所谈的不是完美的人的友谊，也就是说，不是有智慧的人的友谊（我所说的智慧是指人可以看到、摸得着的智慧），而是普通人的友谊。现

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并对此做个简要结论吧！

二十七

法尼乌斯，还有你穆西乌斯，我要说，正是美德创造和维护了友谊。这是因为，事物的和谐、坚定不渝和忠诚都寄寓于美德之中。当美德发扬起来，放射出光芒，并注意到和认识到他人身上的美德之光时，她们会自觉地相互接近，接受对方的美德之光。其结果，爱，或者说友谊就会从这当中点燃起来。爱和友谊都说的是一种依恋之情。爱除了一种钟爱情感之外，没有别的内容，对他人的钟爱是一种决非出自缺什么，和寻求什么利益而生的爱。尽管你们未必追求爱，但爱无疑是从友谊中生长起来的。

在我年轻时，我出于亲密的交往很崇敬一些老人，如鲁西乌斯·帕乌路斯、马库斯·卡托、盖修斯·卡鲁斯、帕布鲁斯·纳西卡和底伯瑞乌斯·格拉库斯，我的好友奇皮奥的岳父。友谊在同龄人中间更显强烈，如我和奇皮奥、鲁西乌斯·福瑞乌斯、帕布鲁斯·鲁庇里乌斯、斯普瑞乌斯·穆米乌斯。但是，我虽然老了，我还是从年轻人那里得到情谊，例如你俩和昆吐斯·

图伯克。同样，我也很高兴和更年轻的人，如帕布鲁斯·鲁蒂里乌斯和安鲁斯·维尔吉尼乌斯来往。因为我们生活和自然的法则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新生，所以能和同时代人一齐开始在赛程起点同时出发，又能同时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达到终点，当然是再好没有的事了。

但是，由于人的肉体很脆弱，很容易颓废，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求受我们爱和爱我们的人。抛弃友情和钟爱就意味着抛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对我来说，虽然奇皮奥猝然逝去了，但他依旧活着，而且会永远活着。我爱这个伟人的美德，而美德是不朽的。他的美德不仅在我眼前反复再现，因为我曾常常感受到它，而且将来对后世人也会显得光彩夺目、意义重大。凡是怀着决心和希望承担大任的人都会记起他，并以他的形象为榜样。

在我的一生中，被赐与的一切幸运和品格，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奇皮奥对我的友谊。在这种友谊中，有对国家大事的一致看法，有对私事的相互建议，以及闲暇时快乐的消遣。就我所知，我从没因小事得罪过他，也从来没听他说过我不愿听的话。我们同吃同住，不但在戎马生活之时如此，就是在旅行和乡居时也是共同生活在一起。

我们常常共同致力于学习和研究某些问题，我们还避开世人注意共同度过一切闲暇时光，这些事情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对这些事情的回想和记忆都随他一起逝去了，我根本无法忍受对这个最亲近和最钟爱的人的思恋之情。但是，对这些事情的记忆一点没有消逝，反倒是愈反省、愈回想，记忆愈强烈。即使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对我来说，我这样的年纪本身可以使我心安理得了。因为，我不用长久地忍受这种思恋的苦痛。一切短暂的东西，不管它多么可怕，都应该是可以忍受的。这就是我对友谊的全部论述。最后我劝告你们：你们应崇尚美德，没有美德，友谊根本无从谈起。除此之外，你们应看到：友谊比任何东西都更高尚。

论义务(二)

我的孩子，如果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坚定地
把道德的善当作我们的指南，那么，自然而然，
我们的现实义务或职责应是什么，也就不言而
喻了。我觉得在上一卷里我已说得够多了，足
以使大家明白这一点。下一步我要深入研究一
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如个人财产和资
产以及其他资源，具有直接意义的各种职责。
这就是我现在打算论述的东西。

首先，我想对我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提供
一些一般的观察资料，因为这将使我有机会解
释一下我打算运用的方法。我相信，我以前的
作品鼓励了人们更多地去阅读有关这些论题的
书籍，甚至就这些论题来著书立说。尽管如
此，我也时常怀疑，某些卓越人物会觉得这整
个哲学观念都是不合口味的，而且不能理解我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和这么多的时间致力于这种哲学观念。我的回答是，只要我们的国家仍然是由它自愿选举出来的统治者来治理的，我就有责任把我的全部力量和思想奉献于国家事务。但是，一旦整个政府置于“独夫”的统治之下，那么，除了“独夫”本人之外，任何人都丝毫没有机会以任何一种方式发挥政治活动家的影响。何况，我已经失去了一些曾和我一起为国家服务的朋友，他们都是伟人。^[1] 当他们离去时，我强忍住悲痛，因为如果我不这样，悲痛就会把我压垮。另外，我也没有放纵自己乐不思蜀，去做同有教养的人不相称的事情。

只有当政府在路线上坚定不移时，人们才开始与之相随！那些不是在思图政府改良，而是在彻底毁灭政府的人，我们断不会对他们俯首贴耳。如果情况更好一些，我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埋头潜心写作。决不会！我会像以前在我们还有一个政府的日子经常做的那样，发表一些公开演说。即使我写了一些东西，也只会是这些讲演的记录，因为我过去总是在发表了一些演说之后，才把它们写下来并公布于众的。总之，它们不会是我现在潜心写作的这些

[1] 在反对已成为独裁者的“独夫”凯撒的国内战争中，牺牲了克奈乌斯·庞培乌斯·马格努斯、小卡托等人。

文章。过去，我把全部精力、注意力和心思都奉献于政治了。所以，一旦不再有政治这种东西，你们也就绝对不会在广场上和元老院里再听到我的声音了。

可是，我怎能听任自己的头脑完全无所事事呢？何况，哲学研究是一件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致力的事情。所以，我寻思，最高尚的摆脱悲伤的方式莫过于重新专注于哲学研究。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经常花费大量的时间致力于这种追求。可是后来，开始了我的官吏生涯，并把我的全部精力用到公共义务上，我唯一能用于哲学研究的时间只是为我的朋友和国家服务的工作之余。尽管这点时间微乎其微，但我还是全部用来读书，至于著书立说所需要大量闲暇，不是唾手可得的。

所以，现今这些已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可怕灾难，至少可以使我不再把自已的精力放在琢磨局势上。也就是说，它们给了我机会，让我写出对某些极有价值的论题的论述，而这些论题是我们的同胞以前并不十分清楚的。

肯定地说，智慧是这大千世界最值得向望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好或更适合人类、更符合人类本性的事情。所以，那些

力图达到这一目标的人就叫做哲学家，因为哲学的意思正是爱智慧。根据早期哲学家提出的定义，智慧意味着对神和人在内的万物，以及万物背后的原因的认识。如果有人打算贬低如此高贵的研究，我简直想象不出他能找到什么可以成立的理由：

如果我们力图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例如减轻苦恼，那么，哲学的研究成果就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因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是在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些能导致健全的和幸福的生活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强有力而且品格卓越。如果世界上有取得这些品质的手段的话，那么这种手段一定是哲学。有人说，当人们思考此类至关重要的目标时，并不存在着达到这些目标的特定方法，尽管有一些方法和体系可以把握别的甚至具有最微不足道性质的要求，这表明，说出这种话的人在说话之前并没有进行思考，而且一定没有作为一个向导从事任何一种重要事情。因为必须假定，学会如何举止的方法确实是有的，能找到它的地方就是哲学，而不是别的地方。

当我把注意力放到这门学问上时，我常常要深入研究大量的细节。在我的另一本书里，

我已经做了这个工作。^[1] 目前，我想做的就是解释一下在我被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这段时间，我为什么把我的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哲学研究上。

有些人对我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我现在正在走的路不是如它应该那样始终如一的。这些反对者中间有一些是有文化和学问的人。他们反对的是，尽管我支持的哲学学派^[2]认为不可能确定地认识任何事物，而我在这里，在这本书里不仅对所有有关论题提出了观点，而且实际上力图制定一些规则，指明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想请这些批评家再费心理解一下我的意图。因为，尽管我们对知识的确定性持否定态度，但我们根本不是思想流浪者，毫无目的地踉跄而行，不知道去追求什么。如果我们完全没有理论、没有能使我们的生活立足于其上的原则，那么，我们的精神生命乃至任何生命，也就完全丧失了。别的哲学学派认为，有些东西是确定的，别的东西是不确定的。而我们采取自己的特有观点。我们可以说，有些东西是可能的，而另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阻止我接受那种似乎

[1] 在西塞罗已散失的著作《霍屯修斯》中。

[2] 学园派。

可能的东西，排斥那种不可能的东西。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教条主义的臆断，并搞清楚不合理性是什么，不合理性就是对一切精确思维的否定。但是，我们的人民总会找出理由反对所有绝对的断言。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只有通过^对对每一问题两个方面的论证进行测定、比较和权衡，才能对可能的东西有一个明确的观点。

然而我认为，在我的《学园派》^[1]中，我已充分地解释了这一切。至于你，马库斯，你依附的是另一个非常古老而独特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是你的教师克拉梯普斯，他值得列入他的著名运动的奠基人之列。^[2] 尽管如此，我并不希望你^不不注意我的学派的意见，何况这些意见同你们的学说相距得不是太远。

现在，我应着手我的任务了。

为了指导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曾制定了5项原则。其中两项涉及到什么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另两项涉及到生活的外部利益，如财产、资源、权势，第五项涉及到在其他范畴之间出现冲突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的正确方式。

[1] 西塞罗以对话形式对学园派信条的解释。

[2] 米蒂利尼的克拉梯普斯：逍遥学派的一个领导人物。

头两项与道德上何谓正确的问题相关，我已经论述了，希望你们完全熟悉这部分论题。^[1] 后两项把我们带到了被有利性所掩盖的物质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利性”这个语词已改变了它的意思，在何谓有利和何谓正当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区别。但如果以此意指，正当的东西可以是不利的，或者有利的东西可以是不正当的，这将是致命错误的，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危害。

诚然，颇负盛名的哲学家们，以他们所要求的全部严格性和公正性进行推理，可以在这里找出3个各自单独的假设。^[2] 但实际上，这3个命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某些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之所以未能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被这些思想家哗众取宠的小聪明所迷惑，从而误把计谋当作智慧。其实，把三者分开，是十足的误解，应该予以根除。我们有必要纠正这些人的整个思维方式，并使他们懂得，他们想达到他们所向往的对象，不能靠狡猾和骗人的论证，只能靠思想和行动上的道德之善。

[1] 《论义务》(一)。

[2] 谓(a)道德上既正当也有利的，(b)道德上正当而表现为不利的，(c)有利的而道德上表现为不正当的。

有助于维持人类生活的东西，可以分类如下。其中一些是无生命的，例如金、银、大地的产物以及其他类似的物体。另一些是有生命的，具有自身的冲动和欲望。在这些有生命的物体中，一些是有理性的，另一些则是无理性的。无理性的一类包括马、牛和其他为人类的事业和生计而劳动的动物。有理性的一类分为两部分，神和人。如果人过着一种真诚而纯洁的生活，神也就感到满足了。次于神并继神之后，对人类生活最大的贡献是由人自身做出的。如果我们去干相反的事情，即损伤和危害人类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这里再对神和人做一次类似的分类，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神是不能损害凡人的。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不去考虑神，而且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人最大的危害根源就是人。

回过头来再看看无生命的对象领域，我们发现，又是人，即人类劳动，驱动了这些东西的绝大部分。正是因为人们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和技艺，我们才有效地使用了这些对象；正是人类的干预，才使它们成了对我们来说可利用的东西。同样，倘若不是因为人和人的努力，我们断不会有医疗、航海、土地耕作、谷物收获或储存。我们剩余产品的出口和我们所需物品

的进口，之所以可能，也只是因为人类为这些事务付出了劳动。而且，如果没有人类双手的劳动，我们盖房需要的石料决不会从大地上挖掘出来，

“金银铜铁，深藏大地之中，”^[1]

决不会从矿山中开采出来。

还拿房屋为例，我们需要用房屋来抵御寒冷，降低暑热。除非群体混合生存的人类学会了在这些事情上彼此寻求互助，你怎能想象这些住所起初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后来被风暴、地震或岁月的流逝毁坏之后又怎么修复起来的？或者，不妨想一下我们的沟渠、运河、灌溉网、防波堤、人造港口。如若不是人类的努力，我们怎能享有这些成就的好处呢？这些例子，以及其他许多例子，解释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正是人类双手的劳动，使我们从供我们支配的无生命的对象中得到了利益和好处。

我们对动物的利用，也是如此。没有人类干预，动物对我们就毫无价值或毫无功益。正是人，第一次发现了不同种类的动物的可能用途。今天，人类劳动还使我们能够饲养它们、驯服它们和照料它们，在适当的季节利用它们。

[1] 引语可能出自艾克修斯的《普罗米修斯》。

而且，也正是人，屠杀了危险的动物，俘获了有用的动物。

人类的技艺多种多样，没有它们，生活便是不可能的。我这里关心的事情不是列举所有这些技艺，而只是指出，如果人类没有这些技艺，那么就根本不会有医疗、健康、快乐、食物和舒适。正是这些东西使人类文明的生活有别于野兽的生存。

此外，如果人们起初没有聚集在一起，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城市，就不可能形成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正是人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导致制定法律和习俗，获得公平分配权利，建立社会制度。而且这些发展进而产生了人道精神和互相尊重。从此生活开始更加稳定，我们通过互相给予和索取，通过彼此交换我们的资源，成功地保证了我们的一切需要得以满足。

我的确不需要冗长地深究这一切，因为帕奈修斯非常详细阐释的观点对每个人都一定是不言而喻的^[1]；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任何领袖只有得到了他的同伴的合作，才能起到重要的或有效的作用。帕奈修斯引证狄密斯托克利、伯里克利、居鲁士、阿杰西雷斯和亚

[1] 罗得岛的帕奈修斯是斯多噶派中期的领导人物。

历山大为例，他指出，这些人如果不能赢得支持者，根本不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他用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断言，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结论。

事情并没有就此为止。诚然，人民团结合作，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世界上最坏的灾难可能就是人加之于人的灾难。著名而多产的逍遥学派者狄凯阿库斯在他的《论人们死亡的方式》一书中研究了这个问题。起初，他把所有非人为的死亡原因汇集一起，如水灾、瘟疫、自然灾害和野兽的突然吞噬。他使我们确信这些东西曾一度血洗了所有民族。^[1]接着，他开始比较被别人的行动，即被战争和革命所毁掉的人的数目。他得出结论说，由于这些原因而死亡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其他各种灾害而造成的牺牲者之总和。

这就是说，毋庸置疑，人所具有的力量既可以是对同类有所裨益的最大动因，也可以是对同类造成危害的最大动因。因此，有能力赢得人心，并使人心归向一个人的事业，这应该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品质。我们的生活从对无生物，从对动物的利用中获得的好处，可以归类为

[1] 西西里岛梅萨纳的狄凯阿库斯是亚里士多德最得意的门生，仅次于狄奥弗拉斯托斯。

纯粹机能的¹活动。而获得我们同类的亲善，并使他们顺从于积极准备增进我们的利益的国家，这才是值得一个超过常人的人发挥他的智慧和卓越才能的任务。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道德的善。道德的善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是有能力把真理同谬误区别开来，并理解一种现象和另一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每种现象的原因和结果。第二种是有能力抑制激情（希腊词 *pathe*），并使欲望（*hormai*）服从理性。第三种是这里要详述的，即能够在同他人的交往中周到而宽容地行动。^[1] 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就将获得别人的合作；这就是我们保证自己的自然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方式。采取这种合作态度，还可以使我们避开任何即将发生的危险，并还击任何企图危害我们的人，在正义和人道许可的范围内严厉地惩罚他们。

在适当场合，我将继续论述一下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获得这种能战胜并能保持得到别人支持的能力。但现在让我先做一些初步性的观察。

[1] 这3种品质就是智慧、节制和正义。

人人都懂得命运女神在决定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事情上的重大作用。她是阵阵惬意的微风，把我们飘送到我们一直向往的天堂。如果她碰巧迎面扑来，我们就毁灭了。如果我们打算列举命运女神能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灾难，首先就得提一下两类通常能见到的灾难。其中一类是由无生命的原因造成的，包括暴风、飓风、船只失事、建筑物崩塌和火灾。另一类灾祸可能不很常见，来自野兽的袭击、撕咬和损伤。但更经常的灾难是人类形成相互对立双方的互相残杀。这已发生过不知多少次，而且前不久就出现了3例。^[1]不妨想一下有多少次指挥官死于非命，直到最近我们还失去了一个十分杰出的领袖。也不妨想一下民众仇恨爆发经常导致惩罚、打倒并驱逐那些曾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另一方面，也不妨考虑一下历史上成功例子，文武官员的激增和战场上的大捷。这些成功也包含着一种机遇的成分。然而，不管是为了善还是为了恶，如果没有其他人提供的合作和财力，以上的任何人都达不到这样的成就。

[1] 公元前48年凯撒在法尔萨拉战胜克奈乌斯·庞培乌斯·马格努斯，前46年在塔普苏斯战胜梅特鲁斯·西比奥，前45年在蒙达战胜了庞培乌斯的儿子们。

既然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我想进一步解释一下我们如何能吸引并鼓励这种合作，以增加我们的优势。假若我的论述显得冗长，那么把它同这一论题所牵涉到的利益之重大比较起来，也许我所说的话将显得不是十分冗长。

当人们采取某一步骤来扩充一个市民的财产或促进他发迹时，他们的行动可以出自几种不同的动机。动机可以是纯粹的亲善，因为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喜欢这个人。动机也可以是敬重，因为他们赞扬这个人的品格，并认为他应该成功。或者，他可以博得人们的信任，人们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支持他。另外，也许人们畏惧他的权力。权衡之下，人们期望将来能得到某种收益，例如一个国王或民众领袖惯于给予的馈赠。或者人们实际已经得到了报酬承诺，受到鼓励而甘愿效劳。不论是对那些接受这些酬报的人来说，还是对那些提供这些酬报的人来说，这都是最平庸最卑劣的动机。因为当人们用受贿来代替他们应靠自己的功绩而赢得的东西时，情况是很糟的。然而，在一些场合下，求助于这种财政上的引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适当时机，我将就这种方法的各種可能的用处，阐明我的观点。

但现在，我打算先谈一谈这个问题对健全

生活有更直接影响的几个方面。

人们有时不单是自愿地去帮助某个人，而实际上是自愿地服从他的权威和权力，这是有一些原因的。引诱他们去这样做的动机包括：亲善；对恩赐的感激；别人的显赫；对顺从能带来的好处的估计；担心如果自己不自愿地服从，武力也会迫使自己屈服；信赖另一方的许诺；或者如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经常看到的，实际上接受贿赂，对此我刚才已经提到过。

然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好手段，莫过于赢得爱戴。我提到过畏惧，但使人民担惊受怕不会使一个人保住自己的地位，只会失去这种地位。思尼乌斯写道：“人民仇恨他们畏惧的人，他们想看到他们仇恨的人死掉。”^[1]他的话非常正确。如果说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必须了解，任何权力不管多么强大，只要普遍不得人心，就无济于事。我们的暴君，在他活着的时候，国家不得不忍受他的统治，因为他已经用野蛮力量压制了国家的作用。的确，现在他死了，罗马甚至比他在世时更是他的奴隶。尽管如此，他的死还是很好地说明了

[1] 可能引自思尼乌斯的《塞埃斯提兹》。

一个众矢之的的灾难后果。所有别的专制君主的类似命运也会得出这样的教训，他们极少逃脱了同样的结局。因为畏惧根本不能保证权力持续下去。唯一可能保持权力的方式是争取亲善。

那些靠武力来压服民众的统治者，将不得不使用残忍的方法，就像有些主人一样，由于没有别的办法来管理奴仆，便不得不苛刻地对待他们。但是，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故意使人们感到畏惧，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作法。因为不管一个人多么严厉地压制了法律的自由行使，吓倒了自由精神，但或迟或早，这些被淹没的福祉将再度浮到表面，或者靠民众心中的感情，或者通过选举国家官员的秘密投票。这种被压制后而又重新获得的自由，比那种从未遇到过危险的自由，更加明显地放荡不羁。所以，这里有一条能最广泛应用的原则，不仅可以保证一个人的安全，还可以保证他的幸运和权力，这就是：赢得感情胜于使人畏惧。不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做公共生活中，这都是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并取得成功的正确方法。

那些渴望使别人感到恐怖的人，将不可避免地害怕他们恫吓的每一个人。不妨回想一下暴君狄奥尼西的极度焦虑，他甚至害怕他的理

发师的剃刀，宁愿用火炭烧去自己的头发。至于菲莱的亚历山大的精神状态，人们就更难以想象了。历史告诉我们，他非常爱他的妻子西比。尽管如此，每当他晚饭后想去她的卧室时，便命令一个野蛮人或某个身上刺着色雷斯人印记的奴隶走在他前面挥剑开路。他还派出他的卫士提前去搜查夫人的梳妆匣，确保她的衣服里没有暗藏武器。既然他相信一个野蛮的带有犯罪标记的奴隶比他的妻子更可能忠诚于他，他该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然而，他这样做看来并不错。最终西比因为怀疑他有一个情妇，的确暗杀了他。

以上的任何权力，如果挑上了畏惧这副担子，便不可能有力地幸存下去。看一下法拉里斯吧！他因无与伦比的残忍而臭名昭著。当然，他不是家庭内部背叛的牺牲品，不同于我上面提到的菲莱的亚历山大的命运。而且他也不像我们罗马的这个人那样，被一些密谋者所谋杀。法拉里斯的结局是不同的，阿格里真托的全体人民都起来造他的反，他死于万人之手。大家还记得德梅垂斯的情况吧！马其顿人把他扔到一条船上，他投奔了皮洛士。不妨再看一下斯巴达人发生的事情。当斯巴达人暴虐地行使他们的霸权时，差不多他们的所有同盟军都抛弃了

他们，消极地观看他们在留克特拉的灭顶之灾。^[1]

你们将看到，我宁愿用来自外国历史的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也不愿用我们本国的例子来证明。可是我也想就此谈一点。只要罗马人靠亲善而不靠非正义来治理罗马帝国，那么，我们进行的战争既保护了我们的臣属盟国，也维护了我们的疆土。当战争过去后，战争的后果是仁慈的，或者说至少不会比应有的后果更苛刻。在这些日子里，罗马元老院是外国国王们、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庇护所。我们官员和指挥者的一个雄心是靠忠诚而正义地保护我们各省和各盟国的安全，来获得殊荣。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与其说是世界的统治者，不如说是世界的保护者。

甚至在苏拉时代以前，这些传统的高标准就已经日益衰落。自从苏拉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些理想。当我们如此残忍地对待我们的同胞的时候，即使给我们的盟国以最可怕的压迫，似乎也不为过。诚然，苏拉

[1] 塞萨利国菲莱的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69至358年在位。马其顿王安提哥那一世的儿子德梅垂斯·波利奥塞特(公元前336-283)的军队于公元前288年流浪到伊皮鲁斯的皮洛士国王那里。斯巴达人于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被底比斯人击败。

的事业是一种正义的事业，但他的胜利却是骇人听闻的。他把他的长矛插在广场上，开始拍卖那些爱国者和有财产者（至少这些人都是罗马公民）的财产。^[1]但他厚颜无耻地声称，他拍卖的物品是他从敌人那里赢来的战利品。继他之后，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事业不是正义的，而是邪恶的。他的成功甚至比苏拉的成功更可怕。^[2]仅仅没收市民个人的财产，远远不能使他满足。经过一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各个省份和国家都任他宰割。所有其他民族都遭到了灭顶之灾。

前不久，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特例，证明过去的联合体已经消失。因为我们亲眼看到，被攻占的马西利亚城的版图纳入了罗马的胜利行列。^[3]然而，过去正是靠这个联合体，即现在的征服和胜利的牺牲品的坚定支持，我们的将军们才得以在外阿尔卑斯山战争中赢得胜利，取得大捷。这决不是唯一的对我们盟国的损

[1] 苏拉于公元前82年占领罗马，成了独裁者。罗马人过去经常立一个长矛作为拍卖的标记，这一习俗起自战利品拍卖。

[2] 指凯撒。

[3] 公元前49年马西利亚(马赛)被凯撒围困并攻占。西塞罗指的是公元前46年凯撒庆祝的大捷，也提到以前同马西利亚的联盟，这次联盟曾使罗马在公元前121年并吞了加利亚—纳尔波农历史省(法国南部)。

害，我还可以列举很多。我之所以把这次损害单列出来，乃是因为太阳底下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

确实，我们现在的苦难是咎由自取。因为假如我们不允许暴力横行无阻逍遥法外的话，那么一个人也就不可能掌握专制大权。他的财产的继承人，是寥寥无几的，但继承他的野心者，却有一大批卑鄙的人物。只要人们还记得插在广场上的血矛，而且只要人们希望再看到它，那么，国内战争的隐患和根子就将一直伴随着我们。帕布留斯·苏拉，在他的亲戚是独裁者的时候，他是挥舞这杆长矛的人，而36年后，也是这个帕布留斯·苏拉，厚颜无耻地站在另一杆长矛旁边，进行一次最可恶的拍卖。^[1]还有一个索拉，在第一个独裁者手下当职员，后来成了第二个独裁者手下的城市司库。这些事例证明，只要有非常有利的报酬，国内战争就决不会结束。

现在这个城市什么也没留下，只有死气沉沉的阡陌断壁。甚至它们看起来也是那么可

[1] 在凯撒手下。帕布留斯·克奈鲁斯·苏拉是独裁者鲁修斯·克奈鲁斯·苏拉的侄子。但西塞罗提到帕布留斯的守卫事情是在公元前62年，即苏拉时代之后。这里提到的第三个苏拉是这独裁者手下的一个自由民。

怕，也许更为恐怖的打击即将来临。真正的罗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这些灾难之所以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乃是因为我们使别人感到畏惧，而不是感到喜欢和可爱。既然整个罗马共同体由于它的不正义的帝国主义而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每个人应该为自己得出什么教训呢？我们已经认识到，亲善拥有巨大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畏惧只会成效甚微。我们下一步应做的是，讨论一下如何使这种亲善有利于我们。我们怎样才能赢得建立在忠诚和尊敬基础上的感情呢？

应被灌输这种感情的人的数目，必然随着试图进行这种灌输的人的情况而不尽相同。他是想要众多的信徒，还是只要一些信徒就足够了？答案取决于他所过的那种生活。但我们应该制定一个首要的基本要求：当我们选举朋友担任某种职务的时候，我们至少要选那些真正喜爱我们并诚实地准备站在我们一边的人。就这一点而言，这个寻找朋友的人是重要人物还是不重要人物，这无关鸿旨。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他都像别人一样迫切需要友谊。

有些人比别人更强烈渴望荣誉、名望和盛

名。应该承认，如果你具有这些优势，你将更容易赢得朋友。关于友谊，我在我的题为《莱留斯》一文中已经做了论述。^[1] 所以，现在我想谈一下我们已开始讨论的另一项宝贵财产，即引人注目的名望。的确，关于这个论题，我也曾写过两卷书。^[2] 然而，既然我们现在正谈论实践义务，所以我想再回到这个话题上。名望能大大促进仕途发展。

如果想获得最真实、最崇高的名望，必须激发公众的 3 种感情：(1) 亲善，(2) 信任，(3) 那种能使一个人得到高度的敬重感。简单明了地说，在民众身上唤起这些感情所用的方法，是在每个人身上产生这些感情的方法一样的。但是掌握群众需要有进一步的技巧，这种技巧的特长就在于我们能在同一时刻给所有民众的心里留下好印象。

我逐个考察一下这 3 个论题。第一论题涉及到赢得亲善的问题。得到亲善的最重要方式是为某人提供帮助。^[3] 第二种方式是表明某人

[1] 西塞罗的《莱留斯：论友谊》

[2] 意大利诗人佩脱拉克知晓西塞罗的两卷《论荣誉》，但现已散佚。

[3] 西塞罗特别重视法庭上的辩护。这里之所以用“帮助”一词，乃是因为辩护者不允许收费，即使他可以用别的方式获得报酬。

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尽管他的财力实际上不允许他这样做。因为能广泛影响民众好感的是慷慨、慈善、公平交易、忠诚等优良品质，这些优良的品质是同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愉快的性格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美德之所以具有影响力，乃在于我们赞赏正确而妥当的行为，不仅称颂它的内在卓越性，也称颂它的外在表现。我上面列举的这些品质，特别适合于塑造这种举止的卓越表现，这就是大自然迫使我们去爱那些似乎具有这些宝贵财富的人的原因。所以，这些基本因素使人们感觉到亲善。也许还有别的因素，但它们是不怎么重要的。

获得名望的第二种方法，是赢得信任。为此有两点要求。首先，一个人应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智慧的；其次，他应该被视为正义的。我们信任那些在我们看来比我们更有智慧、能更好地判断未来的人，这些人似乎能应付危急的形势，能做出适应环境的决定。这是一种有用的智慧，人们认为这种智慧是真正可靠的东西。赢得信任的第二点要求是，一个人应该具有正义的名声。正义和善是同一种东西，当我们承认一个人是正义的时候，我们也就承认了他的性格没有丝毫不诚实或不公平的嫌疑。我们将认为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命运和我们

的子女托付给他，是万全之策。

在博得信任上，善或正义比智慧更有效。的确，即使在人们痛感缺乏智慧时，正义仍然具有很大的份量；而缺少正义的智慧，是根本不能博得信任的。如果一个人被视为不诚实的，那么，他越是精明能干，他就越令人讨厌，使人不信任。总的说来，正义和智慧的结合是最完美的，能赢得所渴望的一切信任。正义而不智慧，也能得到很多人信任。但智慧而不正义，则是无用的。

我这样把一种美德同另一种美德区别开来，人们也许感到惊奇。毕竟，哲学家们通常认为，拥有一种美德的人也拥有另一种美德，而且我本人也经常论证这个结论。也就是说，毫无疑问，任何正义的人必然也具有智慧。我之所以出现明显的前后不一致，根由在于，我们在对抽象真理的哲学分析中所使用的准确语言是一种东西，而我们在使这一论题通俗化的尝试中使用的语言是另一种东西。在本文中，当我把一个人说成是勇敢的，而把另一个人说成是善的或智慧的时候，我是在用适合广泛流行的语词来论述的。为了使概念通俗起见，有必要使用通常人们熟悉的语言，帕奈修斯就是这样做的。

闲话休提，还是继续进行我的论述吧！

争取荣誉的第三个前提是，人们敬慕我们，认为我们值得享有崇高荣誉。一般说来，人们赞美他们感到美好或比他们所期望的更美好的每一事物。而且在同胞中，他们也赞美那些胜过他们的期望的品质。所以，一旦他们在某人身上发现了卓越而罕见的特点，他们便大加赞扬和敬重他；而那些既显示不出特点，也显示不出精神或活力的人，则遭到他们的嘲笑和轻视。然而，当他们不赞赏某个人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藐视他。例如，一个被他们视为不诚实、恶劣、奸诈和狠毒的人，会招致他们的非难，但并不必然遭到他们的蔑视。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所说的那样，蔑视的对象是俗语所说的对别人对自己皆无益的人，即既无用又懒惰的平庸者。

反过来说，值得赞扬的是那些比社会的其他人更完美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坏名声，也没有很多人都难以避免的恶习。例如，耽于声色就是一个迷人的尤物，她成功地诱使很大一部分人偏离了正直的道路。痛苦，也能使大多数人感觉到它的烙印，产生无法估量的恐怖之感。生与死、财富与贫困，都对整个人类种族起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影响。如果有人能显示

出品格高尚的超然态度，无视这些无论是善还是恶的外部环境，如果他们完全专注于或沉浸于某种高贵而光荣的目的之中，那么我们禁不住要赞扬他们杰出而崇高的品质。

所以，这种超越外部环境的能力，博得了特别的敬仰。这就是作为善者之标志的正义被普遍视为奇迹的原因。的确如此。如果一个人具有这种美德，便意味着他已摆脱了对死亡、痛苦、流放和贫困的畏惧，也就是说，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像一个正派人那样举止，而不是争取与这些不幸相反的东西。大多数人都赞扬那种拒不被金钱所动心的人。证明一个人在这一方面有这种品质，也就等于证明他成功地经受住了探火神裁法。

也就是说，一个人能自称是一个正义的人，必须已经具备赢得荣誉的 3 项要求：一是亲善，因为一个人公平交易的满意效果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好处；二是信任，道理也一样；三是赞扬，因为人们赞扬正义者无视或蔑视大多数人竞相追逐、趋之若鹜的东西。

在我看来，任何人，不管他的生活方式如何，都离不开他的同事的帮助。首先，他得有朋友来倾吐心里话。如果人们不认为你是一个

好人，那么谁也没有一点心思和你谈话。即使一个避免社交隐居城外的人，也很需要具有善良和正义的名声，因为他总得有某类朋友。如果没有朋友，他一味孤独下去，他将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容易成为各种迫害的牺牲品。所以，他比别人更需要正义的名声。

那些从事买卖或出租业的人，即通常的商业界人士，完全依赖于正义。的确，正义的力量是如此深远，以致那些以行凶作恶为生的人也不能没有一点正义的品质。如果一个小偷偷了或抢了另一个小偷的东西，那么他将在他的群体里威信扫地。如果一个土匪头子分赃不公，那么他的同伙就会驱逐他，甚至暗杀他。匪徒们恐怕也有他们自己的信条，他们有义务遵守这种信条。我们从狄奥庞普斯的书里了解到，不公正的分赃，使伊利里亚的土匪巴狄利斯掌握了大权。卢西塔尼亚人维利亚苏斯甚至靠这种手段得到了更大的地位。罗马的军队、罗马的将军们在他面前败北，直到最终享有贤人之称的执政官盖阿斯·莱留斯击败并压服了他。莱留斯严厉打击了巴狄利斯的猖狂活动，使得莱留斯的后继者们很容易就结束

了战争。^[1]

既然正义的影响如此之大，甚至能加强和增长一个匪徒的权力，那么对实现正义的思考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法律和法制完善的政府。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米堤亚人总是选择一个善者为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要确保他们将受到公正的对待。^[2]我相信，我们自己的祖先也是这样认为的。过去，当罗马平民开始遭受某些统治者压迫时，他们便选择另一个市民，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他们的君主和保护人。他的职责是保护社会的弱者免遭暴行，创造公平的条件保证高贵者和卑贱者都有同样的权利。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法律成了最高统治者。人民一直渴望在法律面前有平等的权利，否则他们偶然获得的任何权利都将徒有虚名。如果一个人，一个正义而正直的人，能使他们实现这一目的，那么这对他们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能

[1] 巴狄利斯选伊利里亚人的统治者，曾蹂躏了西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公元前358年国王菲利普二世把他击退。当时的历史学家希俄斯的狄奥庞普斯写了菲利普执政的历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维利亚苏斯(死于公元前139年)使卢西塔尼亚人和塞尔蒂伯里亚人向罗马的造反长达11年之久，莱留斯(见《论友谊》)是公元前145年的罗马执政官。

[2] 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96页。

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那么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所以，毋庸置疑，在古代被选为统治者的人，是那些享有正义之盛名的人；如果他们也被认为是智慧的，那么人民在他们领导下所渴望获得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但领袖应该提供的主要东西是正义。的确，这是一种应不遗余力地来培养和保持的品质。应该为了正义自身的缘故来这样做——因为这就是正义的本意、正义的本质。当然，公平交易也会给一个人的名望增添荣誉。

在某些方面，赢得名望就像赚钱一样。为了赚钱，我们不仅考虑获得金钱的方法，也要考虑投资的方法，以保证收入能满足我们目前的开销，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在赢得名望上也是如此，首先你必须获得名望，然后你不得不投放你已得到的东西。关于这个获得过程，苏格拉底非常正确地指出，有一条捷径可直接赢得名望，即“使你自己成为你想要人民认为你是的那种人”。^[1] 如果认为靠自吹自擂、空洞表演、伪善言谈或能说会道的虚假表现能获得永久的名望，这将是一个严重的误解。真

[1] 色诺芬《言行录》第二卷。

正的光荣的名望根深叶茂，而任何虚伪做作则昙花一现。任何赝品都不具有长久的力量。关于真实的东西和假造的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为了简洁起见，我只打算提一个家族的例子。帕布留斯的儿子台比留·哥拉克库斯君主的英名，永垂罗马的史册。但他的儿子们，一生并没有博得品格高尚的人民的赞赏，在他们死后，他们列入了那些十恶不赦者之列。^[1]

所以，任何想享有真正名望的人，必须履行正义所要求的义务。我在本书上一卷论述了这些义务。

尽管事情的本质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在于我们真正是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类同胞认为我们所是的样子，但仍需要一些方法来保证人们真正发现我们的样子，现在我想提出这些方法。如果一个人开始了他负有盛名的生涯，不管是由于他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名声（可以说，像马库斯就是这种情况），还是通过别的事件转折时机，世界的眼睛都将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做的每一件事，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将在众

[1] 大台比留·哥拉克库斯是公元前 177 年至 163 年的罗马执政官，公元前 169 年的监察官，他儿子是著名的护民官台比留和盖修斯，西塞罗在本文后半部一再哀叹他们的改革方法。

目睽睽之下。仿佛他在灿烂的阳光洗澡，他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行动都暴露无遗。而别人整个少年时期则默默无闻于此，因为他们出身卑贱寒微。一旦他们达到成年，他们不得不做出特有的努力，一心向往高处，极力向上攀爬。他们献身于这一任务，他们能感到某种特殊的信任，因为他们年轻，将得到鼓励，而不是妒嫉。

一个年轻人在争取显赫名望道路上的第一步，是尽可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我们许多祖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当时战争连绵不断。你们的青春岁月也碰到了一场战争。但在这场战争中，一方充满了罪恶，另一方尽是霉气。当庞培乌斯在军中把一队骑兵的指挥权授予你时，你的骑术和标枪、你经历军中艰难困苦的方式，使你赢得了这个伟人以及你所有战友的高度赞扬。然而，你已得到的名望证明是根本无用的，因为当罗马共和国消失后，你的名望也就一钱不值。

在这里我不想对你们个人的情况评头评足，我要论述是更一般的论题。所以，让我继续进行下一步论证吧。

有一个总的原则，即一个人的品格比他的

躯体更重要。这个原则完全适用于我们这里考虑的论题。在公共生活中，那些靠精神力量取得的成就，比那些纯粹作为物质力量之表现的成就更感人。记住了这一点，一个青年就会发现，如果有谦虚的举止，如果他显示出对父母的孝顺，如果他表现出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忠诚，他最能赢得赞扬。青年们还会发现，如果他们选举了某个智慧的著名爱国政治活动家，并作为他的同伴而依附于他，他们会很容易得到尽快的赏识。如果他们继续和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保持联系，那么公众就会形成印象，认为他们也将像他们树为楷模的这个人一样有所作为。例如，年轻的帕布留斯·鲁提留斯·鲁夫斯认为自己的正直名声和立法才华主要归因于自己长期在帕布鲁斯·斯凯沃拉家里当随从。相反，鲁修斯·克拉苏斯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没有拜任何人为师，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他从事的一次极其重要而引人注目的起诉，赢得了极大的威望。在他当时这个年龄，大多数孩子只能因在学校里的功课好而受到赞扬。但克拉苏斯一再说这个成就应归功于狄摩西尼斯。也就是说，尽管他年龄不大，但他在法庭上完成了非常感人的事情，仿佛这是他在自己家里完成

的实习文章。^[1]

诚然，讲演只是一种言语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会谈。一种令人愉快的会谈方式肯定在争取朋友上要起某种作用。但很难准确地说它有多大的作用。显而易见，讲演，即雄辩的公开演说，比起任何私人交谈来说，更有助于博得盛名。有3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即马其顿的菲利普给亚历山大的信，安提巴特给卡山德的信，安提哥那给他的小儿子菲利普的信，阐明了这种雄辩术的价值。^[2]我们知道，这3封信的作者都是历史上最智慧的人，在他们现存的这些信中，他们无一不建议自己的儿子用亲切的讲演来征服人民的心，用有说服力的规劝

[1] 帕布留斯·鲁提留斯·鲁夫斯是公元前105年的罗马执政官。帕布留斯·姆修斯·斯凯沃拉是他家族第一个获得法官地位的人，于公元前133年任罗马执政官。他是祭司奎因图斯·姆修斯·斯凯沃拉的父亲，占卜官奎因图斯·姆修斯·斯凯沃拉的叔父见《论友谊》和《论演说家》。这里把帕布留斯·斯凯沃拉的女婿鲁修斯·克拉苏斯同雅典演说家狄摩西尼斯做了比较。在21岁时，克拉苏斯成功地起诉了盖乌斯·卡伯，后者曾支持格拉齐，并强迫他自杀。

[2] 这些信都是伪造品。菲利普二世(公元前359年—336年)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亚历山大的将军安提巴特(死于公元前319年)是建立塞萨洛尼基的卡山德(死于公元前297年)的父亲。安提哥那一世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后继者(死于公元前301年)，他有两个儿子，即菲利普和德梅特留斯·波利奥塞特斯。

来保持士兵的忠诚。但最有影响的，通常是在公开论战中作出的讲演，因为面对着大批的听众，这种讲演有能力征服众多的人们站在某一方。一次流畅而有洞察力的演讲，能使演说者赢得热烈的赞扬，他的听众将相信他比别人更聪明更智慧。如果他能使自己的演讲既感人又切合实际，人民将非常热烈地赞扬他，特别是当他是年轻人的时候。

有几个不同的演说途径。法庭、议院和元老院是许多年轻的罗马人靠公开演讲而成名的地方。而在法庭上，博得赞赏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法庭上的讲演分为两类，一类是起诉，另一类是辩护。为某人辩护是更能博得荣誉的途径，但起诉一方的讲演经常也能赢得名望。我刚才提到的克拉苏斯就是一例，演说家马库斯·安托纽斯在他青年时代也获得过类似的成功。而且，起诉者的角色使帕布留斯·苏尔皮修斯·鲁夫斯成了著名的演说家，当时他挺身反对邪恶的颠覆分子盖阿斯·诺巴努斯。但一般说来，任何人都不该作为一个起诉人。的确，人们决不该进行起诉，除非是为了国家利益（如我上面提到的几个例子），或为了报私仇（这就是卢加拉斯弟兄俩的动机），或为了保护外省

平民(例如,我曾提出一项起诉来帮助西西里人,朱利叶斯应撒丁人民的请求而控告阿尔布修斯)。鲁修斯·富尤斯为弹劾乌纽斯·阿奎留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同样是很知名的。^[1]

起诉一次两次则可,无论如何不能频繁。如果有人过于频繁地提出议案,人们就会建议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对国家有益处的案例上。惩罚罗马的敌人,这决不可能是不光彩的。即便如此,也得有个限度。一再重复某种起诉,要求剥夺被告的公民权,即使看起来无心,人们也会说是不人道的。结果,专门在起诉上追求名望,会使一个人陷入不稳定的处境,会对他的良好名声产生相反的效果。有个大家族的一个成员乌库斯·布鲁图斯,就碰到了这种情况,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位杰出的法律权威。^[2]

[1] 关于演说家马库斯·安托纽斯和帕布留斯·苏尔皮修斯·鲁夫斯的情况,见《论演学家》。盖阿斯·诺巴努斯是公元前104年的护民官,公元前98年被鲁夫斯指控为判国罪,安托纽斯为其辩护,被宣布无罪。西塞罗还提到鲁修斯·卢加拉斯和马库斯·卢加拉斯弟兄的起诉(后者是公元前74,73年的执政官),他本人于公元前70年对维莱斯的起诉,朱利叶斯·斯特拉伯(公元前90年的市政管理官)对享乐主义者提图斯·阿尔布修斯的起诉,以及鲁修斯·富尤斯(公元前101年的执政官)因西西里的弊政而对乌纽斯·阿奎留斯的起诉。

[2] 父亲(公元前150年起任军政官)是民法的3个“奠基人”之一,而儿子则以起诉者知名。

应仔细考察的另一项规则是，决不可提出控告，要求褫夺一个清白无罪的人的公民权。因为这不能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大自然为了人类的安全和自卫而把论辩术赋予人类，因此，毁灭这种天赋，灭绝诚实的人，是非常不人道的。决不应该这样做。另外，假设一个有罪的人不是十足堕落或邪恶的人物，偶而为他辩护也不必有什么顾忌。因为民众感情要求这样做。这是习俗所许可的，而且符合人类礼仪。

在任何一种审判中，法官的职责都是去发现真实的东西。而对于执政官，他可以偶尔地使自己辩护依据于那些看起来像是真理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真理。但我应该承认，如若不是斯多噶派的最权威代表帕奈修斯已经说了这种话，那么在这篇哲学文章中我是无脸说这种话的。

最伟大的名声，最深远的感激之情，是靠维护人民的演讲来赢得的。当被告显然是某个有势力而可怕的人物进行压迫和迫害的牺牲品时，我们的这些辩护演讲就特别适用。我经常就是这么做的。例如，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为阿梅里亚的塞克斯图·罗修斯辩护，抵制独裁者苏拉的暴虐行径。大家知道，这篇演讲已经

发表了。^[1]

一个青年为了赢得名望而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这么多。下面接着论述的主题是仁慈和慷慨。

显示这些品质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两种方式：要么靠亲自效力，要么靠金钱。第二种方式是较为容易的，特别是当你富有的时候。但对一个有个性的知名人士来说，第一种方式更完美、更崇高，而且也更可取。这两种方式都表现出同样大方的施予恩惠的欲望。但第二种方式纯粹是支取一个人的财政资本，而第一种方式则意味着要付出一个人的亲身精力。况且，支取资本也意味着慷慨的源泉迟早会枯竭。换句话说，这种慷慨是自杀性的，你现在赠予金钱的人越多，将来所能帮助的人数也就越少。相反，如果一个人的仁慈和慷慨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力量，那么，他现在帮助的人越多，他此后用来进行进一步帮助的帮手也就越多。此外，他将养成仁慈的习惯，使他在未来能更有准备而且更熟练地为更多的人提供类似的服务。

菲利普在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一封信

[1] 《为阿梅里亚的塞克斯图·罗修斯辩护》（公元前80年）。

中，正确地告诫他不要用赠款的方式来求取马其顿人的民心。这位君主写到：“你想使你用金钱收买的人成为忠诚的支持者，这是多么可悲的想法！你想使马其顿人民把你当作管家和供应商，而不当作他们的国王吗？”

是的，这就是菲利普对他的儿子说的话。他的告诫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中肯的。

慷慨在于付出一个人亲身的效劳和努力，这种慷慨肯定比另一种慷慨更高尚。而且它还可以更广泛地应用，能帮助更多的人。但是，捐款有时也是必要的，这种慷慨不能完全排除在外。经常有这样的场合，我们不得不拿出我们的私人财产来帮助那些穷困而可怜的同胞。但我们这样做应该慎重而又节制。在很多情况下，不加区别的捐款会挥霍掉全部遗产。即使你想以此方式来帮助别人，但你不加限制地放纵自己的兴趣，仿佛用完了财产才算是慷慨大方，这肯定是非常愚蠢的。况且，过于大方的施舍会导致盗窃。当一个人大量分发掉财产，以致开始感到拮据时，他便不得不把手伸向别人的财产。^[1] 尽管他的目的是靠显示慷慨大方

[1] 西塞罗无疑想到了卡提利那(公元前63年他镇压了卡提利那的密谋)、苏拉、凯撒和马库斯·安托纽斯(未来的三执政之一)的情况。

来争取亲善，但他从受惠者那里获得的亲善却抵销不了他因抢夺别人而遭到的憎恶。

换句话说，尽管一个人的钱袋不应攥得太紧，一毛不拔，但也不应大敞其口，不管是谁都可以从中摸一把。应该有个限度，这毕竟是我们的财产吗。我们应该记住一句俗语，这句俗语在罗马家喻户晓，以致成了谚语，即：慷慨是一个无底洞。那些习惯于被资助的人注定想要更多的东西，那些既得陇又望蜀的人，你能让他们适可而止吗？

巨额捐助者分为两类，奢侈的与宽厚的。那些奢侈的捐助者把钱浪费在盛宴上，大吃大喝上，格斗表演上以及盛大的比赛或狩猎上，这些东西只能给人留下短暂的记忆，甚至留不下什么记忆。相反，那些真正值得叫做宽宏大量的人，能提供赎金使囚徒摆脱匪徒之手，或承担朋友的债务，为朋友的女儿提供嫁妆，使朋友得到一份他需要的财产或扩大他已拥有的土地面积。

我真不能理解狄奥佛拉斯托斯在写《论财富》一书时是怎么想的。他的很多看法都是很高明的，但有一点相当荒谬。他极力赞扬公共比赛的豪华场面，甚至把放纵这种奢侈开销的能力视为富人最完美的特权。相反，我坚持认

为，真正慷慨的表现(我已经做了几点说明)是一种更有意义、更丰富的花费金钱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比狄奥佛拉斯托斯的观点更可取得多，而且更切中要害。^[1] 他完全采取了相反的观点，责备我们对靠倾泻金钱来收买民众好感竟不觉得惭愧。他说：“想象一下有一个城市被围困，人民不得不花一米诺钱来买一品脱水；首先我们会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惊愕，尽管后来经过思索后承认这价格出于必要是合理的。然而，我们在公共场合上庞大而无休止的铺张浪费，并没有使我们感到特别惊奇，尽管这种浪费没有满足任何迫切需要，没有给任何人带来荣誉。的确，它只能使民众高兴一时，要不了多久便烟消云散。即使那些狼吞虎咽畅快一时的最昏庸的人物，也会很快忘记这一切。”亚里士多德进而得出了这样十分正确的结论：“这种娱乐只能使儿童、蠢妇、奴隶和奴性十足的人欢快。而严肃的、能明智地权衡事物的人们，不可能赞赏这类把戏。”

[1] 这里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不到的，而且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可伦理学》第五卷(I,II)中恰恰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所以有些人认为这里所涉及的人物是阿里斯顿(希俄斯的阿里斯顿，逍遥学派的首领，公元前230年)。

但我相信，在我们国家，甚至在美好的古代时期，就连品格最高尚的市民在当市政管理官的时候，一般也可能制造这些浮夸的表现。例如，以“富翁”而知名的帕布留斯·克拉苏斯就很富有，在担任市政管理官职务期间举行了盛大的比赛，此后不久，鲁修斯·克拉苏斯和奎因图斯·姆修斯·斯凯沃拉祭司（一个非常谦逊的人）相联合，在担任这个职务时兴起了最奢侈的风尚。接着是阿皮乌斯的儿子盖阿斯·克劳丢斯，以及后来的卢加拉斯兄弟、霍屯修斯和西拉努斯，莫不如此。甚至在我当执政官的那一年，帕布留斯·伦图鲁斯的奢侈超过了他的每一个前任，后来的斯考鲁斯更是有增无减。但最豪华的表现莫过于我的朋友庞培乌斯在他第二次任执政官时的表现。^[1]

到此，我已经谈了我对这件事的这一方面

[1] 公元前97年的执政官帕布留斯·克拉苏斯是罗马三执政之一的马库斯·克拉苏斯的父亲。鲁修斯·克拉苏斯和祭司奎因图斯·姆修斯·斯凯沃拉于公元前103年任市政管理官。盖阿斯·克劳丢斯筹划了大象决斗(公元前99年)，卢加拉斯两兄弟发明了象和牛的决斗(公元前79年)。奎因图斯·霍屯修斯(公元前75年)是西塞罗的对头。德面姆斯·西拉努斯、帕布鲁斯·伦图鲁斯和马库斯·斯考鲁斯分别是公元前70、66、68年的市政管理官。克奈乌斯·庞培乌斯在公元前68年第二次当了执政官。

的看法。

尽管如此，仍有必要避免自私的嫌疑。例如，马摩库斯是一个很富的人，但出于费用的考虑，他拒绝当市政管理官，这预示着后来人们拒绝任命他为执政官。^[1] 换句话说，既然民众需要这些排场，一个明智的人有义务服从；即使他振作不起对这种观念的同情心，他也得做所要求他做的事。但在这样做时，他应该量入为出，就像我所做的那样。他不得不照民众旨意办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在某些场合下这种对民众的慷慨将有助于他在未来某个日子达到某些更真正有意义而且有用的目的。例如，奥莱斯特斯之所以赢得了有价值的亲善，乃是因为他最近以宗教祭祀为名在罗马的各条大街上举行了盛宴。在价格飞涨的时候，马库斯·塞乌斯以极低的价格为民众一次供应一配克粮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来反对他，以前不得人心一直是他的障碍，这次他最终克服了这个障碍。他当市政管理官的代价既不过分，也不丢脸。

但是，最伟大的名望是我的朋友米洛取得的。那时，我们国家的整个命运取决于能否解除对我的流放。因此，为了民族利益，米洛收

[1] 实际上马摩库斯·埃米留斯于公元前 77 年当了执政官。

买了一帮斗剑士，利用他们来推翻帕布留斯·克洛狄乌斯恶毒的恐怖主义。^[1]

所以，散发金钱可以在必要的功利基础上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即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节制依然是最智慧的政策。奎因图斯的以能干而闻名的儿子鲁修斯·菲利普斯，过去经常自夸说，他用不着在娱乐上花钱，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每一种最高的仕途地位。库塔和库里奥过去也经常这么说。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在我刚达到法定的年龄，大家一致连续几次选举我担任国家官员，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取得过如此的成就。与我的这些重要的品格相一致，我在担任市政管理官时的支出，远远算不上奢侈。^[2]

[1] 克奈乌斯·奥莱斯特斯是公元前71年的执政官。马库斯·塞乌斯的价格非常低廉，实际上等于分发粮食。公元前58年，西塞罗被他的对头帕布留斯·克洛狄乌斯流放，公元前57年护民官提图斯·米洛促使当局召回了西塞罗（米洛于公元前52年暗杀了克洛狄乌斯）。

[2] 鲁修斯·菲利普斯于公元前104年任护民官，于公元前91年任执政官。关于盖阿斯·库塔的情况见《论演说家》。盖阿斯·库里奥于公元前90年任护民官，于前76年任执政官。莱克斯·安那里斯规定了官吏的最小年龄，后被苏拉修改。西塞罗于69年任市政管理官，实际上举行了3次公共比赛。

当金钱用于国家的重要建设项目时，如城墙、船舶修造厂、港口、水渠等，这些支出是完全合理的。诚然，实际的现金施舍能提供更大的直接快乐。但从长远来看，另一种支出会造成更充分的感激之情。至于有关剧院、门廊、新庙宇和其他类似建筑物的问题，出于对庞培乌斯的敬重我不敢贸然对此提出批评，因为庞培乌斯在这方面是特别积极的。尽管如此，最杰出的哲学家们还是不赞成这类公共工程。例如，帕奈修斯对此就不以为然，在本文中我遵循了他的很多观点（尽管实际上没有引用他的话）。法利龙的德梅特留斯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指责希腊权倾一时的人物伯里克利把大量的金钱扔到了著名的雅典卫城入口上。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论国家》一书中已做了充分论述。^[1]

综上所述，以此为名的一切开销从根本上说都是不可取的，但有时这些开销也是必要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支出也应该根据赠与者的收入来调整。节制的原则须臾不可忘记。

[1] 法利龙的德梅特留斯(生于公元前350年)是雅典作家和政治家,被马其顿的卡山德立为雅典的总督。雅典卫城纪念性的有顶入口是由姆奈西克里斯(公元前435年)设计的。据推测,西塞罗的《论国家》属于他的《共和国》第五卷已散佚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类慷慨赠与，这类赠与是由一种要慷慨的欲望激发起来的。

这里我也得考察不同的接受赠与者的是非曲直。一个被灾难所折磨的人的情况，应该同一个人不曾遭到灾难而只是想过得更好的人的处境区别开来。慷慨应该偏向于前一类人，即不幸命运的牺牲品。当然，如果他们碰巧是罪有应得，那便另当别论。至于另一类人，即那些不是为了减轻困难而是为了谋求发迹而渴望帮助的人，我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援助他们，而是说我们在选择我们将给予帮助的人时，应进行认真的判断。恩纽斯绝对正确地指出：“善的行为，如果放错了地方，也会成为恶的行动。”

如果接受恩惠者是值得帮助的而且知恩知情的，那么，施予恩惠者将不仅受到这接受者的亲善报偿，而且也将受到其他人的亲善报偿。任何东西也比不了有区别地运用这种慷慨所赢得的如此之大的感激和同情，因为一个领袖人物身上的这种仁慈就像是一所圣殿，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最终要到那里去。因此，应该尽力使许多人都领受到我们的慈善，人们将永志不忘我们已做的事情，并把这种记忆传给他的孩子和他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永记赠与者的美名。每一个人都仇恨忘恩负义，所有的人都把

忘恩负义当作一种自损行为，因为忘恩负义意味着一个人将不会再受到慷慨地对待。也就是说，一个不知道知恩领情的人是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的共同敌人。

人们可以要求提供的另一种帮助，是准许赎回战俘。这不仅是对战俘本人的仁慈，而且也是一项爱国事业。同时，这些赎金可用于改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的财政状况。鲁修斯·克拉苏斯在一次演讲中详细说明，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罗马元老院议员曾习惯于给予穷人以帮助。在我看来，现在这种私人慈善活动已主要用于公共娱乐的奢侈开销。前一种馈赠使人们有希望从认真而有高度原则性的人那里得到帮助，而奢侈的表演只能使一部分人用来讨好民众，或用迷人的诱惑物来挑逗民众轻浮的本能。

除了慷慨赠与外，还有其他一些值得赞扬的德行。例如，宽厚就是一个人可以向另一个人提出的重要要求。在各种商业交易中，不论是买还是卖，是承租还是出租，是邻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关财产分割的问题，一个人都应该是公平的和合情合理的，准备在很大程度上让出自己的权利，乐意在合理的情况下避免诉讼以及其他争端。的确，这种让步通常不仅是对

别人的宽宏大量，而且从长远来看实际上对自己也是有利的。诚然，我们应该关心我们自己的财产，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财产从我们的指头缝里溜走。但我们这样做应该有些限度，不能使别人对我们产生一丝一毫的小气或贪婪的怀疑。即使一个人使用金钱可能最好的方式是把钱花在慷慨之举上，也免不了实际上免费自送父亲的遗产。

狄奥佛拉斯托斯称赞的另一种美德是好客。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品德优良的人们向品德优良的客人敞开自己的家门，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而且，外邦的来访者在我们的城市里受到这种慷慨招待，这也有助于我们民族的形象。况且，任何一个有值得尊敬抱负的人，通过对访问罗马的外邦朋友的热情好客，可以在外邦增强影响并赢得外邦的亲善。狄奥佛拉斯托斯谈到过西蒙^[1]的情况。西蒙过去经常这样款待来自他的选区的拉西亚得人。如果有拉西亚得人提出拜访他的别墅，他便命令给与提供一切方便，并责成管家着手安排。

那些不是靠赠款而是靠亲身效力而表现出

[1] 西蒙(公元前 512-449 年)：雅典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

来的慷慨之举，不仅对个人有价值，而且对国家也有价值。作为改善一个人的地位和名望的手段，最有效的莫过于在法庭上为某人辩护，也就是在这个领域里给人提供帮助。我们祖先的一个良好的风俗是他们一直敬重那些在解释我们完美法律上的专家。直到混乱时代之前，国家领导人一直亲自专心致志于这种活动。可是现在，这种职业的荣誉，像罗马其他官职的荣誉一样，已经荡然无存了。更可悲的是，现在有一位律师比他的前辈毫不逊色，而且在法律学问上胜过了他的所有前辈，却得不到他前辈的殊荣。^[1]

这种事业能博得广泛的感激之情，并能起到一种使人服从于义务的良好作用。

与立法能力密切相关的是雄辩才能，这种才能是一种更复杂的艺术，甚至是用一种更大的力量来争取亲善的举动。因为雄辩特别适用于赢得听众们的赞许，它在贫民身上唤起了新的希望，它使你为之辩护的人们萌发深厚的感激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宗把演讲术列为一切社会职业中最高级的职业的原因。如果一个人能言善辩并且乐于吃苦，如果他遵循我

[1] 指律师塞维乌斯·鲁夫斯(卒于公元前45年)。

们前辈的传统，接二连三地为民辩护，没有丝毫的勉强表现或报酬要求，那么，他将有多不胜数的机会来帮助他的同胞，这意味着他的服务使他获得了大批的受益人。

说到演讲术的问题使我禁不住再次感到悲哀，因为这种活动在罗马现已中断，甚至可以说它已完全绝迹。如若不是担心人们会认为我是在对自己的处境发牢骚的话，我倒很愿意详述一下这个论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看出，许多演讲家已经消失，可指望的东西所存无几，甚至那些在这方面具有最微不足道的才能的人也已凤毛麟角，而现存的开业律师大部分都具有爱挑衅的毛病。的确，从事情的本质来看，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是老练的律师或雄辩的演说家。即便如此，每一个人还是可以通过向同胞发表竞选国家官职的演说，为同胞向陪审团和官员作证，亲身考察同胞们的利益，寻找律师为同胞提出建议和辩护，来使他的同胞承受恩惠。那些提供了这种服务的人，也可以博得非常深厚的感激之情，收获极其重要的报偿。

还有一点建议也很重要，这里不能不提。当你打算帮助一部分人时，注意不要冒犯另一部分人。要避免一个常犯的错误，即损害一个

在道德上错误地(或非常不妥当地)受到伤害的人。偶尔做了这样的事，算是无心；故意这样做，就是莽撞。如果你漫不经心地冒犯了别人，你应该尽最大努力解释一下你迫于无奈而禁不住这样做的理由，以期得到宽恕。你应该努力提供将来的帮助来弥补你现在的过失。

在决定是否给某人以帮助时，我们一般既要考虑到他的品格，也要考虑到他的财政来源。显而易见，大多数人都会说，在施予恩惠时，对赠与人来说，受赠人的品格比他的财力更重要。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是，有谁真的认为帮助一个贫穷而有价值的人比帮助一个富裕而有权势的人更有吸引力呢？

应该承认，我们一般更倾向于帮助那些将更快地给我们以回报的人。但是，我建议人们更认真地考虑一下问题的这个方面。诚然，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实际上不能用实用的东西报答我们恩情。但如果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他至少会用他的心来报答我们。正如有人巧妙地说的：那样：“有钱的人不会还钱，还钱的人不会有钱。”但这并不适用于感恩。因为即使受益人已经报答了恩情，他也仍具有感恩之情。的确，他具有这种感情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恩

情得到了回报。

相反，那些自认为富裕、有名望而且幸运的人，不喜欢因接受别人的帮助而承担义务。的确，如果别人帮助了他们，甚至是重大的帮助，他们也认为是他们施了恩惠，而不是接受恩惠！假使他们可以给予某种回报的话，他们会对某种不利于他们的要求非常敏感。他们宁可死也不愿意承认他们像平民一样受惠于保护人。

而一个穷人如果受到了别人的恩惠，他乐于相信这是出于他个人的状况而受到的恩惠，别人不是在图谋他的财产。结果，他会尽一切努力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不仅对那个已经给他帮助的人，而且也对那些在将来有可能给他类似帮助的人。因为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者。如果他打算以效力作为回报，他将竭尽全力，而且毫不吹嘘自己做的事情如何重要。

这就是在这里我们应强调的另一要点。如果你为之辩护的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命运宠儿，那么你将只得到他本人的感激，也可能还有他孩子们的感激。但如果你为之辩护的是一个贫穷但诚实而可敬的人，那么，每一个和他同样贫困而诚实的人（民众中包含着一大批这样的人）都将把你当作他们的可靠保护人。因此，我

的结论是，向正派的受益人投资胜于向富人们投资。

诚然，理想的行动方针是施恩惠于各种状况下的人们。但由于在这一点上会产生冲突，我觉得我们最好遵循狄密斯托克利^[1]的建议。有人问他，他准备把女儿嫁给一个诚实但贫穷的人，还是嫁给一个名声不好但富裕的人。他回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没有钱的人胜于喜欢没有人格的钱。”

今天，我们整个道德态度因为崇拜金钱而腐败堕落了。但是，一个人不论多么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这只对他本人来说是一种优势，然而也许甚至不是什么优势。不管怎么说，我们假定这是一种优势吧！也就是说，他会有更多的钱花。但这能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如果他的品格是优良的，那么他的财富肯定不会妨碍别人给他以帮助。但这也不应被当作帮助他的特殊理由。我们作出的决定不应依赖于他富有的程度，而应纯粹甚至唯一依赖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作出提供帮助决定的主要原则。你决不应赞成倒退的行动，站在错误的一方反对

[1] 狄密斯托克利（公元前528-462年）：雅典国务活动家。

正确的一方。既然一切不朽名望和荣誉的根源是正义，那么只有正义的东西才配得到我们的支持。

关于对个人的帮助，就谈这么多。下面论述一下对国家利益的贡献。这类行为是直接针对全体民众的，而其他行为尽管也可以使整个国家受益，却是以某种形式来帮助这个或那个人。此外，后一类行动比前一类行动能博得更大的感激之情。如果可能的话，对这两类行动我们都应予以重视。

当我们给每个人都提供服务时，也就是说当我们着眼于民族利益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介入应该真正而且在实际上有利于整个国家，至少我们做的事情不能违背国家利益。以盖阿斯·哥拉克库斯为例。他大规模地免费分配粮食，使众多个人受了益，但他却穷竭了国家库存。相反，马库斯·奥克塔维乌斯有节制的分配，不仅满足了较贫困的一部分人的需要，而且也有利于国家。^[1]

[1] 这里指的是盖阿斯·哥拉克库斯于公元前123年初担任护民官时的情况。公元前120年的护民官马库斯·奥克塔维乌斯施行谷物法，后被一种较保守的措施所取代。

每一个位居政府高官的人都义不容辞地绝对相信，一切公民的私有财产都应得到保护，国家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犯公民权利。

例如，鲁修斯·菲利普斯力图通过一项重新分配土地的法案，是不能令人容忍的。^[1]的确，当这一法案被拒绝时，他非常冷静，就此而言，他算得上有节制的。但是，在他以前为得到民众支持而进行鼓动时，他提出了恶意的论点，认为整个国家的全部财产所有者加起来不过2000人。为此他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罗马公民的权利，因为他的话意味着他在支持对一切财产的平等分配，这将是再大不过的灾难。的确，国家和城市之所以能组织起来的基本原因，首先是在于维护私有制。诚然，人民已经出于一种自然的本能而自发地结合成社团。但他们寻找城市庇护所的原因却在于，他们想保护他们的个人财产。

当连绵不断的战争使罗马国库告罄时，我们的前人惯于征收一种财产税。现在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重新征收这种税，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保证再不需要这样做。我现在说的这番话不是特指罗马，而是指整个世界，因

[1] 在公元前104年他担任护民官期间。

为当我做出不祥的预言时，我宁愿这些预言针对的是别的国家，而不是我们的国家。如果有哪一个政府觉得有必要征收财产税的话，应该极其认真地向全体人民说明，如不这样做整个国家就要崩溃。

显而易见，一切掌管国家事务的人也应义不容辞地保证，人民将得到充分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在正常条件下如何这样做，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我就不必解释了。这种义务是一目了然的；刚才出于论述完整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又提及它。

在一切公众事务上，最根本的是要避免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贪婪嫌疑。塞尼阿姆人盖阿斯·庞提乌斯^[1]一度声称：“如果命运女神能使我的生命延续下去，直到亲眼看到罗马人开始接受贿赂，那该多好啊！因为到那时，我将在一天之内灭绝他们的帝国。”是的，他已经等了几个世纪了。只是到最近，这个祸根才开始降灾于我们的民族事务。如果庞提乌斯过去像现在看来那样可怕，我倒希望他生活在过去，而不是生活在现在。自鲁修斯·皮索通过了他的惩

[1] 盖阿斯·庞提乌斯，于公元前 321 年在考迪尼岔口战役战胜罗马人。

处非法收入的法律以来，不到 110 年^[1]，以前从没有这样的法令。从那时起，产生了许多多类似的措施，一个比一个严格。很多人曾被押上审判台，受到了惩处。正是由于害怕法庭下一步的行动，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意大利战争。^[2] 后来，法庭连同法律都失去效力，我们的臣属盟国个个都遭到掠夺。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我们所具有的任何力量都不是出于我们的长处，而是出于别人的弱处。

帕奈修斯称赞小阿弗里坎努斯在公共事务上不贪婪。这种称赞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人们可以认为阿弗里坎努斯甚至具有更大的美德，因为对这种特殊品质、他的自制力的称赞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他生活的时代。例如，当鲁修斯·鲍鲁斯拥有马其顿的全部财富时^[3]，他给我们的国库带来那么多金钱，以致他的掠夺物、一个将军的掠夺物就足以永远抵销财产税。但除了不朽的名望之外，他没有给自己的家里带来任何新的财产。他的儿子，小阿弗里坎努斯以父亲为榜样，在征服迦太基时，也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他的同事监察官鲁修

[1] 公元前149年立法建立永久法庭审理贿赂和敲诈案。

[2] 马西亚战争(公元前91-87年)。

[3] 公元前168年他在皮德纳战胜马其顿王波修斯。

斯·姆纽斯，在彻底摧毁世界上最富的城市之后，也没有赚取一分钱。^[1]他的雄心不是去装饰自己的家庭，而是去装饰意大利。在我看来，正是凭靠这种态度，他实际上以最荣耀的方式装饰了自己的家庭。

如前所述，在整个世界上最肮脏的罪恶莫过于贪婪，如果这种罪恶发生在知名人士和政府领袖身上，就尤其肮脏。利用国家事务来谋取私利，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十足的罪行。阿波罗通过他的女祭司之口宣称，唯一能击倒斯巴达力量的东西就是贪婪，他的预言也可以应用到其他一切成功的民族上。这些民族的统治者赢得亲善的最佳方式是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

当政治家们热心于作为人民的朋友提出分配土地的议案时，他们想的是把现有的所有者逐出家园。或者，他们打算使借债者不用还债。

持这些观点的人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的社会所依赖的基础。首先，他们是在毁坏国家的一种因素与另一种因素的和谐关系。如果借债者可以不按他们借债数目还债，这种关系也就

[1] 公元前146年鲁修斯·姆纽斯压服了亚该亚联盟并摧毁了科林思。

不可能存在下去。进一步说来，一切怀有这些意图的政治家都是为了给整个正义原则以致命打击；因为一旦财产权被侵犯，正义原则也就从根本上受到破坏。我重申一遍，每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特定职能就在于保证它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不受干扰地享有他的财产。

那些提出这种措施的政治家，会给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不能成功地赢得他们渴望的民心。凡被剥夺了自己的财产的人，都会自动地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分得土地的人则会说他从不要这样的土地。或者说，如果他的债务被一笔勾销，他会煞费苦心地掩饰自己的满意之情，以使人们不认为他曾是无偿还能力的人。而受到损害的一方，不仅会记住这种损害，而且会怨恨所看到的一切。所以，即使这种不公正措施的受益者在数目上超过了牺牲者，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将更有影响。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数目算不上决定因素。总之，即使撇开这一切不谈，让那些多年甚至几个世纪拥有家庭财产的社会阶层把财产移交给那些从不占有任何财产的人，使正当的所有者丧失他们的财产，也是完全不公正的。

正是这种不公正导致斯巴达人放逐了他们

的民选长官赖山德，处死了国王阿吉斯，这是他们史无前例的行动。^[1] 这些君主的政策使他们的城市陷入纷争之中，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暴君被绞死了，贵族被放逐了，以前治理得井井有条的社会土崩瓦解了。衰亡的民族不单是斯巴达，起源于斯巴达的邪恶风气到处蔓延，它们污染的结果使整个希腊陷入灾难之中。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哥拉克奇兄弟，他们著名的台比留·哥拉克库斯的儿子，是大阿弗里坎努斯的孙子。他们力主重新分配土地，从而导致他们跨了台。

相反，西塞昂的阿拉图斯却赢得了高度赞扬，而且非常正当。在西塞昂被暴君统治 50 年后，阿拉图斯从阿戈斯秘密返回这个城市，并掌握了控制权。^[2] 他纠集了 600 个流放者，这些流放者以前曾是这个国家最富的人，不知不觉地推翻了暴君尼库克勒斯。阿拉图斯的到来，解放了西塞昂。但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使他陷入重重困难之中。一方面，他承认如果不满足那

[1] 这里指的是李祥斯的儿子赖山德，而不是著名的赖山德，前者支持公元前 242 年阿吉斯四世的土地改革。

[2] 阿拉图斯(卒于公元前 213 年)于公元前 251 年获得了西塞昂的控制权。

些他从流放地带来的人，即其土地曾被别人侵占的人的要求，是完全不公正的。另一方面，似乎也不应该扰乱已达50年之久的使用权。此外，在这一漫长时期中，许多财产已经通过继承、买卖或嫁妆形式无懈可击地转移到别人手中。因此，阿拉图斯决定，尽管剥夺目前占有者的财产是错误的，但以前的所有者应该获得某种东西作为补偿。

总之，为了应付这种状况，显然需要金钱。所以，阿拉图斯宣告他将到亚历山大旅行，并命令在他回来之前一切事情不许变动。于是他渡海去找他的托勒密，托勒密是亚历山大建立埃及的二世国王。^[1]阿拉图斯向这位国王解释说，他想在西塞昂恢复自由的立宪政府，叙述了他打算的行动。托勒密的财力十分丰富，乐意给阿拉图斯以他需要的大量津贴。于是，阿拉图斯满载而归，建立了由该城15位领导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他考察了两类人的情况，一类是正在占有理应属于别人的财产的人，另一类是曾被剥夺了财产的人。阿拉图斯命令，对所有有关财产进行估价，说服一些占有者放弃手中的财产，接受补偿费。同时，

[1] 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夫斯(公元前283-246年)。

他使他的一些追随者相信，接受一笔现金，而不重新夺回他们以前的财产，是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这样一来，每一个当事人都感到满意，和谐关系成功地重新建立起来了。

阿拉图斯是伟大的政治家，他要是一个罗马人该有多好啊！这就是正确对待自己同胞的方式，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种情况正相反，即拍卖者的长矛插在广场上^[1]，罗马公民的财产被任意处理掉。希腊人阿拉图斯是一个智慧的令人钦佩的人，他认为自己的义务是维护他的社会的每一个阶级的利益。的确，不允许不同集团的特殊利益有什么差别，而应无党派偏见地统一整个社会，这是品格正直的公民的政治才能和智慧的真正标志。其他人也许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会说：“让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财产，并据之为生，不付任何代价！”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当我为自己买来一份财产，建造了它，维持了它，在它上面花了钱时，为什么你不顾我的意愿而可以占有它呢？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不可避免地一个人就会被剥夺属于他的东西，而对这种东西没有丝毫权利的人就会攫取这种东西。拒付债务也属于这

【1】在苏拉和凯撒统治下。见本书 133 页。

样的问题，完全是同一回事。它意味着你是用我的钱来买你的农田。你得到了农田，而我却没有得到钱！

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是，我们应该绝对保证，私人债务不能达到造成民族危险的程度。为保证这一点，有各种方式。但从债权人手里夺取金钱，给债务人以某种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根本不是解决办法。国家安全的最可靠保证是健全的信誉，一旦你不再把还债当作强制性义务，健全的信誉也就不复存在。

在我任执政官时，出现了最激烈的鼓动赖账的行动。各种状况下的人都被卷了进去，他们武装起来，加入了军队。我勇敢地抵制了他们，结果把这种瘟疫似的事情从我们民族生活中连根铲除。尽管当时的债务是空前地多，但也空前彻底而迅速地得到了偿付。因为一旦堵死了逃避这种义务的任何可能性，还债也就被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有一个当时被挫败的人却最终获得了胜利，他最终把他的旧计划付诸了实施，尽管这计划在当时还不是为他个人谋取私利的问题。他这个人对犯罪行为有强烈的欲望，即使他不存在着犯罪的个人动机，也纯粹为了犯罪行为的缘故而着迷于犯罪行

为。^[1]

所以，掌握我们国家利益的人应很好地避免那种剥夺一个人的财产而赠与另一个人的慷慨行动。他们应集中精力保证法律和法庭的公正，保护每一个公民安全地占有他自己的财产。他们应该确保，不能因为穷人贫穷而欺诈他们。但他们同样应该保证，不能出于妒忌的偏见而阻止富人保持他们的财产或重新获得他们一度拥有而现已失去的东西。

我们国务活动家的首要任务是竭尽全力来增长我们国家在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力量、领土和税收。这些任务是崇高的。我们的祖先一再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任何着手进行这些崇高任务的人尽可放心，他将不仅对国家做出辉煌的贡献，而且也将为自己赢得巨大的民心 and 光荣。

关于这些有利之处的原则，蒂雷的安提巴特，即最近死在雅典的那个斯多噶哲学家^[2]，

[1] 西塞罗断定，取消债务是卡提里那计划的一部分，他在任执政官（公元前63年）期间镇压了卡提里那的阴谋。西塞罗认为，凯撒在执行卡提里那计划上有一手，凯撒之所以“最终获得了胜利”，是因为他公元前49年及此后几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实际上是政治家的措施），以应付极其严重的债务问题。

[2] 安提巴特使小卡托信奉了斯多噶哲学。

表达了一种观点，认为他的前辈帕奈修斯忽略了两个主题，即关心健康和关心金钱。肯定这两种东西都是有利的。但我认为，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之所以忽略它们，乃因为他认为这两点是不言而喻的。

保持健康的方式是了解一个人自身的体质，懂得什么有利于健康和什么不利于健康，并在一个人所有生理需要方面厉行节制，控制感官享乐。此外，信赖劝告者的忠告也是可取的。

在一个人的财政事务上，赚钱是一种义务；但赚钱只能靠诚实的手段。靠精打细算来节省金钱，用类似的办法来聚积一个人已获得的东西，也是一种义务。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在他的著作《财产经营》中对这些问题做了极其恰当的考察，在我大约当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把这本书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1]然而，关于赚钱和投资以及花钱（我倾向于加上）的问题，更适合由聚集在“中神门”^[2]的可尊敬的绅士们来讨论，而不怎么适合由哲学家来讨论，不管这些

[1] 色诺芬（公元前430-354年）的《经济学》。青年马库斯当时约20岁。

[2] “中神门”是交易所。它可能就是罗马广场旁边的门神庙。参见M·格兰特《罗马广场》，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1970，第218页。

哲学家属于什么学派。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记住这些东西是存在的，因为它们属于有利的范围，而有利性是本卷的话题。

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主题曾分为3部分。但现在出现了第四部分，这部分相关于当一种有利性超出了另一种有利性时所产生的问题。帕奈修斯根本未谈及这类问题，但对这类问题的估价却经常不乏尝试。例如，经常有必要衡量一种生理性质相对于从外部环境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外在的或偶然的特性的有利性或优势。进一步说，如果你单独考虑这两类东西，那么在同一类东西中都包含着应被衡量的对其他东西的潜在优势。

我依次来考虑这两点。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对生理的优势和外在的优势权衡一下，也就是说，你是想健康还是想富裕？于是就进到了第二点，如果你单独考虑生理的优势，并试图相对估价一种生理状况对另一种生理状况的优势，那么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你是想强壮还是想敏捷？或者说，如果一种外部性质的优势，是你将不得不考虑的东西，那么荣誉是不是比财富更可取呢？你认为是从城市财产还是从农场获得收入更好一些呢？

顺便提一句，当人们要求执政官老卡托说明他认为在国家财产上什么是最重要的活动时，他就是进行这种比较的。^[1]他说：“养牛有益。”人们问他接着做什么，他说：“养牛非常有益。”如果“养牛不成功”，那么只好“种庄稼”。后来，人们问他对放债的看法，他回答说：“你们等于是在问我对谋杀的看法。”

在人们通常权衡的利益问题上，这就是无数解释中的一种解释，所以，在我们解决义务问题时，有必要再加上这第四类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看其他问题。

[1] 图斯库鲁姆的长老（执政官）卡托写了一篇论文《农业》（公元前160年）。

论义务(三)

实践准则

对道德义务最透彻的分析，无疑是帕奈修斯的分析，总的说来，我略加变化地沿循了他的分析。与这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主题相关的问题，帕奈修斯分为3类：

1. 一件事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还是错误的？
2. 它是有好处还是无好处的？
3. 如果明显的正当和明显的好处发生冲突时，我们对二者进行选择的根据是什么？

帕奈修斯写了一篇由3部分组成的论文来论述这3个问题的头两个，而第三个问题他打算在适当的时机来阐述。但他从未实现他的诺言。在我看来更为惊奇的是，在他的著作的头

3 部分发表 30 年后，他仍然活着，却未实现自己的诺言。他的学生波塞多纽斯记述了这一点。波塞多纽斯在一些注释中简单地提及这个论题，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也没有对此充分加以研究，他表达的观点是，在整个哲学领域里再没有比这更至关紧要的论题了。

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帕奈修斯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他是故意略而不谈的。既然在正当和好处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的可能性，那么对这个论题就根本不需要讨论。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毕竟，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既然帕奈修斯在他的分类中列出了这第三类问题，他怎么会完全避而不谈呢？但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他列出了这一论题，但从未研究它。如果某人列举了 3 个问题，并完成了前两部分的任务，显然还有第三部分在等待着他。何况，帕奈修斯在他的著作的第三部分结束时实际上许诺了他将在适当时机研究这第三个论题。

在这一点上，波塞多纽斯是一个可靠的证人。在他的一封信里，他引用了帕布留斯·鲁提留斯·鲁夫斯^[1]关于科斯的维纳斯像的赞叹，鲁

[1] 公元前 105 年的执政官、政治活动家、雄辩家和文人。科罗芳的阿培勒斯(公元前 4 世纪)曾为亚历山大大帝画像。

提留斯本人也是帕奈修斯的学生。鲁提留斯说，任何画家都没有能力完成阿培勒斯尚未完成的那部分画像，因为维纳斯的面孔被阿培勒斯描绘的如此之美，以至别人再无法充分表现维纳斯其他部分之美了。同样，帕奈修斯写下的东西具有如此杰出的性质，以致任何人都不能补上他略去的东西。

帕奈修斯的意图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一开始就把这第三类论题包括在他研究道德义务的计划中，他是不是合理，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斯多噶派认为，正当是唯一的善。而你们逍遥学派主张，正当是最高的善，因为其他一切东西结合起来也不能打破这种平衡。现在在这两种学说看来，至少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好处决不能同正当相冲突。所以，在传统上苏格拉底经常咒骂那些从一开始就想把不可分割的东西区别开来的人。斯多噶派同意他的观点。他们认为，每一种在道德上正当的东西都是有好处的，而任何不正当的东西是决不可能有利的。

相反，那些以快乐或不痛苦为可欲性尺度的人说，正当只有作为利益的根源才值得培养。假若帕奈修斯也是主张同样观点的人，那么他也会认为正当和好处之间的冲突是可思议

的。然而，他根本不是这样的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把正当解释为唯一的善，并做出判断说，那些同正当相冲突的东西，不管看起来多么有好处，实际上有了它们并不会使生活更好，没有它们也不会使生活更坏。所以，我们最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帕奈修斯不需要对正当的东西和表面上（假虚的）有好处的东西作出比较。

此外，斯多噶派的理想是顺应自然而生活。我猜测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生活上应该永远坚守道德上正当的行动过程，即使我们还有别的目的，我们也应该只选择那些同这些过程并不冲突的目的。在斯多噶思想学派看来，这就是决不存在利益高于正当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所以，哲学讨论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然而，问题并不到此为止。最真实而且最完全意义的道德上的善，即善和正当完全是同义的，只能在那些假设的具有理想智慧的人身上找到，任何缺少这种完美智慧的人都不可能自称是完美的善，在外表上他只能达到大部分善。这些人是缺乏这种理想智慧的人，这些人的道德义务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斯多噶派把这些义务叫做“第二流的”义务。它们是世界上每

一个人义不容辞的义务，所以它们的应用怎能不更广泛呢！况且，理解力上的天性正派和进步使许多人能实践这些义务。

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理想的无限制的义务，即完美的义务，或如斯多噶学派所说，“满足一切数目”，这是唯有理想的智慧者才能实现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别的行动，从这些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流”义务的作用。当后一种情况产生时，通常会给人们以一种非常一般的印象，即在这里也进行了一种理想的行动；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实际上这种行动缺乏理想——他们的智力不足以把握所缺乏的东西。对诗歌、绘画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判断，显示了同样的缺点：被齐一化的读者和观察者称颂和赞扬那些并不值得赞扬的东西。明显无知的人们能够把握这些诗歌、绘画等等所具有的优点，却不能识别它们的不足之处。他们需要专家指导，这样他们便很快更改他们的意见。

我在本文中论述的义务，是斯多噶派同“第二流的”善相提并论的义务，这种善不是唯独假设的理想智慧的人才具有的，而是同整个人类相关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不缺乏善的人，都应承担这类义务。以德修斯父

子^[1]或西皮奥两兄弟^[2]为例。我们把他们叫做“勇敢的人”，我们把盖阿斯·法布里修斯·鲁西努斯^[3]描述成“正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像真正智慧的人那样是勇敢或正义的完美典型。因为在我们所说的“智慧”这个词的理想意义上，他们都不是智慧的。而且执政官卡托和盖阿斯·莱留斯也不是智慧的，尽管他们享有智慧之名。在这种意义上，甚至七贤^[4]也不是智慧的，他们只是具有和智慧者相似的外表，因为他们一直履行的是“二流的”义务。

我们知道，当理想上正义的东西同明显的好处相冲突时，用前者来反对后者是错误的。同样，也不应该用明显的好处来反对这种“二流的”正义，这种正义是每一个渴望善的名望的人所培养起来的。我们在道德上注定要认真地珍爱并遵守我们的理解力所能把握的这种程度上的正义，正如在理想上智慧的人必定认真

[1] 父子的名字都叫帕布留斯·德修斯·姆斯。据传父亲曾在可能伪传的第一次塞尼阿姆战争（公元前343年）中自愿牺牲，儿子在同高卢人、塞尼阿姆人和意大利鲁里亚人的桑提纽姆战役（前295年）中阵亡。

[2] 兄长是阿弗里坎努斯，弟弟是纳梅萨克。

[3] 盖阿斯·法布里修斯·鲁西努斯是公元前280和公元前278年的执政官，公元前275年的监察官。

[4] 毕亚斯、齐罗、克罗布鲁斯、皮塔库斯、培里安德（或迈森）、梭伦、泰勒斯。

地珍爱在完全理想的意义上正义的东西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进步，去取得善。

所以，那些实现了其道德义务的人，完全可以被当作善的。但那些习惯于权衡正义的事业和有好处东西之优劣的人，则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类别。他们和善良的人不同，他们用利润和收益来判断每一种事物，在他们看来，利润和收益同正义的东西是可以同样估价的。帕奈修斯注意到，这些人经常抱着怀疑态度来权衡这两种东西之优劣。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们是说他们经常这样做，而不是说他们应该这样做。因为宁要好处不要正义不是唯一的罪恶。甚至试图对这两种东西进行比较，在二者之间犹豫不决，也是有罪的。

但能否存在一种偶然事件，使得这种怀疑和特殊考虑有正当理由呢？我相信是能的。某些情况错综复杂，难以估价。有时，一种一般被视为错误的行动过程，反倒证明不是错误的。让我们引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可以更广泛地应用。最可怕的罪行莫过于杀害一个不仅是一个同胞而且是一个亲密朋友的人。然而，如果一个人杀害了一个暴君，那么，不管这两个人以前是多么亲密的朋友，他也不算

犯罪。无论如何，罗马人民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把已做的这种行动^[1]视为最杰出的高贵行动。在这个例子里，好处压倒了正义吗？不！好处来自正义。

尽管如此，有时好处也会给人以一种同正义的东西相冲突的印象。为了避免在出现这种情况时作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应该建立某种准则，以指导我们比较这两种东西，并忠实于我们的义务。这准则将符合斯多噶派的学说和体系。这学说和体系是本文的模式，我将告诉你们为什么。诚然，学园派的早期成员和你们的逍遥派（二者一度是不可区别的^[2]）都认为正义比表面好处更可取。但斯多噶派更进一步，实际上把好处同正义统一起来，认为一个事物在能带来好处之前应是正义的。这种观点比逍遥学派和早期学园派的信念给人的印象更深，因为逍遥学派和早期学园派认为，某些特殊的善的行动也许没有好处，而某些有好处的行动也许不善。然而，我属于新学园派，新学园派允许人们有更广泛的自由来采取任何受或然性支持的理论。

[1] 即当时对凯撒的谋杀。

[2] 学园派的奠基人柏拉图和逍遥学派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都从苏格拉底那里吸取许多信念。

作恶的不合人情性

现在来看一下我的准则。

是的，从别人手里夺取某种东西，即损人利己，比死亡、贫困或痛苦及其他生理上或外来的打击更不合人情。从一开始，它就冲击着人类社会和群体的根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打算为了私利而互相抢劫或伤害，那么，我们显然是在破坏世界上最明显属于大自然创造的东西，即把每一个人同别人结合起来的纽带。不妨设想一下，我们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自己的意识，都想为自身的利益而盗用相邻肢体的力量，该是何等的灾难！毫无疑问，整个身体不可避免地会垮掉并死去。同样，抢夺和盗用别人的财产，也将导致人类社会、人类博爱的崩溃。即使一个愿意为自己挣取生活收入而不愿为别人谋求利益，没有什么不合人情的东西，天性也禁止我们靠掠夺别人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财产和资源。

的确，一个人不应该损人利己，这种观念不仅是自然的法则、国际上通行的原则，同时也属于每个社会为其民族目的而建立的法规。这些法规的要义和意图在于，每一个公民都将安全地和他人一起生活，任何企图破坏这种联系的人都要受到罚款、监禁、流放或处死。

这个结论甚至更强制性地来自自然的合理原则，即同时支配神和人的那种规律。凡服从这一原则的人（任何想按照自然法则生活的人都应服从这一原则），决不会犯觊觎别人财富或攫取别人财产为已有的罪恶。因为品格伟大、英雄主义、谦恭、正义和慷慨，比起自我放纵，富裕甚至生命来说，更符合天性得多。但蔑视这后一类东西，同共同之善相比较而不承认它们有任何重要性，却需要有一种英勇的高尚的心灵。

同样，以海格立斯^[1]为榜样，历经千辛万苦来帮助和拯救地球上一切民族（不论你外表或力量上多么高超），比起以大量的金钱和乐趣过着隐居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更真正合乎人性。人类感激海格立斯的帮助，民心把他列入众神之列。也就是说，最完美最高尚的人物宁愿过一种献身的的生活，也不愿过一种纵欲的生活。人们可以做出结论说，这样的人顺应了天性，根本不可能损害他们的同胞。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解释那种损人利己的人。要么他看不出他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合人情的地方，要么他根本不承认损害别人比死

[1]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主神宙斯之子，曾完成12项英雄事迹。

亡、贫困、痛苦，丧失孩子和亲戚朋友更可悲。如果他从损害别人的行为中看不出什么不合人情的东西，他是否就无可非议呢？不！他是在从人类那里拿走使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如果他退一步承认应该避免这样做，但又认为死亡、贫困和痛苦是更不可取的事情，他也是错误的。他不应该认为，他个人人身或他的财产的任何损失比道德过失更坏。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抱着一个目的：把每一个人的利益同所有他人的利益统一起来。一旦人们争相强取豪夺，人类社会也就将彻底崩溃。大自然之所以规定每一个人都应该帮助其他任何一个人，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所有人都有着统一的利益。具有统一的利益，意味着我们都应服从同一种自然法则，而这种自然法则至少命令我们不应彼此损害。从我们最初假定的真理中，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个结论。

如果有人主张（正如他们有时所做的那样），他们无意为了自身的收益而掠夺他们的父母或兄弟，但掠夺别的同胞可另当别论，这种主张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同样是在否定他们和他们的同胞的共同利益，否定由此而来的一切法律的或社会的义务。这种否定破坏了整个民族生活的结构。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应

该重视同胞的利益,但不必重视外国人的利益。提出这种观点的人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整个基础,这种破坏意味着废除一切仁慈、慷慨、善良和正义。这是亵渎神灵的罪恶,因为神灵创造了这个社会,而这些人却企图破坏它。把这个社会结合起来的牢固的纽带是这样一种信念:损人利己比一个人的亲身或财产上的任何损失都更违背人情,甚至比一个人灵魂上的损失更违背人情。也就是说,决不能违背正义,正义是一切美德的君主和女王。

困难的道德决定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几点可能的异议。

(1)假定有一个非常智慧的人因饥饿而奄奄一息,他难道没有理由拿取属于完全无用的他人的食物吗?(2)假定一个诚实的人有机会偷走像法拉利斯^[1]这样残忍而无人性的暴君的衣物,以免被冻死,他难道不应这样做吗?

这些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抢夺一个即使是完全无用的人的东西,也是一种不合人情的非人性的行动。然而,如果你能活下去,你的品质使你能够对你的国家和

[1] 西西里岛阿克拉斯(阿格里真托)的暴君(公元前570-544年),据说他曾把人放进铜牛里活活烤死。

人类做出很大贡献，那么，出于这种理由而拿取别人的东西可以问心无愧。但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每一个人都应该忍受自己的不幸，不能靠损害别人改善自己的不幸。我举出这种可能的例外情况，并不是说一般讲盗窃和贪婪比疾病、贫困等更合乎人性。我所说的要点是，忽略共同利益是不合人情的，因为它是不公正的；自然的法则增进且符合共同利益；因此这种法则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一定同意生活资料可以从低能的无用的人手里转交给智慧、诚实、勇敢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的死亡将是社会的一个重大损失。但在这种情况下，智慧的人也应该避免过分的自重和自负，因为过分的自重和自负只能导致错误的行动方式。如果他避免了这些陷阱，他将尽他的义务，促进他的同胞以及人类社会的利益。

至于有关法拉利斯的问题，也很容易做出回答。我们和独裁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实际上，我们和他们是大相径庭的。如果你能的话，剥夺一个在道德上理应处死的人的财产，没有任何不合人情的地方。的确，这一帮罪大恶极的独裁统治者，应该从人类社会中铲除出去。如果肢体已经坏死，失去活力，截去它们是一件好事。所以，应该从人类躯体上割除这些赘附

的凶猛残忍的畸形物。

这就是那些使我们感到困惑而难以确定的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义务问题。而且我相信，帕奈修斯如若不是因偶然事件或精神分散而改变了他的计划的话，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确，他的著作的前几部分已经就这类问题制定了大量的准则。这些准则已经指出，应该把哪些行动方式当作错误的而加以避免，把哪些行动方式视为正确的而予以肯定。

诚然，本文的结构还不完善，但完善不是远不可及的，总是有限度的。数学家们经常通过排除对某些命题的证明并设定一些结论是不证自明的，来简化他们的论证。我将采取这样的方式。我请求你，我的孩子，对我退让一步（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承认我们应该针对的东西无非是正义的东西。即使克拉提普斯禁止作出这种让步，至少你应向我承认，正义比别的任何东西更值得重视。这两个假定的任何一个，对我的目的来说都已足矣。时而这一种假定更令人信服，时而另一种假定也令人信服。离开了这两种假定，便不可能作出任何结论。

在继续论述之前，我应该先驳斥一种对帕奈修斯的指责。他从未不恰当地断言在某些环

境里好处可能同正义相冲突。他说的是外表的好处可能同正义相冲突。他通常总是主张，凡不正义的东西是不可能有好处的，凡没有好处的东西是不可能正义的。他指出，降临在人类头上最大的灾害莫过于主张把这两种东西割裂开来的态度。所以，他假定的冲突不是真正的冲突，而只是表面的冲突。他根本不允许我们把好处说成高于正义，而是认为在有些场合下我们不得不辨别真正出现的是好处还是正义，或者它们的外观是不是虚幻的。他的意图是帮助我们正确地做出决定。然而，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帕奈修斯毕竟没有论述外表的冲突这个论题。所以，在我下面关于这个论题的论述中，我将孤立无援，单独进行自己的战斗。诚然，我已经了解了帕奈修斯之后的著述家们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但我本人觉得这些研究不是令人满意的。

当我们碰到貌似有理的好处时，我们禁不住会心领神会。但认真的考察可以揭示这种外表上有好处的行动有某种道德上错误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出现放弃好处的问题，因为不言而喻，凡错误的地方是决不会有真正的好处的。大自然要求，万物都是正当的，与自身以及彼此之间是和谐的和一致的。但是，

与自然最不和谐的莫过于作恶，同样，与自然最和谐的莫过于真正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好处不可能和错误共存。如果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天生（我们的本性迫使我们）就追求道德上正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是采取芝诺的观点，认为这是唯一值得努力做的事情，还是采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无论如何这是比其他事更值得做的，我们都应该做出结论说，正义是唯一的善，至少是最高的善。既然善肯定是有好处的，那么与善相统一的正义，也是有好处的。

一个人如果一心只考虑表面的好处，并断然使之脱离何为正义的问题，那么他就是错误的和不道德的。这种立场是暗杀、投毒、伪造遗嘱、营私舞弊、对外省人和罗马公民毁灭天性剥削的根源。它的另一个结果是强烈的欲望，渴望穷奢极欲，渴望无止境的暴虐，最终渴望对自己国家的专制统治。这些欲望是最可怕而且最可憎的东西。被这些情感所激发起来的人的邪恶智慧，只知道物质报酬，不知道惩罚。我说的惩罚不是法律规定的惩罚，因为这些人经常能够逃脱这些惩罚。我说的是最可怕的惩罚，即他们自身的堕落。

那些邪恶的不信神的人，不知道走哪条路，

要么走他们认为正确的路，要么是故意而且自愿地深陷罪恶之中，让他们走开吧。因为单是他们犹豫不决这一事实，就是一种罪过。某些行动过程是不容考虑的，那怕是暂时停止不前也是邪恶的。而且这种犹豫不决者也无法靠私下保密来掩盖他的罪过。如果我们学过哲学的话，我们至少应该懂得，我们向任何一个神和人保守的秘密，并不能使我们解除制止一切贪婪、不公正、放荡或其他不合理行为的义务。

苛刻的习俗与法律

如果阿奎留斯^[1]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应该完全剔除对事实的误解或隐瞒。他的规则的应用将意味着，任何从事买卖的正派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收益而弄虚作假。的确，甚至在阿奎留斯时期之前，就有对这类罪过的法定惩罚。例如，《十二条》^[2]对幼年子女监护权方面的犯罪做了惩罚规定，普拉托里法对欺骗未成年人的犯罪做了惩罚规定。在某

[1] 西塞罗任执政官时的同事(公元前66年)。

[2] 罗马最早的基本法典,公元前451-450年颁布,普拉托里法(公元前193-192年)第一次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25岁以下)做了区别规定。

些衡平法案例中，出于善良信念的要求，也就此目的制定了条文。同样，一切其他民事诉讼突出了这样的条款：在对一位妻子的财产进行仲裁时，越公平越好，在托管权案例上，诚实的人之间应进行诚实的交易。的确，如果我们应用了越公平越好的条款，还怎能出现不诚实的问题？诚实的人之间应进行诚实的交易的规定，没有为任何欺骗性的不道德的行为留下丝毫可乘之机。

此外，正如阿奎留斯所指出的那样，颠倒黑白等于欺骗罪。换言之，应当把欺骗从商业交易中完全清除出去。例如，任何卖主都不应雇佣一个假冒的出价人来哄抬物价；买主也不应雇佣一个代理人来压价。他们双方在进行交易时，应该一次了结地提出他们的价格。

帕布留斯的儿子奎因图斯·姆修斯·斯凯沃拉^[1]，想买一处庄园，他要求卖主提出自己的最终价格。当卖主这样做了之后，斯凯沃拉回答说，他认为此处庄园比卖主提出的价格值得更多，于是比卖主要求的价格多付了10万塞斯

[1] 公元前95年的执政官和大祭司。西塞罗曾是他的学生，称他为“律师中间最伟大的雄辩家，雄辩家中间最伟大的律师”。

特斯。^[1] 没有人会否认，他的这种作法证明了他的善良品格。但是，他的行动也招致了非议，有人认为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就像他出卖这个庄园而没有收到预期的金额一样愚蠢。这是一种多么有害的说法！这意味着是否善良的人和智慧的人是一致的。正如恩纽斯中肯地说的那样，“如果智慧的人不能使自己受益，那么他的智慧就等于零”。^[2] 如果恩纽斯和我所说的“受益”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句话便是完全正确的。

帕奈修斯的学生，罗得岛的赫卡托，在他献给奎因图斯·艾留斯·图贝罗^[3]的《论义务》一书中，就这个论题做了值得注意的评论。赫卡托说：“一个智慧的人关心自己的私益，如果不牵涉到违背道德、法律或现有制度的行为，便是合理的。因为当我们想富裕起来时，激励我们的并不就是利己主义，我们抱有这种雄心，可以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属和我们的朋友的缘故。而且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国家的缘故。民族的富裕是由个人的财力和好运构成的。”所以，我所说的斯凯沃拉的这种行为，是

[1] 古罗马钱币，先为银质，后改为青铜质。

[2] 引自恩纽斯现已失传的悲剧《美狄亚》。

[3] 公元前123年的执政官、法学家，帕奈修斯的朋友。

不会获得赫卡托赞许的，因为赫卡托认为，除了为法律所特别禁止的谋利外，一切谋利都是许可的。但对持这类观点的人，我们用不着大加赞扬或感激。

如果欺骗罪既包括故意颠倒黑白也包括隐瞒事实的话，那么在人类交易中不乏这种欺骗罪。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说的善良的人是指那种帮助一切人而不损害任何人的人，那么也将很难找到这样善良的人。然而，正如我力图表明的那样，邪恶的行动决不会有好处的，因为它们在道德上总是错误的；而在道德上正当的善，则永远是有好处的。

在有关现实财产的民事法典中，法律规定，在销售中卖方应当声明他所知道的他的商品的缺陷，不得隐瞒。《十二条》要求，那些明确标志出来的缺陷应由卖方予以赔偿，如果一个卖主以争辩来否认这些缺陷，他应付两倍的赔偿费。现在，我们的立法者已经把隐瞒事实列入可起诉的犯法行动，规定即使卖方不曾声明商品的缺陷，他也应该进行赔偿。

有一次，占卜官们打算从城堡上进行天空观察。台比留·克洛狄乌斯·森图马鲁斯在凯利里小山上拥有一所房屋，这所房屋的高度妨碍了占卜官的视线，占卜官们建议克洛狄乌斯推

倒这所房屋的一些部分。但克洛狄乌斯答复说他要拍卖这个障碍物。买主是知名的卡尔波纽斯·拉纳留斯，于是占卜官们也对卡尔波纽斯下了同样的通知，他做了必要的拆除。然而，在这个时候，卡尔波纽斯得知，克洛狄乌斯是在占卜官们命令部分拆毁这所房屋之后才拍卖这所房屋的。于是，他迫使克洛狄乌斯去打官司，由一个仲裁人来决定他是否有权为修补和翻新被拆毁的部分而要求赔偿。我们现在的卡托（别人都是子随父荣，而他却是父随子荣！）的父亲马库斯·波修斯·卡托做了裁决。他的决断如下：“既然卖主当时知道这一事实而没有宣布这一事实，所以他应该赔偿买主的损失。”

由此卡托确定了一个原则，善良信念要求凡卖方已知的缺陷应让买方得知。如果卡托的裁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粮商和不卫生房间的销售者隐瞒事实就是错误的。当然，我们的民法解决各个方面的隐瞒事实现象是不可能的。但在它们的权力所及的那些方面，它们应该严肃处理。

有一次，我的亲戚马库斯·马留斯·哥拉提迪亚努斯^[1]向盖阿斯·塞吉斯乌·奥拉塔出售一

[1] 公元前86年的执政官(?)，被苏拉杀害。他的婣子嫁给了西塞罗的祖父。

所房屋，而这所房屋正是他几年前从这个人手里买下的。在销售中，哥拉提迪亚努斯没有说明这所房屋的买主应继续承担的合法债权。后来出现了纠纷，上诉到法庭。鲁修斯·李西努斯·克拉苏斯为奥拉塔辩护，马库斯·安托纽斯^[1]为哥拉提迪亚努斯辩护。克拉苏斯强调，法律要求卖方应为他已知道但未说出的缺陷进行赔偿。而安托纽斯求助于衡平法。他的论据是，既然奥拉塔以前曾亲自把这所房屋卖给哥拉提迪亚努斯，说明他早已知道这个缺陷。因此，安托纽斯里特认为，在这次买卖中用不着提及债务问题。由于奥拉塔已经知道这种债务，所以他不是欺骗的受害者。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呢？为了向你们表明我们的前人并不鼓励苛刻的习俗。

现在，法律和哲学有了反对苛刻习俗的不同方法。法律力图靠有力的强制来征服它，哲学家们力图靠推理和逻辑来征服它，他们认为逻辑和推理使得欺骗、虚假或诡诈的作法成为

[1] 马库斯·安托纽斯是雄辩家，公元前99年的执政官，公元前87年被杀。鲁修斯·李西努斯·克拉苏斯是西塞罗《论雄辩家》中的主要发言人。两人曾是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

不可能的。是的，设圈套无疑属于欺骗！即使一个人不是故意地耍花招或设陷阱，也属于欺骗，因为不管人们是不是比动物愚蠢，都经常会陷入圈套。拍卖房屋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显然，你不应该用拍卖当陷阱，希望能逮住某个粗心大意的牺牲者。

然而，舆论提出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很高的，而且我发现现在这类行动在规范上没有被当作错误的，或应受法律和民法惩罚的。但自然本身所规定的道德法则禁止这类行动。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需要不断重复！），有一条社会的纽带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同他人连结起来。尽管这一纽带在全世界都通用，但它特别强有力地把他同一种族和人民联结起来。在同胞之间，这种联结尤其紧密。

一切人类之间的这种自然的社会纽带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前人喜欢对国家的民法和一般的法则做出区别。诚然，国家的法律应当能包含在一般的法则之内，但二者不是同义的，因为后者更为广泛。

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清晰明确的图像，使我们得知真实而权威的法律和正义真正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有大致的轮廓。就我们是受这些轮廓指导而言，它们毕竟有很多可取之处。

因为至少它们具有来自最完美的典型的优点，而这些典型是自然和真理赐予我们的。试看这样一个公理的崇高性：我之所以不被欺骗和蒙蔽，乃是因为你和因为对你的信任。另一条黄金定律是：在诚实的人之间应该是诚实的交易，而不是欺骗。

但是，这并没有回答两个大问题：谁是诚实的人？什么是诚实的交易？

大祭司奎因图斯·姆修斯·斯凯沃拉认为，以善良信念来仲裁案例是特别重要的。他认为这个公理具有最广泛的有效性，适用于监护权、合作、信用、委托、买卖、租让，实际上适用于构成日常人类关系的一切事务。根据斯凯沃拉的观点，对这些领域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义务的评价，以及经常碰到的一切反诉，都需要有一个杰出能力的法官。

所以，应当抛弃苛刻的习俗。每一种伪装成智慧的诡诈也应当抛弃，因为智慧和诡诈是两种完全不同而大相径庭的东西。智慧的作用是区别善与恶，而诡诈是表面上介于善与恶之间，实际上偏向恶的和错误的东西。

不动产不是我们的民法按自然的命令来惩罚诡诈和欺骗的唯一领域。例如，在出卖奴隶时，卖主的一切欺骗也是被禁止的。市政管理官

员曾规定，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出卖的奴隶是不健康的奴隶或逃亡奴隶、小偷，他应该（除非这个奴隶是他继承遗产而得来的）如实说明。

这就是我们应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法律的根本；一个人利用别人的无知而行骗，是违背自然的。所以，伪装成智慧的诡诈是生命的最大灾祸，是产生利益和正义相冲突的无数幻想的原因。如果人们自信诡诈将既不被揭露，亦不被惩罚的话，那么极少有人能幸免作恶

有缺点但又可敬的人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检验一下这个结论，把这一原则应用到舆论未必能看出其错误的某些例子上。因此，在这里用不着讨论谋杀者、投毒者、伪造遗嘱者、偷盗者和贪污国家资金者，因为这些人应受的强制无需哲学家来强调和论证，显然是戴枷锁进监狱的事情。相反，我们应当探索一下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善良者的人的行动。

有一次，一些人从希腊传送到罗马一份伪造的遗嘱，声称是富翁鲁修斯·米纽修斯·巴西鲁斯写的。为了增加这遗嘱的可信性，当时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马库斯·李西纽斯·克拉苏

斯^[1]和奎因图斯·霍屯修斯^[2]，作为冒牌的继承人联合起来。这些权贵对这个伪造的遗嘱有所怀疑，但既然他们并没有亲自卷入伪造遗嘱罪之中，便难以拒绝别人的犯罪行为给他们带来的这份可耻的礼物。克拉苏斯和霍屯修斯责任的间接性质是否足以开脱他们的罪责呢？尽管我对他们两人中那个还活着的人抱有感情，而且也不是另一个已死去的人的敌人，但我还是坚持给予否定的回答。巴西鲁斯的意图是把他的名号和遗产传给他姐姐的儿子马库斯·萨特留斯，这个人皮塞努姆和萨拜地区的“庇护人”^[3]（这个不幸的称号是时代的一个标志！）。因此，财产到了罗马这个领袖人物手里，而萨特留斯除了名号什么也没有继承，这是不公平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认为，一个人未能防止或抵制坏事，本身就是犯了一个绝对的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些不仅没

[1] 三执政之一，公元前53年在卡尔海被杀。

[2] 雄辩家，西塞罗在维莱斯案件上的主要对手。

[3] 古代庇护人和平民之间的联系，连同他们在习俗和宗教上被认可的相互义务，曾扩大到整个社会。西塞罗哀叹，享有罗马公民权的社会阶层应需要某个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马库斯·萨特留斯是安托尼的一个支持者。

有防止错误而且实际上助长了错误的人呢？的确，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真正的继承权是靠不诚实的奉承，靠出自利己动机而不是利他动机的效劳来获得的，我并不认为这些继承权就是合理的。

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也可能以一种方法看起来正当，而以另一种方式看起来有好处。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在定义上正当和处好有同一的。一旦一个人不能理解这一点，那么任何欺诈或犯罪对他来说都是可干的。如果他认为“一种方式肯定是正当的，而另一种方式对我是有利的”，那么，他就会把大自然使之紧密结合的这两种东西扯得粉碎。这种误入歧途的鲁莽导致各种欺骗、犯罪和恶习。

不妨假设一下，一个好人能轻而易举地靠权力而把自己的名字插入富人的遗嘱里。即使他能绝对肯定没有人怀疑他，他也不会这样滥用权力。但马库斯·李西纽斯·克拉苏斯却利用这种能力轻而易举地占有了实际上不是留给他的遗产。请大家相信，为了这个目标，克拉苏斯甚至准备在广场上跳舞。相反，我们所理解的正义的人、善良的人，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占有别人的任何东西。如果谁对这一点感到疑惑不解，那么他等于供认出他对善良的人

意味着什么是完全无知的。

存在着人类之善的理想，大自然已经把这种理想存入和盘绕在我们的心灵里。一旦展现这一理想，你将直接把善良的人视为尽力帮助每一个人而且除非误入歧途便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人。可以肯定，用某种巫术咒语来剥夺合法继承人的财产，会损害别人。

有一种与此相反的理论认为，一个人有权听任自己的利益和收益的支配来行动。这是一种错误的假定，因为一个人应该懂得，决不能靠任何不正义的手段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在一个人能达到善之前，他应该学学这门课。

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听我父亲讲述前执政官盖阿斯·弗拉维尤斯·弗姆布里亚的故事。弗姆布里亚曾是仲裁一个有关非常正直的骑士领袖马库斯·鲁塔提尤斯·平西亚的案例的法官。平西亚打赌，如果他不能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善良，他情愿付出罚金。但弗姆布里亚无论如何拒绝对这个案子做出裁决，因为如果他做了裁决，要么他会使一个可敬的人威望扫地(这是不利的裁决的结果)，要么他就是宣布某人是善良的人，而真正的善却取决于无数的义务和值得赞扬的行动的表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弗姆布里亚拒绝做出裁

决。所以，他（更不用说苏格拉底了！）能够把善良的人视为唯一到正当的东西中寻找好处的人。

这样的人不怕公开自己的一切行动，甚至一切思想。所以，说哲学家甚至在农民都毫不感到犹豫的事情上也疑心忡忡，这是恶意诽谤！农民创造了一句古老的谚语来赞美一个人的诚实和正直。“你在黑暗之处也可以和他玩猜单双的游戏。”显然，这等于是说，你决不能从不正当的收益中得到什么好处，不管这不正当的收益是否已被察觉。

这句谚语不宽容埃盖翁兄弟^[1]，或者说不宽容那种有轻而易举占有任何人遗产的权力的人。因为大自然既否定错误的行为可以有好处，也不承认伪装能使错误的行为成为正当的。

有人提出了异议：当奖赏十分丰厚时，作恶也就是可原谅的。

以盖阿斯·马留斯为例。^[2]他担任军政官6年多，但并不知足，一心想当执政官。执政官

[1] 希腊神话中各有50个头，100只手的三巨人。

[2] 罗马大将马留斯，曾战胜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萨和德国人，7次当选为执政官，卒于公元前86年。但一些保守人士说真正战胜朱古萨的人是指梅特鲁斯（公元前109年的执政官）。

的职位似乎对他来说是办不到的，而且表面上他甚至不想参加竞选。但后来，忠于职守的著名人物奎因图斯·凯西留斯·梅特鲁斯派他来到罗马。在罗马，马留斯向国家议会发表演说，攻击他的指挥官梅特鲁斯，指责他故意拖延战争。他许诺，如果议员们让他当执政官，他将迅速抓获敌王朱古萨，不论死活，都交给罗马人民处理。因此，他当选为执政官。但他的这一行动是与善良信念和公平交易背道而驰的。因为他诱使民众不信任一个高贵而非常可敬的罗马人，而这个罗马人是他的指挥官，而且对他的使命负有责任。他靠莫须有的罪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甚至我的亲戚马库斯·马鲁斯·哥拉提迪亚努斯一度的表现，也不像一个善良的人应有的表现。在他任军政官时，护民官们邀请一批军政官来开会，共同为货币确定一个标准。当时货币的价值非常不稳定，以致没有人知道自己拥有多少价值的财产。所以，他们草拟了一个联合声明，包括关于侵犯财产罪的处罚和判决程序的规定。他们约定当天下午重新开会，一齐登上官方讲台。接着就散会了。可是，哥拉提迪亚努斯离开护民官的会场后，便直接来到官方讲台，发表了他们共同草拟的声明，仿佛

这声明是他一人搞的。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个行动一下子使他成了非常著名的人物！他的塑像立在了每一条大街上，人们供上香火和蜡烛进行膜拜。从没有人如此深得民心。

这种例子有时是错综复杂的。这种有失正直的过失看起来不是大不了的事，但这种行为的有利结果却是极其重大的。尽管哥拉提迪亚努斯从他的军政官同事和护民官那里偷盗了民心，对他来说不是非常可怕的错误，但这次偷盗使执政官选举（他一直渴望的）对他非常有利。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的准则是不容例外的。我希望你们现在完全记住这个准则：只有在不干任何错误行为时，表面上有利的东西才能真正有利，如果情况相反，这种行动是决不可能有利的。

能否做出结论说，我们可把伟大的马留斯或马留斯·哥拉提迪亚努斯当作善良的人呢？绝对不能！不妨再检查一下你的结论，考虑一下从他们身上表现出哪些善良者的理想。一个善良的人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撒谎、诽谤、霸占、欺骗吗？绝对不会！

肯定，善良者的名望和荣誉是非常宝贵的，决不能为了别的什么东西而牺牲它们，不管别的东西在外表上多么有价值和多么诱人。任何

所谓的好处都弥补不了对你的善良信念和正派作风上所造成的损失，都弥补不了你的好名声的葬送。如果一个人只是徒有人的外表而实有一颗残忍的兽心，那么他就不是人，而是野兽。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权力的缘故，而准备无视一切正义和善的东西。我不妨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个人想娶另一个人的女儿，然后打算利用岳父的冷酷无情来取得自己的统治。^[1]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掌握广泛的权力，缓和民心，击败别人。但他看不到这给他的国家带来了危害，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这位岳父，他喜欢欧里皮德斯的《腓尼基的女人》中的一句话。在这里我尽可能把这句话译好，虽然粗鲁一些但也许易懂。这句话是：如果权利可以被侵犯，那么为了王位的缘故就应该去侵犯它，让别人去畏惧神吧。这个把自己视为一个例外的人，理应处死！犯罪行为决不能姑息纵容。我们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列举一些小罪，如伪造遗嘱、肮脏交易、欺骗性推销呢？因为从这里你们将会看出这种人

[1] 公元前年 59 庞培娶了凯撒的女儿朱丽亚，这是第一次三执政之间的协议的一部分。

实际上渴望成为罗马的绝对君主，整个世界的主人，这才是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有疯子才会把这种野心看作光荣的。赞许这种野心，等于是为法律和自由的毁灭而喝彩，炫耀可恶而可怕的压制法律和自由的行为。

一个人如果既承认残暴地统治一个一度自由而且应该继续自由的国家是令人厌恶的，又想使自己成为国家的暴君而从中得到好处，那么这个人就是自相矛盾的。为了把他从这种错觉中解救出来，决不应该限制我们的指责和控诉。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究竟有谁能靠谋害自己的国家而得到好处呢？在所有的谋害中间这是最丑陋最可憎的，即使进行这种谋害的人被他踩在脚下的公民欢呼为“国家之父”。

所以，利益的唯一尺度就是道德上的正义。的确，利益和正义这两个词之间唯一可以发现的差别，只是语音上的不同。在意义上，它们是一回事。诚然，如果我们按舆论的标准来看，所能想象的最大的优势莫过于做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但是，当我们应用真理的标准时，一个靠错误的手段而达到这种地位的人，其行为是同他自身的利益完全不符的。极度的焦虑痛苦、日日夜夜的恐怖、连续不断的密谋和危险的生活，是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的。艾克修

斯写道“对于王权，多数人是敌视、不忠诚，极少数人表示友好。”但他提到的君权已经合法地从坦塔罗斯和佩洛普斯^[1]手里失落了。而我们的独裁者更普遍为人们所痛恨。因为他实际上已利用罗马的敌人来压迫罗马的人民；他已把我们的民族（这个民族以前不仅本身是自由的，而且也是其他民族的统治者）变成了他个人的奴仆。

想一想腐败和疮伤给人们良心和心灵上留下的伤痕吧！如果靠破坏就能获得前所未闻的民心 and 荣誉，人的一生还能有什么益处？在某一方面权力看起来特别有好处。但在权力之上的羞耻和罪恶的担子会否认这种好处，并进一步证明，任何不正义的东西都不可能有什么好处。

有必要永远诚实吗？

关于上述结论，不乏大量的证据。在这里我们仅提一个在同皮洛士的战争中^[2]有关盖阿斯·法布里修斯·鲁西努斯（第二届执政官）和我们的元老院的突出例子。当时皮洛士对罗马不

【1】坦塔洛斯和佩洛普斯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儿子和孙子，据传坦塔洛斯曾杀死儿子佩洛普斯以饷神。

【2】伊皮鲁斯的国王，于公元前280—275年在意大利南部同罗马人交战。

宣而战。帝国的统治权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强有力的杰出的君主。有一天，皮洛士军队的一个逃兵来到法布里修斯的军营，提出在重赏之下他将秘密地再回到皮洛士军营去，用毒药杀死皮洛士国王。但法布里修斯却把这个人引渡给皮洛士，我们的元老院为他的这一决定而喝彩。假若我们大家都寻求表面的好处，即民众所认为的好处，那么，一场可怕的战争和我们国家难对付的敌人都将由于这个逃兵的作用而告结束。但是，战争的奖赏是荣誉，运用罪行而不是运用勇敢作为我们的战斗武器，将是一种可怕的丑闻和耻辱。

法布里修斯在罗马的地位，相当于阿里斯蒂底斯^[1]在雅典的地位。我们的元老院一直把利益和原则视为一致的。所以，人们都能理解为什么要用战斗武器而不用毒药来同敌人战斗。如果是为了至上的权力而战斗，刺激物是荣誉，那么就不应该搞阴谋，因为靠阴谋是不可能获得荣誉的。即使我们的目的是追求理性，而不是追求荣誉，也不能搞阴谋。如果用可耻的手段来达到理性，是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的。

[1] 希腊政治家和军事家，普拉塔亚战争（公元前479年）中雅典军队的指挥官，狄密斯托克利的政敌。

我们可以运用这个道理来看一看奎因图斯的儿子鲁修斯·马修斯·菲利普斯的提议。苏拉曾根据元老院的法令，决定一些城市^[1]如果一次性付出赔款，可以免除对它们的税收。菲利普斯建议，这些城市的税收是不能免除的，但它们为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付出的赔款不应偿还。元老院接受了这个提议。这该是我们政府多大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一个海盗也能提出比元老院的善良信念更好的东西。

另一方面的理由是，既然菲利普斯的措施意味着增加我们税收，结果总是有利的。但是，人民会永远固执地从错误的东西中寻找好处吗？政府不能没有辉煌的名望和同盟国的亲善。所以，不得人心和声名狼籍怎能带来好处？

在这个问题上，我经常和我的朋友马库斯·波修斯·卡托的意见相左。在我看来，他对国库和税收的把守简直到了固执的地步。结果，他拒绝了包税商的所有要求和我们盟国的很多要求。其实，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方式来宽宏大量地对待我们的盟国，把包税商当作我们的承

【1】可能是指苏拉在第一次米斯里达特战争（公元前88—85年）中从庞图斯的国王米斯里达特六世手中夺来的几个城市。

租人。既然我们社会的不同等级之间的和谐是我们民族福利之根本，我们应该这样做。

长老盖阿斯·斯克里波纽斯·库里奥尽管承认波河北岸人^[1]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总要加上一句：**利益为重**！他这样说也是不对的。他最好应说这些要求由于不利于我们民族利益，因而是不正当的，而不应既承认这些要求的正当性又否定它们的有利性。

赫卡托的《论义务》一书第六卷提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当食物极其缺乏时，一个正派的人是否有权利让他的奴隶们挨饿？”赫卡托做了两方面的论证，但最终他依据他理解的好处，而不是依据人类感情，做出了他的结论。

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暴，货船将要覆没，一个人应扔掉一匹有价值的马还是应扔掉一个无价值的奴隶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钱袋拿出了一种办法，而人类感情拿出了另一种办法。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这艘船已经沉没，一个智力低下的人已经抓住了一块船板，智慧的

[1] 波河北岸的意大利居民在社会(马西亚)战争(公元前89年)期间已获得一半公民权，到了公元前49年才从凯撒手里获得了全部公民权。

人是不是应该从他手里把船板抢走呢？”赫卡托说：“不应该，这是错误的。”

“那么，如果他是这艘船的船主，你将怎么看待呢？他不应该把船板抢走吗？”

“肯定不应该，不仅他不应该，而且任何人都应该把一个乘客扔在深水里。因为在这艘船到达规定的港口之前，这艘船不属于船主，而属于全体乘客。”

“那么，如果只有一块船板，而遇难的两个人都是真正智慧的人，是否其中一个人应极力为自己抓住这块船板，而另一个人应该放弃它呢？”

“其中一个人应该放弃。船板应该留给那个其生命对他本人或对他的国家更有价值的人。”

“但如果他们的生命各自看来同等有价值呢？”

“即使这样，他们也不应争夺，可以用别的方式使其中一个人把船板让给另一人，比如抽签或猜数。”

“再提一个别的问题：假若一个人的父亲正在盗窃神殿的财物或挖一条通向国库的地道，他的儿子是否应该向当局揭发他呢？”

“不应该，这是一种罪过。即使父亲被起

诉，儿子也应该为父亲辩护。”

“这么说爱国主义并不高于其他义务了？”

“是的，的确如此，但我们国家将因为有了忠诚于父亲的儿子而受益。”

“那么，如果一个人的父亲企图抓住独裁大权，或背叛国家，儿子也应该一言不发吗？”

“当然，他应该乞求他父亲不要这样做。如果这种请求无效，他应该斥责甚至威胁他父亲，如果最终民族的毁灭即将临头，他应该把国家的安全摆在父亲的安全之上。”

赫卡托还问道：“如果一个智慧的人不留心收到了一枚假币，在发觉了这个错误时，他是否可以把这枚假币在偿付债务时转给别的好人呢？”第欧根尼说可以，安提帕特认为不可以，赫卡托赞成后者的意见。

另外，“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卖的酒已经变坏，他是否应该说出这个事实呢？”第欧根尼说不需要说出，安提帕特认为诚实的人应该说出。斯多噶派讨论了这些有争议的法律要点之类的问题。还有，“当你出售一个奴隶时，是否应该说出他的缺陷呢？这些缺陷不仅包括法律要求说出的缺陷（否则买卖便不能成交），还包括诸如这个奴隶是一个说谎者或赌徒、小偷、酒鬼等事实”。其中一个哲学家认为应该说出这些事

实，另一个哲学家说不需要说出这些事实。

“如果一个人自认为自己在卖的是铜器而实际在卖的是金器，一个诚实的人应该告诉他这金属是金子，还是按其价值的十分之一把它买去呢？”

显然，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哲学家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我们何去何从呢？

总之，假若不是靠武力或欺骗（如军政官的作法）达成一个协议或允诺，人们是否总应信用诺言呢？

设想有一个人另一个人治疗水肿，并约定如果治疗成功，接受治疗者决不应再使用这种疗法。病人很快康复了。但几年之后，病情复发。这时，那个以前愿意给他治病的人拒绝再给他治疗。这个病人应该怎么做呢？我的回答是，这个疗方的拥有者不会因为同意再使用这个疗方而蒙受损失，所以，他拒绝给予治疗是不人道的，病人有权利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

又如，一个智慧的人将获得1亿塞斯特斯遗产。但立遗嘱者首先要求，他未来的受益人必须光天化日之下在罗马广场上当众表演舞蹈。这个智慧的人许诺一定照办，否则他将失

去这笔遗产。这个智慧的人是否应信守这个诺言呢？首先，我觉得他这样许诺真叫人遗憾！为了自己的尊严，他应该拒绝这样许诺。但我们不妨假定这个诺言已经许下了。那么，如果他认为在罗马广场上跳舞从道德上说是错误的，他最好违背他的诺言，即使不能从这笔遗产中得到一分钱，也不要信守诺言，捞这笔财产。也许在某种危机时刻，他把这笔钱交给国家，可以另当别论。如果国家将受益，即使在罗马广场上跳舞也不为错。

此外，那些违背了被许诺的人的利益的诺言，是不需要信守的。我们不妨引用神话传说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次，太阳神对他的儿子法厄同说，不管提什么要求他都能满足。儿子要求驾驶父亲的马车。父亲答应了儿子的要求。结果，法厄同在天上驾车飞驰时，一道闪电把他击毁了。在这个例子中，倘若父亲违背自己的诺言该有多好啊！

据传，涅普图奈曾许诺满足泰修斯的3个愿望。泰修斯怀疑自己妻子和自己亲生儿子希波吕托斯的关系不正当（两人是继母和继子），愿意让儿子死去。他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泰修斯后来深感后悔，悲痛欲绝。另外，亚加米农也曾答应迪亚娜，把他王国里当年出生的最

美丽的生物牺牲掉，谁知这最美丽的生物竟是他女儿爱菲吉尼娅，于是他不得不忍痛牺牲了自己的女儿。其实，为了不犯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他应该否认自己的誓言。

这也就是说，诺言并不一定非得实践不可，信誉并不必须兑现。假若有一个人在神志正常时把他的剑交给你保管，后来他成了疯子，想要回他的剑。在这种情况下，依从就是犯罪，你应该拒绝还他剑。再如，一个人以前曾把一笔钱托付给你，后来他打算用这笔钱进行背叛你的国家的行动，⁹你应不应该还他这笔钱呢？依我的意见，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将违背你的国家的利益，而国家对你来说应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更可贵。

所以，在特定环境里，一些看起来自然而且正当的东西，会变得完全不正当。如果最初促使你做出某种许诺、协议或信誉的好处不再存在，那么实现这种诺言就不再是正当的，反而是错误的。

关于这些看起来理智而且有好处、实则违背正义的行动方式，我觉得已经谈得太多了，就此搁笔吧！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老年·友谊·义务——西塞罗文集

作者 = 高地 张峰

页数 = 216

SS号 = 10232560

出版日期 = 1989年04月第1版

封面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